

殺而下台，那是絕不會東山再起的。同時義大利自由黨和共產黨人們，都致書優林，要求取消宴會。大使館職員贊成義大利共產黨的態度，莫斯科訓令亦然。此時莫斯科根據秘密特務的情報，也認為墨索里尼的壽命只是遲早間事。優林的眼光却較一般政治觀察家高出一籌。他估計了反對派的正確價值：它不獨缺乏資源，也不够決斷。法西斯政權却已建立了強固的黨和官僚組織，足以對抗任何敵人的攻擊。義蘇的邦交，此時是很正常的，他無意於阻礙它的發展。墨索里尼的義大利和威瑪憲法的德國為與蘇聯友善的兩個國家。（一般人都知道，蘇聯企圖在不滿意凡爾賽和約的國家中獲得領導地位。）

因此，盛宴照常舉行了。優林大使，以一革命社會主義大國的外交代表，歡迎了墨索里尼一個法西斯國家的首長。此事不獨在義大利外交界中引起許多談論，即在國外亦然。此事說明，蘇聯的外交政策，遇必要時，是可以不忠於社會主義團結精神的。

因為他此次事件，優林不久就奉召歸國。但法西斯政權的恢復，證明他的態度是對的。同時李維諾夫對他的友誼救了他，使他沒有發生嚴重後果。但他在外交界的地位却受了貶謫，而被派到一些次要的地方任職，先在維也納，後來在德黑蘭。後來馬提奧迪事件過去了，他被任為駐日大使。這是一種昇遷，因為要經過史達林親自核准的原故。一九三七年他從東京調到柏林，被請到貝茲加登呈遞國書，希特勒並設宴招待他。兩星期後，他奉召返莫斯科，某夜，突然失蹤了。

我從義大利返國途中，曾在駐柏林大使館停留，並參加了十一月七日及八日的慶祝，在那裡聽了克來斯丁斯基的很精闢的演講。克氏是最老和最光榮的布什維克之一，在列甯之下，曾任過黨的書記。他像列甯一樣，是一個真正的革命理想家。權勢和聲望並未影響到他的行為和忠實。他為黨及革命，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當我回抵莫斯科時，我發現他們已派我去中國任總領事，但為健康關係，我婉辭了。我認為廣州的氣候對於瘴疾並不較吉蘭為好。並且我覺得這個使命是很平凡的。但誰也料不到，一年後，中國國民黨在蘇聯人協助下，進展如此之速。在我被任命時，孫中山已被驅出廣州，前途形勢頗為黯淡。毋庸說我後來是極後悔的。

我也許想回到紅軍中擔任參謀工作，但既做了共產黨員，是沒有自由選擇的。每一黨員的命運及職業，連軍官在內，都是在普羅什哈德街中央委員會大廈的高牆後決定的。會裏有一個調派組，將黨員像棋子一樣分配各處。我有一位朋友，曾從他在莫斯科的師指揮官的職位，調到中亞細亞去種植鴉片及棉花。他假如認為此種調派不合理，或藉口缺乏經驗時，他們會指出說：「沒有布什維克不能克服的要塞」。

我是比較倖運的，中央委員會鑒於我對文字的造詣以及精通外國情形，所以我的職務大都是派在國外的。按當時的慣例：一般高級人員的任免，是由中央委員會書記決定的，因此我也蒙莫洛托夫召見，關於我的出路問題，談了一小時。我手裏得到一張莫氏簽署的任命狀，它決定了我未來四年的工作。這張印刷品上填了我的姓名，機關及職務。它任命了前駐波斯總領事巴明同志，分發到對外貿易部任國際圖書公司理事會董事。

二二、反托洛斯基及國外文具問題

我在莫斯科過了四整年典型共產黨官吏的生活，白天辦公，晚間忙於黨務。

我在城中心區獨住一屋，我的學生子則留，由基輔，我母親照顧。如一般縱然做到崇高位置的共產黨員一樣，我的月薪不得超過二二五盧布。此區區之數，僅够供應一些必需用度。非黨員的專家及技術員，則有時獲得較豐富的收入，其中也有少數人們拒絕領受此項溥遇。此種限制黨員薪水辦法，使黨內感到相親相愛，增加了團結力量。此一制度後爲史達林取消了。我們全部精力都集中於工作及黨務中，絕無私人生活可言。戀愛，娛樂，及人類友情中之較微妙關係，均與我們絕緣。

國際圖書公司的主要任務，是自外國輸入書籍及文具。雖則書籍進口的數量不大改變，但因爲蘇維埃機構的擴張，學校及辦公室文具的需要，如鋼筆，鉛筆之類，則增加至速。當我就任時，我們的貿易額已增至六百萬金盧布一年，其中五百萬用於購置外國文具及辦公用具。若干外國專利公司獲得在俄國製造文具之權，獲利極厚。外國特許公司中之規模最大者，爲一美國人哈姆耳所經營的一家。一國家印刷信託公司一曾設法製造廉價鉛筆，但品質甚劣，不足與哈姆耳較昂的產品抗衡。我們的無能，不免爲一些特許公司所譏笑，他們是可以將溢利用等值物品輸出的。

我們計劃如何才能夠與他們競爭，俾挽回蘇聯鉅額輸入的漏卮。國際圖書公司因此決計自製辦公用具。我們只需用少量金錢購置機器，一方面可以減少失業，一方面可以自給自足，無求於人。我們首先在莫斯科成立了製造打字帶和複寫紙的工廠。這個工廠的完成，得力於依柏提厄夫的幫助頗多。依氏是新自美國回來的高深的化學家（目前他在西北大學任教授），對外貿易部人民委員長克拉新對於此項計劃亦極熱心，他派我主持廠務，並在列甯格勒附近成立一所鋼筆廠。

我在列甯格勒發現了一所被市政府接受的巧克力糖廠，其中野鼠橫行，寒風刺骨。以前的廠主，現在看管着房屋。他承言此項建築不宜設廠，而且修理所費亦將不貲。他諄諄勸告，其用心如何，初不可測；但我認爲他僅圖將空房保持不供人用而已。我們不理他的反對，不久就將它改造竣事，並裝置自柏林及布拉格購來的機器設備。在一位德國專家的主持下，克拉新工廠不久就僱用了四百名共產黨員失業工人。這位德國專家的熱忱毅力，使我們獲到意外的成功。在短短幾月中，我們製出的鋼筆不獨媲美哈姆耳的出品，並有過之無不及。但俄國鉛筆信託業的出品，則迄未趕上哈姆耳的標準。

我和資本家競爭的奮鬥不久，就轉移到另一方面。雖然價錢較我們的高得多，但一般政府機關仍繼續採用外國特許公司的出品。我們因此作了很久的努力，向顧客們說明我們出品的優良。到了一九二九年，列甯格勒和莫斯科克拉新廠已經戰勝了外國貨的競爭，全年產品共值六百萬金盧布，僱用工人一千名。

我們感覺業已贏得勝利，這並不是對外貿易部的官員們的功勞，因爲他們經常勸我們專心發售自國外輸入的書籍及文具，而毋須從事投機的冒險。但我們却創立了新工業，並爲蘇聯國庫每年節省了五百萬金盧布。就個人而言，我覺得經營國際圖書公司也許較之與里薩汗官吏們的外交談判更有具體的效果。因此，我開始忘了我在東方的職業前途。

此時，有一樁事件使我發生上述的感想，並自笑我青年時代的美夢。阿富汗國王亞曼畧刺來到莫斯科訪問，他是我們第一位貴賓。爲表示隆重起見，帶上白手套的警察遮斷了蘇維埃方場。列甯學院點綴了鮮花，從門至階鋪了地毯，掃得一無塵埃——這一切佈置，都是爲了一位外國君王想瞻覽列甯的手藉而做的。

亞氏乘汽車而至，我們的加里甯主席陪着他，似乎像吞了蓖麻油的難受。加氏對於他自己的無產階級經歷及作風是頗爲自負的，因此，對於這樣的表演當然不感習慣。這似乎距我們推翻亞洲專制寶座的希望，已經一個世紀了。我們駐加布耳大使勒斯科尼可夫剛從任所歸來。他曾經親自佈置波斯革命的基礎，並且鼓舞了我到東方服務的志願。亞曼畧刺除授以阿富汗最高勳章外，並封勒斯科尼可夫做阿富汗王公，但勒氏既未受爵，亦不配帶這些勳章。亞曼畧刺會請教我們的意見，並要求供應汽車及軍火。但他却無緣享受。翌年，游牧部落叛變了，他被迫出亡。

除了正常工作外，每一共產黨員都得做些黨的義務，名爲「那格魯茲凱」——即負擔之意。人們的負擔，可以從對工廠工人講話，直至爲黨的刊物募捐。每一黨員負擔的輕重，視他的能力及自由時間的多少而定。

每一機關的黨員，組織成一個細胞，並選出它自己的書記。在許多羣衆組織中，如互助團，體育，文化，及志願防護團等，佔比例很少的共產黨員都得發揮領導作用。在這些社團的理事會或委員會中，黨員保持決定性的勢力。因此，少數的黨員往往可以控制生活各方面千萬人們的活動。因此黨員就不得不擔任許多職務，有些人竟要參加到一打以上的委員會。

同時，我們對於非黨員要以身作則，並要從他們中間吸收新黨員。毋庸諱言，我們既然受了這許多負擔的壓迫，有時不獨不能以身作則，並且只能虛文地出席而已。此種操縱方法，誠如列甯所謂「輸電帶」。它雖則走着，却不能將機器推動起來。

當一九二五至二六年時，黨內民主仍然維持着，雖然這已經是強弩之末。共產黨員們間的討論，不受檢查。人們可以自由地提出問題。布什維克的自我批評，除了供上級用來整肅部下外，仍具有它的意義。黨的最小單位，仍發揮獨立精神。在我們圖書公司三百名僱員中，我們的細胞僅有十二人。當四年後我離職時總人數增至廿五位。我們細胞的書記，爲着負擔的分配，將一些資格較佳的名單送到上級，因此，我被派主持一個紡織工業的兩種夜課，講授共產黨史及理論。我想象中以爲上課的人都是年青的工人們，但發現了許多前進的老黨員。他們都是貿易部門的主管，或工廠主管。他們和入黨還不過數月的一班新進的黨員同坐一處。「我們務必保持知識不落伍」，他們解說——這並不是無故的，因爲一切都在變了。

我們講授的時間，有一大部份要用於討論黨部上級領導上所發生的一些鬥爭。我們常常接了臨時通告，將正課擱起，討論某些流行的邪說。有時區委員會命我們討論真理報才發表的辛諾維夫反對托洛斯基的論文；有時我們要研究托洛斯基二十年前所作的「論永久革命」。這一切花樣，都是用來掩飾上級的一些陰謀的。我們當初覺得內裡有文章，但不明其故。後來才知道這就是史達林想爭取黨的領導所用以敗壞對手的方法。

漸漸地，莫斯科一般黨員的興趣都集中於「托洛斯基主義」的討論。遠在波斯和別的地方時，我隱約聽到過此種爭論。最初，我們一班青年們直覺地將問題看成很簡單，這不過是誰來繼承列甯而已。而大多數的意見，則認爲只有一人有此資格。我們都知托氏的聲望，高於一切其他爭位的人們，必然獲得羣衆的不渝的信賴。在挽救革命和國家的神奇工作中，托氏會和列甯負起艱鉅的責任。若干年來，他們兩人的名字總是分不開的。「列甯與托洛斯基萬歲」成了熱鬧的口號。但現在黨內一些領袖却攻擊托氏進行邪說。關於此一問題，我們既無經驗，亦無學識，所以不敢有所主張。

在共產黨員中，此時已充滿了各種偽馬克思派的標語。無論這些主義問題的真理如何，我們對於人們向托氏所施的攻擊很覺憂慮。以托氏這種領袖的聲譽和獨特的權威，難道不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資產嗎？除了教條問題外，托氏的人格及智慧，難道不是共產運動最顯赫的主腦嗎？我們對於此種黨內領袖間私人的仇視，甚感惶惑失望。但在一九二五年，則我一世代的人們，對於此種爭權，究將伊於胡底，是不會想到的。

那時，無人料到史達林會爬到個人獨裁政治地位。我們的一般情緒，爲一種健全的樂觀主義，對於自己及前途，深具信心。我們相信，只要俄國工業建設不受戰爭的阻礙，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不出數年，必能對世界上貢獻一個以平等自由爲原則的社會的例子。這是當然的。古老的資本主義歐洲天天接近危機，而我們則在計劃經濟下，生產日增，工農大眾不久都可以享受豐樂的生活。我們大家都有這樣的思想。

當這些日子，他們從未表示過此一鬥爭爲史達林與托洛斯基兩人間的衝突。史氏隱於中央委員會多數派的假面具下，很狡計地掩飾了他爭權的陰謀。他一部份的力量，是基於他過去在黨內的沒沒無聞。每一別的領袖都於過去廿餘年中，將思想暴露於外，要從他們間獲得「邪說」的證據是不難的，因爲他們在革命前都寫過若干論文，書籍及小冊子。史達林是長於此種陰謀的，他可以從一段，一句或一字上，斷章取義，指摘某些顯要的布什維克爲「犯錯誤的同志，未能認識自己的錯誤」。他的被害者，則無從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因爲史氏在過去廿餘年中，除了他的一些關於民族問題的編著會於一九一二年刊行外，迄未發表過任何著述。

我們當初獲得一個印象，認爲史達林於寫文章或演講時，像初級課本式的，也爐火純青，毫無意氣表示。一班其他領袖，都有獨特的個人風格，而史達林則似乎是一位冷靜的虔誠的列寧學者，耐性地尋求同僚們的「理論」上的錯誤，而將其不動情感地指明出來。我們却未想到，他正在主持一種個人的論爭。我們認爲這些人爲的理論紛爭，對於實際是極少聯系的，這是猶如關於一個鍼尖上，可容若干天使舞蹈的辯論一樣。

在整個派系鬥爭的早期，托洛斯基保持了高傲與緘默。他是不屑於作爲個人爭權奪利的鬥爭的。至於一些有關原則的問題，則他的紀錄俱在，自有公論。他何必在報紙上和黨會中浪費時間作無聊爭論呢？他的態度如是，但他失於估計到政治機器的重要性。

托氏如有些微表示預備應戰，黨的多數必然是支持他的。但他計不出此，當鬥爭正在高潮中，他離開莫斯科赴高加索醫治喉疾。他的贊助者被遺棄了。當他們看到史達林逐漸掌握了黨的工具，將一些反對者派到遼遠的工作崗位上，他們都失望了。當托氏決定來鬥爭的時候却太晚了。但不多時以前，托氏如在莫斯科黨大會中作一度演講，

他也許可以將潮流扭轉，而現在則史達林已獲得黨的有效控制。

我記起我讀史達林論「永久革命與托洛斯基同志」幾篇文章時的滿意情緒，它們的語調很溫和，它們的目標反駁托氏對於革命的觀點。托氏的理論認為革命必須持續而國際化才能成功。革命如宥於某一國度，或停頓於某一階段，則遲早必然崩潰。史達林則經常引證列寧的話支持他的論據，並指摘托氏完全忘了農民的貢獻。共產黨如獲得農民的擁護，以達成社會主義目標，則毋須期待國外工人階級的革命也可以成功的。

廿年後，他這種虛偽的辯論，和惡劣的邏輯，以及他毫不兌現的諾言，似乎全係愚昧與欺騙所策成的。我知托氏絕未漠視農民。沒有人像史達林那樣增加了農民的痛苦，他違反了列寧主義中關於共產黨與農民正當關係的每一項目。蘇聯不獨未能建立偉大的社會主義社會，而且在事實上建立了一個極權暴政。它的不平等，殘酷，和蔑視人類尊嚴，較之中世紀時期更為惡劣。但一九二五年時，我們為主義的推敲的狂潮所迷惑了，深信史達林所表達的中央委員會的政策為正確路線。因此，我們須要捐除個人意見。所謂永久革命，似乎為一種危險理論。最後，我們細胞投了贊同中央委員會的票，——就是說支持了辛諾維夫，加美列夫，和史達林。我們對於托氏投了反對票，這是很遺憾的，但他既默然不表示意見，似乎無糾正錯誤之意，我們就只好盡我們的責任了。

托氏此時已辭去最高軍事委員會主席，而被貶為特許事務委員會主席。但因托氏人緣極佳，史達林尚不敢公開反對他。如黨中覺察到史氏攻擊托氏只是為了爭奪個人領導，他的前程也就完了。史氏因此耐心地將辛諾維夫及加美列夫二人捧出，作為反托的先鋒。他使人獲得印象，認為辛諾維夫圖謀繼承列寧的地位。此兩人上了史的圈套隨後，當史達林決計消除他們時，他便沒有遇到黨的反對，很容易地成功了。

此後一年半中，黨的裂痕和教條的爭論，似已漸趨消沉。但到了一九二六年，則一切變本加厲。在第十五次黨大會中，一件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辛諾維夫和他的朋友們，包括那時莫斯科蘇維埃主席及副總理加美列夫在內，發現在黨內變成了少數派。

自然的，一些關於理論和政策的問題又成了注意中心。

第一，人們要問社會主義能否在單獨一個國家內生存。辛諾維夫及加美列夫的意見是和托洛斯基接近的，認為這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為國際性的，因此必須打破疆界。縱不是一切疆界，至少應當打破主要工業國家的疆界。另一方面，史達林認為：「蘇聯具有一切資源，使它單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他的辯證方式是很巧妙而受歡迎的。他認為我們可以在單獨一國內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但直至革命擴及其他國家時，此種建設不能完全成功。此一詭

辯迎合了兩種心理——一些相信世界革命的人們，和一些贊成退出世界革命的人們。同一詭辯，使目前一般美國政論家，對於史達林的最近演說，感到迷惑。他究竟與民主國家合作，抑將蘇維埃制度擴展至全歐洲呢？

第二個辯論，乃關於蘇聯工業的特質問題。史達林認為它是「嚴格的社會化」，而加美列夫則稱它為「國家資本主義」，並主張工人應分得一部份利潤。

史達林已將一切準備齊全。所有的代表，除列寧格勒的代表們為辛諾維夫的人外，幾乎全為他所提拔者。他們都是由各地方組織的書記們委派的，而這些書記們又是總書記史達林所任命的。再則，辛氏因為對托洛斯基作了不忠實而激烈的攻擊，頗為人所不齒。他又是共產國際的主席。此一組織在許多國家受了打擊，因此連累了他的聲望。在德意志，保加利亞，和愛沙尼亞，共產黨遇到很慘的失敗。我對於辛氏的失勢，是毫無惋惜的。黨內大多數熱心份子，對此也有同一見解。因此史達林利用了這種普遍情緒，不動聲色地擊敗了辛諾維夫一系。

經過一年的消沉，辛諾維夫與加美列夫捐除宿怨，與托洛斯基合作，組織了反對派。此一同盟為托氏的另一錯誤，因為多數共產黨員認辛、加二人為只顧培植個人勢力的投機份子，而托氏則雖列於少數，仍為一般人所敬仰。托氏之與二人合流，不獨未能增強實力，反而毀了自己聲望。我們從此感到托氏並不完全客觀，並且，無論如何，務須早早結束派系的紛爭。我們仍不忘列寧臨終時呼籲黨內團結的遺言。因此反對派未能獲得黨內廣泛羣衆的支持，史達林就輕而易舉地將它制敗。

在這些繁雜的問題中，我們何能清楚地認識到應走的途徑呢？我們年青人們，只能聽信一般才智較高的前輩。我們雖不免有所惶惑，但對於黨的忠誠不渝，並隨時願意為黨的統一而努力。我對於中央委員會的意見，總是贊同的。我們對於委員會內所進行的一些陰謀，是無從獲悉的，就是知道，為了怕黨的分裂，也只好服從。每次，他們強調黨的統一苟被削弱，反革命勢力必然乘機而起。此一論調，打消了一切組織反對派的企圖。它同時也決定性地促成了一切列寧的真正奮鬥同志的傾覆。

當人們正在進行此種辯論時，國內經濟和社會發生了若干次變動，產生了工人的不滿，使一些黨員投入反對派陣營。新經濟政策部份地恢復了私人貿易，產生了不良的效果。若干國營企業，經常被私商或芮普曼（即由新經濟政策的實施而獲利潤的人）所阻撓及剝削。一般說來：社會化工業生產品往往不能直接達到消費者，而須經過芮普曼的中飽，使價目高出於原來的若干倍。由於黑市投機，以及私人企業與國營工業的劇烈競爭，商業資本又復活了。金錢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日增，形成了墮落的影响，賭場及夜總會又在都會中出現。

賴微薄工資度日的工人們，發現他們較之專家，芮普曼，和新「資本家」相形見拙。同時，工資的差別也日見增大，少數工人獲得優越待遇，而一般水準則極低落。莫斯科的失業工人，情形之苦，一如柏林，甚至有過之無不及。工人們無力交付過高的房租，只得遷出一些較好的公寓，而淪入卑田院的生活。若干年前尚為華廈的建築，現已失修污損，無復前時氣象。

某些黨內熱心份子，對於此等現狀深致不滿。認為這較之黨統一更為重要，就加入了反對派方面。但因為我們對於這種派系之爭感到疲憊，而史達林又大量的招致一些年青而無批判思想的新黨員，反對派在一百萬黨員中，始終未能超出一萬或一萬五千人的支持。

一三、「黨的統一」勝利

一九二七年終，第十五次黨大會前夕，「聯合反對派」的領袖托洛斯基，加美列夫，和辛諾維夫，鑒於史達林總書記的官僚機構，已使他們在大會中絕無取勝的機會，遂決定從此放棄了黨的紀律，而直接向黨員呼籲。

此時，在那裏有充分象徵，證明托氏及反對派仍獲得民意贊助。一九二七年十月間，當局在列寧格勒舉行革命十週年慶祝遊行，托氏和一些反對派領袖乘汽車巡行市街，觀察遊行者的情緒和動向。他的車被人潮阻於杜里德宮前，不得通過。在宮前，陳列了一列卡車，供中央委員為演壇之用。一位警察指揮官，見了這些顯要，就請他們到空着的演壇上去。

人羣中聞說托氏在最後一處講壇上，就洶湧地歡呼着。逾千的人們，一哄而至，竟沒人理會加里寧和其他多數派領袖的卡車。派來維持秩序的警察，鑒於民衆情緒，也不敢干預，有些史達林的黨羽們跑來呵斥，想轉移示威者的同情，但被歡呼聲所壓沒。最後加里寧等不得已，只好離了自己的卡車講壇，而跑到反對派們的對面。如果人們不來歡呼他們，那麼他們只好跑去受歡呼了。但示威者仍繼續不斷地嚷「托洛斯基！托洛斯基！」

此次事件後，反對派領袖們在共產黨工人的貧苦住宅中，召開了一連串秘密會議。這些在過去若干年來任政府要職的首長們，竟不惜東奔西走，坐在有油布的小桌上，手中拿着筆記冊，對一些工人們解釋國內工業和世界情勢的問題。

當中國革命受了共產國際和蘇聯顧問的策動，一路獲得勝利時，政治熱情發展到了高峰。反對派指摘史達林與

蔣介石勾結，聯合了國民黨中的小資產階級，反對了革命。史氏確曾強迫共產黨服從國民黨，並阻遏了農民和工人的舉義。他的左右曾警告他，謂蔣介石正在對工會及上海的共產黨進行武力彈壓。拉德克此時正担任莫斯科中國大學的校長，對於一切情形很熟悉。因此他也加入了辛、加二氏來反對史達林的政策。

這些策畧的悲慘後果，不久就戲劇式的發現了。在莫斯科黨大會中，史氏曾宣佈他獲得蔣介石合作的保證。他的宣言刊出時，蔣氏在上海襲擊共產黨及工會的消息，也同天見報了。此為整個中國反共運動的開端。此一運動高潮是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對於廣州共產黨叛變的流血鎮壓。那裡的共產黨于十二月間宣布成立了蘇維埃政權，但僅能維持三天。

史達林的聲望受到尖銳打擊。反對派更加緊努力。史力不得不採取暴力。莫斯科區委會書記中，有一位名叫留丁，組織了一批流氓，拿起棒子和口哨，唯一的職務就是使反對派不能進行演說。類似的組織，奉了中委會的命令，闖進黨員們的集會中，武力驅散他們，使不得開會。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慶祝的前夕，謠傳反對派要組織示威遊行。迄至此時，格別烏特務及警察並未參與這些擾亂行動。這是因為上述的流氓組織已可以鎮壓任何變故。故史氏還不要他們涉入黨內的衝突。現在他却發動了政府機構來懾服黨內的反對。

一位支持反對派的中央委員在近紅場的入口處佔了一個陽台。在那裏有三隊示威者正集中着。在他的陽台上，懸了列寧，托洛斯基和辛諾維夫的照像。反對派都集合一起高呼「托洛斯基萬歲，反對派萬歲！」格別烏和警察跑來了，撕下照像，將反對派人們帶到警察局。

托氏的一些黨徒夾在群眾中擊走幾面旗幟，上面寫着「實行列寧的遺囑！」「反對投機，反對分裂！」「爲了列甯黨的統一！」格別烏和警察也搜去了這些標語，並將拳標語和旗幟的人毒打一頓。

托氏不會獲得紅場的入門證。他不去參加他的黨徒們的行列，却坐在汽車上無目的地在街頭駛着。在混亂中，有人開槍射擊。有些救火隊的人將他汽車上的遮風玻璃擊破。我此時站在列寧墓附近的官員看台，參加紅軍的閱兵典禮，一般的空氣很緊張。因爲預防反對派的搗亂，看台前有兩層警察保護。整個六小時的示威者入場遊行中，僅發生了一件意外。一隊中國學生對官員看台下展開了一面紅旗幟，那是他們在遊行時藏在衣服下的。旗上的口號爲「打倒中國革命中的機會主義！」這些學生後來差不多都在中國犧牲了。史達林在中國共產黨還力量很强，可以採取獨立行動時，勸他們服從了國民黨。現在時機過了，爲了恢復他個人的聲望，却又唆使他們舉事，一如廣州的慘

劇。

同時，在中央委員會的例會中，討論日趨激烈。就在此間，史氏也不讓托洛斯基發言，而授意他的黨徒將他噓下台。他經常地徵募黨員，直至全會場都充斥了受過他恩惠的新黨員。他們知道誰是主子。最後一次托氏出席大會的正式紀錄，表露了人們禁止他發言的壓力是如何的大。在叫囂中，托氏的激昂雄辯似鞭一般地落在史達林身上。此乃托氏最後一次對大會致辭，真理報紀錄他的開場語如下：

「托洛斯基說：經了目前的機構，經了目前的政權，無產階級先鋒受了新進官僚的壓迫（聲音越大，演講者幾乎聽不見了），包含着工人官僚們（騷動，噓聲），官吏們，小頭腦們，新生的產業家，國內及城市的特權知識份子……」

憤怒使他不能說下去。史達林的手下們喊着：「打倒他！打倒這個流氓！這個反叛者！」雅洛斯拉夫斯基拿起一本五年經濟計劃綱領對托氏擲去，差一點命中了他的頭顱。反對派的黨員圍上來保護他們的領袖。托氏安靜地注視雅洛斯拉夫斯基說：「你若不能用這本書說服人民，至低限度你是可以用它來打倒人民呀！」

辛諾維夫也企圖說話：「你要讓我們向黨作呼籲，對黨說話，或者捕我們入獄……此外更無抉擇。」聽眾笑了，史達林自有他的抉擇的。

黨內下級幹部中凡與反對派同情者，都同一樣受到威嚇。他們都有系統地被免職了。史達林是用肚皮政策來打擊反對派的。塞治會告訴我，關於他廠裏印刷工人對此一鬥爭的反應：

「你知道在我們這行中，失業是很多的，」一位工人告訴塞治，「此外，我還有子女，如果參加了你們而你們失敗了，我一家老少如何過活呢？」

史達林不願冒險，使反對派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的第十五次黨大會中有自白的機會，而決定先發制人。開會前數日，他藉口違反黨紀的紀律，將托洛斯基，辛諾維夫，和加美列夫三人開除黨籍。當史達林和他的右翼支持者里可夫，布加林，和湯姆斯基——這班不榮譽的勝利者安閒地上台的時候，我是一個觀禮的來賓。全場一致歡呼「黨的路綫勝利！」但這些鼓掌歡呼不免觸起憤怒的情緒。因為希望從此可以結束這個有害的鬥爭，我服從了多數。祇是爲了保證國家的安全與阻止黨的分裂，這樣激烈的步驟才可以說是正確的。

史達林沒有徵詢黨員的意見，就決定了將托氏放逐到中亞細亞。這一消息像一顆炸彈在莫斯科爆炸了。雖然事已至此，但一般支持史達林的黨員，相信事情會自己糾正過來的，不必過於操切行事。

成千累萬的同情者，集合在托氏出發的火車站，高呼「托洛斯基萬歲！」人們將他的一幀照像高置於一個火車頂上，對着他的肖像熱烈歡呼。警察和格別烏特務們和示威者相打，但當火車開行的時候，羣衆爬上車頭，結果使火車不能開動。他們兩度將火車頭拆開了。但托氏不在車上，格別烏是不肯冒險的。

托氏被押到郊外火車站，搭另一列火車出發。一批格別烏突然在他寓所出現，吩咐他和他的太太立刻出發。托氏爲了要拆穿史達林宣傳他的出行是出於自動的詭計，決心反抗。如果他們要放逐他，他們得用武力。他將自己鎖在室內不出。格別烏只好向上級請示。一位曾在托氏手下供職的特務將玻璃擊破，但他見到他從前的長官時，心裡很是難過。

「槍斃我罷，托洛斯基同志，槍斃我罷！」

「不要胡說，」托氏道：「沒有人要射殺你的，快些執行你的職務吧。」

托氏被抓出他的屋子，押到火車去，被放逐到阿爾瑪阿塔。

托氏安全地被逐後，格別烏就立刻忙起來，將一些反對派拘捕，羈禁或流放出境。紅軍內共產黨員們的一些不滿，也得平服下去。然而，現在要反抗已經太遲了，托氏已經失敗了。

在一九二八年中，反對派預料的一些困難開始出現了。政府當局要使用特殊措施來壓迫農民，將糧食交給國家。徵糧員由武裝隊伍陪護，到處搜尋隱匿的穀物。他們甚至連農民的種籽也攫奪了。暴力和殘酷的事實，不勝枚舉。成千累萬的農民都被捕入獄。

布加林，里可夫，湯姆斯基和莫斯科委員會的書記烏格蘭諾夫堅持要恢復農村區的正常秩序。他們在中央委員會形成了一個右翼，史氏一直依靠着他們排擠了托洛斯基和左翼份子。忽然，史達林又轉而攻擊這個右翼。他很狡猾地利用了一般人對於肅清左派份子的不滿情緒，來進行他的計劃，在他的鼓勵下，黨內發生了反右翼的運動，而且受到人們歡迎。

右派連公開反抗的勇氣也沒有，幾乎立刻投降了。我參加了莫斯科黨員大會。在那裏，烏格蘭諾夫，雖則以前對托洛斯基絕對不留情面，這時候却悽涼地悔過認罪，流着淚地答應追隨黨的路綫，讚揚史達林的眼光獨到。

我這時才認識他和他的同輩們業已不戰而敗。加里寧及伏洛希羅夫以前頗傾向於他們一派，而全國民衆也支持他們而不願擁戴史達林，因爲他們要求農民有生產和交易的自由，並主張農民有權藉他們的農場生利。但黨內左翼份子則反對他們，認爲對於農民的抵抗，應採用高壓手段，並以爲右派正向富農妥協。他們堅決地支持史達林的

政策。右翼的理論權威布加林，這時候是理論上的右翼的領袖，黨的機關報「真理報」是他主持的，但史達林公開地宣稱「共產青年真理報」——共產黨青年團的機關報——才是黨內多數派的喉舌。協助史達林剪除右翼的共產青年團員，後來都犧牲了。因為他們有傾向邪說的跡象。

農民的生活狀態日趨險惡。史達林的激烈手段使整個農業解體，前途異常黯淡。右派仍謀死灰復燃。托氏和數千被逐黨徒仍然暗中作政治上的聯絡，使黨內一般舊人深感不安。雖然他們禁止托氏活動，否則拘禁，但無效果。雖然論傳托氏被逐出國外，但史達林不會實行他的恐嚇。我們對於這個傳說，深感震駭，雖然我們聽慣了壞消息的。我們以前認為共產黨員間的歧見，不管是怎樣嚴重的，都比不上那劃分了共產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那麼大。但是，他們現在却討論放逐托氏——把他交到資本主義者的手裡。我雖不贊成中央委員會這樣做法，但無能為力。那時候唯一的反對派就是右派，但他們都噤若寒蟬，而且設法使他人不注意他們。

當史氏五十五生辰時，報紙用整頁篇幅歌頌功德，並奉以黨的領袖的尊號。我對此心理上又發生了第二次的惶惑。猶憶一九二四年中，他曾說過：「黨毋需領袖——它祇有一位集體領袖，那就是中央委員會。」他這言論無疑地係對托洛斯基而發的。他的見解，對我和許多反對攻擊托氏的人們，發生過決定性的作用。我現在懷疑史氏的誠意了。他的聲明不過是一種手段，主要的目的是把大權集中到他的身上。我們都被他欺騙了。

我的朋友布里揆特，也如我一樣真正地支持黨的路綫的，曾向我解釋說：「我們的黨，經過這麼多的變故，開始欠缺權力了。因此需要一位領袖，庶幾可以團結起黨員，他應該是一位果斷而深明列寧主義的人物。」我因為他們的諷勸，漸漸養成了對於黨的領袖的尊敬。

可憐的布里揆特，我可以說更無人比他那麼忠於史達林和他的「黨的一般路綫」的。這些路綫，每隔三個月必要修改一次，真可以說是彎曲的路綫。布氏後來成爲黨中央管制委員會的有力委員之一。但在一九三七年，他被列名於「人民公敵」名單中，他最後才發現黨爲何需要一個領袖。

我在莫斯科的四年生活中，健康恢復了，仍希望能夠到東方服務。當對外貿易部建議派我回波斯去充任商務代表的時候，我極感欣慰。我的兩個兒子這時候仍與母親同住烏克蘭。我已忘了個人生活，而致全力於黨及蘇維埃。但這時我仍列名於參謀部候補名單中。他們爲了我的軍事和商務經驗，向對外貿易部提議，派我赴巴黎服務。這時蘇聯政府正爲建設空軍和軍火工業，在法國大量收購物資。我在不斷黨爭的空氣中，渡過了四年的冗長光陰，故不論什麼地方，都樂意前往。一九二九年正月，我起程赴巴黎，參加蘇聯商務代表團工作。

二四、巴黎偉大計劃與黃金之戰

我深感巴黎莊嚴的秀美。我看慣了莫斯科的鮮明色彩的建築，覺得烟、霧、和年代溼遠的石磚所造成的巴黎房屋。色彩却極饒詩意。與莫斯科相對照，巴黎的生活是豐裕的、奢華的和快樂。但我對於後一個對照，並無深刻的印象。我發現巴黎貧富之間的大差別，而想到蘇聯的五年計劃完成後，蘇聯的生活水準必能提高，人們將有自由平等的享受。

但我想到蘇聯的貧民區，心裏頗感不快，因為巴黎貧民區比較蘇聯的貧民區要好得多。當然，在資本主義下貧民區是例所必有的。但我們已經革命成功了，而莫斯科的可憐情形，在我看來，社會主義的進展，最低限度在目前已停滯下來了。

最使我感覺驚奇的，却是新聞界所享受的自由。巴黎有各種的報紙，代表着各種不同的意見，就是對於最有權勢的人，報紙也可以隨意批評；就是最相反的主義，也可以自由倡導。在那時候，布什維克黨最畏懼新聞自由，而且坦白地承認了這事實。黨教訓我們：如對左翼黨派開放言論自由，很可能引致外國小資產階級勢力乘隙而入，動搖我們價值的概念，並削弱我們政權基礎。巴黎却證明了新聞自由並不危害一個擁有廣大民衆支持的統治階級，反而是安全和進步的條件。但我對這個問題，沒有時間作深入研究。我的工作很忙，而工作即等於鬥爭。

爲了說明我此後四年中在巴黎、布魯塞爾和米蘭的工作性質，對於這一個時期在蘇聯的主要因素——第一個五年計劃，不得不畧作敘述。

史達林的第一個五年經濟計劃，原是範圍很狹的。但托氏黨徒所散佈的一些非法小冊子，對它攻擊頗烈，而且獲得黨內若干人士的贊助。因此，史氏被迫將此項計劃修改，使它的範圍，超過一般政敵所鼓吹的。他所採取的新計劃，規定了一些行不通的大量生產措施。這一政策，一方面鉗了左派的口；另一方面，又使他號召黨內積極份子，來對付右派中主張緩進的人們。黨很情願地支持史達林來反對里可夫和布加林，因為後者被認爲有組織小資產農業國家嫌疑的人物。同時，史達林另有一番打算。在鎮壓黨人後，在緊急形勢下，只有進行一種偉大的努力，才可

使一般人忘却了現實生活的苦痛。

史氏反農民的鬥爭已使他走上強制農業集體化的路線。爲了實行集體化，必須設立製造農具和農業機器的工廠

。基於這個原因，更加上對右派的不斷鬥爭，在執行五年計劃中，不數月又要增加新的規定。同時，黨的官員和國營工業主管，也隨時舉行競賽，進利了各種「超越計劃」的運動。此外，史達林更宣佈了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口號。

這時候，一般布什維克，心理上都作這樣的想法。史達林的鐵腕是毒辣的，他的狹隘眼光，也許會使國家付出很大的代價。不過，困難雖然是不易解決的，但憑我們的毅力，必然可以使蘇聯獲得工業設備的。這種緊張超人的努力，再過數年後，必能將繁榮和幸福普遍地提高。

這一時期的口號是：「趕上並超越美國！」我們熱忱地想將國家在工業上造成一個新的合衆國。因此，我們毅然支持了史達林的政策。這種精神，滲入到反對派中，使許多人都向史氏投降了。他們會說：「史氏的工作雖然笨拙而且苛刻的，但這是比較我們和他的意見衝突更重要的。他做得殘酷不好，但確是在那裡做。」很少人料到史氏所用的政治和道德方法，會完全將結果改變，並遏阻了我們爲建立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工業和自由富裕的生活所作的努力。一般來說：蘇聯的建設者都忙於工作，而未俾計及後果。我們在外國的，因爲關山梗阻，情形隔閡，祇憑零碎的官方報告獲知一二，但相信雖有困難，計劃是進行無阻的。因此竭其全力以助成這偉大的工作。

將一億二千五百萬農民安插於集體農場，訓練每一農民使用農作機，和整個的農業機械化，實非輕而易舉的事。我們不獨要設立若干製造農具和農作機的工廠，還要在俄羅斯草原上建立等於美國福特廠的汽車工場，而且這些龐大工廠都是需要鋼鐵，需要電力的。我們需要新的冶煉廠，電力廠，礦山，水閘和鐵。我們需要建築數以百萬計的工人住宅。成千累萬的工廠必需建立起來。這些，需要數百萬噸的水泥和其他的建築材料。農作機和汽車需要汽油，因此汽油工業也要大加擴充。每一種建設，需要另一種建設，好比雪球自山上源源滾下來的一般。

爲着要完成這一個偉大的工作起見，我們唯一的辦法，就是自國外輸入大量的機器，重機器，工作機，電力設備，開礦機，挖油機，和鐵路火車等。我們購買這些東西，每年要付出若干億美元的代價。因此蘇聯需要黃金。國家銀行庫存不豐，我們祇得開發另一種工業，將棄置了的西伯利亞和烏拉爾山區的金礦重行採掘，但是，開礦機器也要自國外輸入，而在數年內，黃金產量難以增加。

在國內，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來蒐集黃金。在那裏，我們開了對外貿易公司「託洛辛」（註：託格辛即與外人貿易的縮寫。）凡持有金錢或黃金飾物的，顧客，可以廉價購得各種其他地方無法獲致的物品。格別烏特務逮捕了一些芮普曼時代的小資產階級，企圖勒索他們隱匿的財富。國家旅行局用「新俄羅斯」的奇蹟來招徠一些有外幣的

外國遊客，但這些方法，只獲到所需黃金的一極小部份。

列甯曾經預言：黃金的用途，在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僅限於休憩所的建築材料，但我們為獲得這種必需的貴金屬，只得加緊輸出，將一切可能輸出的東西，不計犧牲和成本，出售於資本主義國家。我們不獨輸出了原料，如：木材，麻，錳和鐵，甚至糧食也作了輸出品，雖則有許多俄國人還在飢饉中。有許多國內不可缺少的東西，如：牛油，糖，水菓和家禽等，都拿出來了，甯可使醫院裡的病人得不到這些必需的營養。這樣大規模的糧食輸出，是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烏克蘭和中亞細亞災荒的一個原因，影響到全國各地。雖然莫斯科駐有若干外國記者，但政府對於這些災荒極力掩飾，竟然能够不使外間知道。甚至在國外服務的蘇聯公民也不知道情形這般嚴重，因此蘇聯政府能泰然無愧地，照常進行輸出工作。

在這些年頭裏，一般人指摘蘇聯的傾銷政策，故意損害別國的對外貿易。真理却比較簡單，一般外國進口商都知道蘇聯急切需要黃金，因此對於蘇聯的輸出品，出價極低，往往低過生產成本。這些損失，莫斯科方面却認為不大重要，因此我們接受了交易。但駐外國貿易代表的主要職責，則為爭取高價，希望能够爭取每一個可能爭取的美元。同時，我們對於輸出品却竭力收取最多的定金，而對於機器的輸入，却要求最長時間的信用。

在每一個歐洲首都，我們進行了絕望的戰爭，信用的戰爭和黃金的戰爭，而在每一戰爭中，我都參加了工作。這種戰爭的驚險，並不下於我在布哈拉所見的反對回教游擊隊的鬥爭。

我們的信用很快就枯竭了，到期應付的支票源源而來，我們庫存黃金雖然空虛得很可憐，但仍裝成很有把握地來應付這些需要。蘇聯政府平時喜歡在國內外共產黨報紙中誇耀它的幣制為世界上最穩定 幣制，並謂蘇聯從未在商業信用上失過信的。真的，也許這是奇蹟，蘇聯發出的票據，却從未有被拒絕的紀錄。

但我却很清楚，為了挽救經常可能發生的災難，我們都做了些怎樣超人的努力。每次要作鉅額的支出，到期時，我們對外貿易官員和銀行的同僚，就如做了一場惡夢。

這一戰爭的進行和勝利，完全歸功於一個人。他若未能挽救破產，至少也使我们免除了許多可恥的和重大的糾紛。這就是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長羅生高爾茲。他的兩名助理員——劉比莫夫和魏特西爾，常川駐在柏林，担任一切商務和財政的中心工作。我們每天必要把收支細目以電話報告柏林，並於每週作一個詳細報告單呈莫斯科審核。我們雖然盡了各種努力，但好幾次仍然無法應付到期的票據。莫斯科只得派專機載運它最後的存金來。這時候，中央政治局常常召集緊急會議，聽取羅氏報告，史達林會親見羅氏工作。如果不是他有很大的貢獻，一切早已失敗了。

羅氏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以「人民公敵」罪名被槍決，他的兩位助手劉比莫夫和魏特西爾，也同時被捕，而且失了踪。

我們的商務代表團，設在主教路廿五號七層大廈中，全體職員達三百人。當我到巴黎接任進口部主任的時候，大使館的代表團剛改組了。在高級職員中，蘇聯各民族都有代表，烏克蘭籍的杜夫加列夫斯基代替了羅馬尼亞籍的拉可夫斯基做大使。商務代表團的主腦原是烏克蘭籍的比亞德可夫和喬治亞籍的姆第伐尼，繼任的是俄羅斯人杜瑪諾夫——後來又由古列維琪，一位猶太人籍的共產黨員接替了。

我們各重要的進出口部的主任們每星期在杜瑪諾夫，後來在古列維琪的辦公室中舉行「作戰會議」。古氏常常機詐地微笑着開言道：

「同志們，我向你們要求兩件東西——金錢，金錢。」

我們於是將應收未收，和應支未支的數目報告大家。有時候，我們細核了每項來源後，仍然發現款項不足。阿斯特洛夫斯基那時候任煤油出口部主任，好幾次在危機一髮中拯救了我們的生命。雖則法國煤油公司已付了鉅額的定金，阿氏常常利用資本家的好性質，請他們額外付一批定洋，超出合約一兩百萬法郎。當然這些好好先生們如果不存價款上佔便宜是不會答應的。下次開會時，阿氏就得意地將支票誇示我們。

在這些會中，我們一直想蘇聯有什麼新東西可以輸出。我們有些建議是頗聰明的，莫斯科因此開始對法國輸出高加索酒，伏爾加酒，木刻品，玩具，以及農民手工藝品。他們將俄國農婦們組織起來採集漿菓，香蕈，藥草之類，供輸出之用。我建議輸出國際圖書公司工廠所製造的鉛筆，鋼筆，複寫紙，和其他文具。在此爭取黃金的一個大戰鬥中，凡是可以增加一文錢收入的出口品，我們都將它動員了。

當我們接到國家旅行局的通知，說莫斯科已計劃一種新的輸出——人口輸出的時候，連我們最聰明的頭腦，也相形見拙了。

若干年來，蘇聯即已禁止移民出國，只有外交官員和工程師到國外替政府服務的才得出國。在法國，美國和其他國家，有成百數的俄國公民——革命前的移民，以及內戰中的白俄，他們都在外國相當地有辦法，而急於將親眷接去同住。截至目前，他們的努力，尤其是一般白俄，完全失敗。但按照國家旅行局的新計劃，這些移民，只要出得起錢，就可以將親屬接去。雖則平常一紙蘇聯護照或出境證簽字僅須一二十盧布，但他們爲親戚弄一張護照，就得付八百至一千五百美元。爲了這些數目，旅行局就不惜於必要時到西伯利亞的集中營，將一些「國家公敵

「找出來，將他們運到濶氣的親戚那裏去。有許多這樣的人，早已放棄了自由的希望，而在俄國都是不能隨時旅行的。」

我得承認，我們在巴黎的人們，雖亟想平衡預算，但對於這種交易，却不甚熱心。我們未能將這個副業充份地發展。據說，在別的國家裏，這些交易，是很受歡迎的。

法國資本家，以及英國人和部份美國人的態度是與德國人不相同的。德國人隨時都願意供給三四億馬克的長期貸款，而法國人呢，或則拒絕任何遠期交易，或則條件極苛。苟非希特勒登台，德國對蘇聯可能發生很強的經濟影響。俄國這時候正在創立新工業，如第一批機器係從德國輸入，則此後關於零件，改裝或擴充工廠設備的交易，必源源不絕，而若干監督設廠裝機的技术人才，也無疑地必為德國人。

法國人對於這種局勢，缺少遠見，殊使我驚訝。我們在法國做成功了若干貿易，但這僅是付了很高代價買來的。法國實業家如給予我們兩年的信用，他往往將貨價提高百分之四十，俾能顧到風險。縱然有如此利潤，他也很擔心，因為巴黎的一些白俄移民經常地宣傳布什維克政府不久就會崩潰。當白俄們將他嚇慌後，這些白俄深知我們無論如何對於自己的票據是守信用的，就將這些期票貼現照實價收購。後來我們財政情形改善了，俄羅斯國家銀行就請了些代理人暗中收回一些票據，因此挽回了一部份損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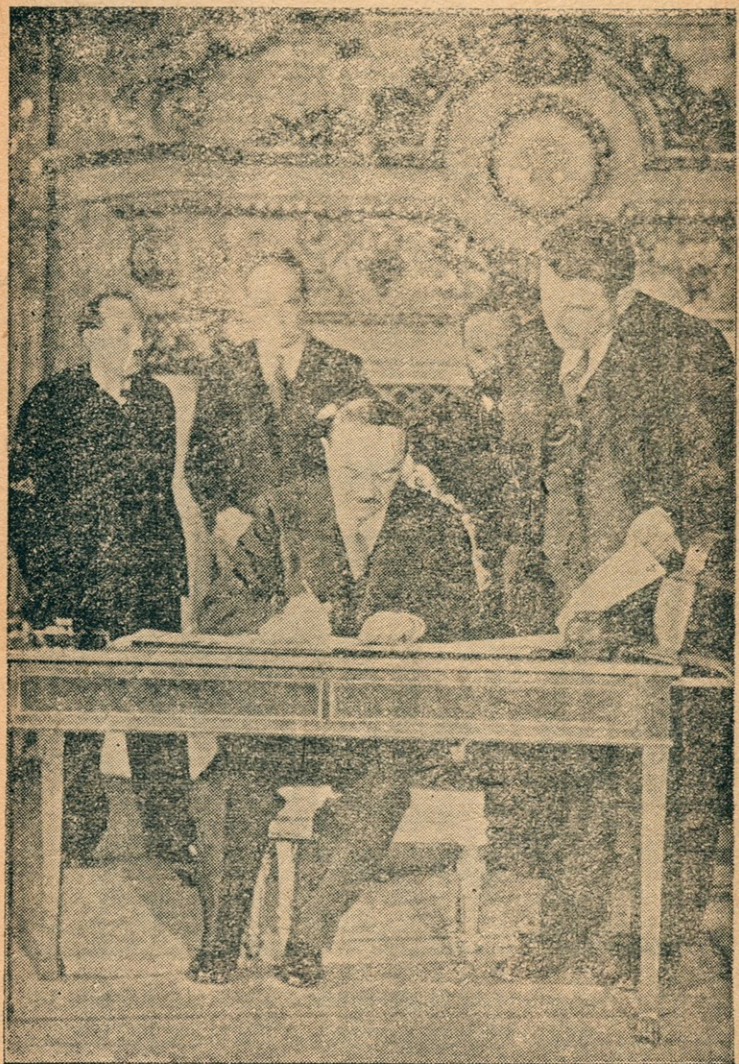
外國人這時候對於俄國情形極為隔閡。例如，我曾接洽訂購一批鍊焦煤的冶爐，供庫茲內斯克之用。我們要求在九個月內交貨，但法國公司的主任不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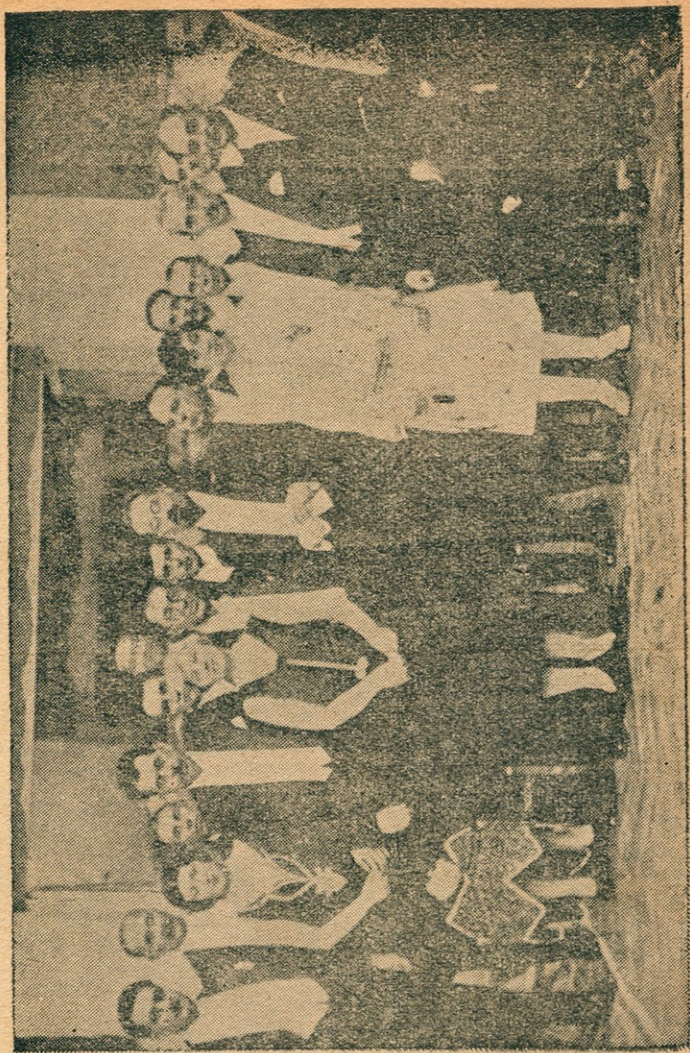
「但我剛從庫茲內斯克回來的，」他驚嘆道：「那裏還是一片荒漠。你們為何先要提貨呢？除非它開發了後，你們是用不着的，但至少也要兩年將它開發起來。」

事實上，史達林的殘忍決心，使他派了大批人到庫茲內斯克工作。其中有老布什維克，青年共產黨員，工人突擊隊，熱心的工程師，被強迫服役的囚犯，以及抄了家的富農。他們住在茅棚中，啃着黑麵包和壞白菜。但一年後，工廠就建立好了。

一九三〇年末，我昇了副代表兼進口部總監。我們工作中的法律和社會環境，不獨未獲改善，且日趨惡劣。法國法庭的判決使我們幾乎無法進行工作。當革命中，若干私有船隻，曾被蘇聯沒收，改懸蘇旗，由國家經營。這些船主獲得法庭判決，有權攫取對外貿易部的金錢、產業和存貨，俾資賠償。蘇聯大使雖曾提出抗議，但未能阻止法國警察侵入我們辦公室，並將封條貼於傢具上。同時，我們的經費、物資、產業，也得化名為一家蘇聯股份佔大

前任蘇駐法大使杜夫加列夫斯基病死於巴黎。立於左旁者爲
駐西班牙大使羅申伯，一九三八年奉召返國後，即告失蹤。右立
者爲法國總理夏理奧。





前任外交副委員，後任駐土耳其大使加拉罕（中立者），一九三七年經秘密審訊後槍決。右起第三人為土耳其總統因奴魯。

多數的合營公司的產業，藉資掩護。

杜夫加列夫斯基大使的個人天才也整天受到考驗。他曾在法國留學，法語說得極流俐，對於風土人情習俗，也極諳熟。他除了莊嚴的儀表外，有着過人的耐性，禮貌，和機智。沒有比較他更適合的人才可以担起這種保障蘇聯利益的奮鬥工作。當他歿於任所的時候，情形着實已改進了許多。

法國人協助我們建立了製鋁工業。馬利歐製鋁公司提供了技術協助。我和盧米耶簽了合同，在俄國設立了第一個製造電影片的工廠。我從法國南部爲高加索和克里米亞收購了葡萄，從阿爾及耳購了軟木，從摩洛哥購入鱗，從瑞士購入錶，從比利時購入機器，從盧森堡購入鐵，每年一共花了八億法郎。

在我浩繁的職務中，最重要的是有關蘇聯空軍和航空工業的建設。莫斯科會派了特別代表團和我合作，團員多數是第一流軍事工程師，蘇聯空軍首長阿克西斯是代表團團長，團員有杜波列夫，他是著名設計家，創製了俄國最優秀的飛機。由北極飛美國的飛機也是他設計的。杜氏在俄國主持設立了好些飛機工廠，附設了最優良的試驗室，他後來以怠工的罪名，和他手下全部的優秀工程師，都在整肅運動中失踪了。直到希特勒發動侵蘇的時候，他才神秘地出現，在蘇聯航空工業方面，再度担任重要的工作。

因爲我們購買數量很大，飛機製造廠商多數都和我們簽了技術援助合同，特許我們的工程師到他們廠內實習。我們派了人到「羅尼·哥美爾」工廠——法國最大的一家飛機廠——訂購了好幾百架新型飛機。同時，外國工程師也到俄國協助設廠製造飛機。

在俄國航空發展的初期，法國工業的幫忙很大。法國製造廠商與美國人分享了協助蘇聯建設制空權的功績。

二五、小資產階級包圍圈中

巴黎的蘇維埃殖民區是這個大同的歐洲國都中很奇特而自給的團體。蘇維埃殖民區是指在蘇聯機關中工作的蘇聯公民及其眷屬，它包含大使館，商務代表團，運輸與輪船公司，銀行，旅行局等，莫斯科蘇聯當局將這些人們派赴國外時，會使他們獲得一種印象，認爲他們乃社會主義建設者的前哨，要在敵人的包圍圈中進行工作。他們居住於敵人領域內，但應當樹立節約的生活，抵抗小資產級誘惑，和忠於職責的優良楷模。

此一殖民區的共產黨員，尙不到總人數的一半。我們的代表因有好些非黨員的專家，在革命前受了小資產階級

的商業訓練。

這裏是祖國的顯微體。雖然共產黨員佔少數，但黨的細胞是我們生活的，政治指導者。它的書記和五個人的委員會享有制立一切法律的特權。他們對於我們生活行動的監督較之在國內時更周密。

我常常出席此一高級組織的開會，並聽取他們對於日常時事的討論。他們的心理一如基督教派赴異教國的傳教士，並且他們要將社會組成像一個「篤修會」的寺院。但我們的異教徒既然文化程度很高，而生活亦愉快奢華，這班傳教士就不免將他們看為墮落了了的羅馬的情形。他們所急的不是如何吸收新教徒，而為如何才能保全自己寺院的完整，使不致受環境勢力的轉移。

除了這個小圈子的蘇維埃上流人物外，在巴黎還有一個大的蘇聯殖民區，那是指一些與俄國官方無關係，但持有蘇聯護照的人們而言。其中一部份是革命前的移民，他們自動地將帝俄護照換了蘇聯護照。另一部份則為白俄移民，他們獲得蘇聯政府特赦，經過自新後，恢復了國籍。他們一羣人縱未被認為第一流公民，至少也被漠視了的，我們從未請他們參加任何集會或招待，對於他們的生活方式，亦不感興趣。

我們小殖民區的人口大概在三四百之間。第一個問題是要為他們解決住的問題，俾能够按照黨的原則將生活組織起來。大使館只有五十多名職員，都住在使館中，因此不成問題。商務代表團的僱員佔全人數百份之八十，住就經常成爲難題了。有時，他們找旅館住。但他們想找公寓時，困難來了。我們區裏的不成文法律，規定蘇維埃僱員不能購置傢具或住宅的東西的，這是認爲一種「小資產階級的累贅」。因此，他們得賃有傢具的公寓，但這在巴黎是很貴的。他們不得已到郊外找房子，但問題又來了，因爲蘇聯職員是不許購置汽車的。

很少人敢於違反購傢具的禁令，但他們常將困難向黨的細胞提出。我某次參加了討論，認爲此項命令，頗無意義，雖則我本人住在附近一小旅館中，與此問題無切身關係。蘇聯職員在巴黎的任期，平均約爲兩年，他所付的房租的差額，在此種情形下，將三倍於傢具的價值。他的錢白花了，只湊合一些法國房東多賺些錢。我質問細胞的一些立法者，假如一個人有錢購了傢具，而返國仍可以携走，則此種「小資產階級的累贅」有何妨礙？他們不能答覆我，只說蘇聯職員在外國服務，猶如一位士兵，他是隨時都可以調東調西的。問題曾多次提出，但迄無結果。

關於汽車問題，也有過類似的討論。中央委員會對此問題是發過嚴格訓令，絕對禁止購置汽車的。理由仍不過如此。購買汽車除小資產階級的累贅外，並將使置車人陷入長期貸款的必要，因此將他拉緊在任所上。蘇聯僱員不獨要預備隨時調動，並且要做到毫無顧慮。因此，在目前外滙情形下，他既不能在莫斯科付價款，則調職時必然將汽

車放棄，而不願走開。再者，倘使他薪水尚有節餘，就應將它寄回國內，俾增進外匯的平衡。

我們的爭論，是假如職員不許買車，他們會將錢浪費於更無益處的東西上。事實上，有好些眷屬都買了貴重的衣服和時髦的皮大衣。我們對於普通常識的主張，獲到莫斯科方面一個意外的反響。中央委員會決定，既然許多的人想購汽車，他們的待遇怕是太高了，從此，薪水普遍減去百分之卅，存於莫斯科，按蘇聯幣值調換外匯。

一年後，我們將住的問題解決了。代表團在布地蒙特找到了一所十一層大廈，購置傢具，將公寓佈置起來。僱向代表團租賃他們所需要的房子。因為職員都集中一起，此一大廈不久就獲得「巴黎蘇維埃屋子」的綽號。雖然這所大廈使我們區裏的人更和都會裏不良影響隔絕起來；但它使白俄報紙獲得許多閒話的資料。這些報紙中，經常有一欄登載「蘇維埃屋子」的內幕新聞。他們對於某一點尤其常作譏評。

我們區裏的人們，或是相互間，或對外人，輒喜提到他們不慣於住在這種「可怕的資本家包圍圈中」，和他們夢想回到祖國的思鄉情緒。這些話也許說得太多了，不免使人起疑。白俄報紙就指出俄國的物質情形很惡劣，而蘇聯職員在巴黎的生活，遠較一般同階級的法國官員優裕。他們的訴苦，似乎不太真心罷！

在我們黨的細胞中，無人敢於質問這種情緒的真偽，我們訂了一條規則，服務達兩年的職員，必須回蘇聯渡一次假期。大家對此規定都很歡迎，並無人建議想去法國里維耶拉去，那是比較舒適而安靜的。我想不透為何人們不承認我們在此的生活享受遠較我們過去的生活優裕。這種坦白，並不致損及我們的忠實，却可以省了許多偽善。

我們的待遇，並不特別優厚，生活亦非奢侈。在代表團中，低級職員的薪水也許較高於法國商業機關。我們的打字或速記員，月薪為七十五至一百美元，會計或售貨員自一百廿五元至一百七十五元，較法國待遇約高出百分之五十。但我們主管七員的待遇，包括進出口部門主任，及其他上級官員，則在二百至二百五十美元之間，雖則他們所做的業務年達數億法郎之鉅。當然，這些薪水較之法國同等人員的待遇，是極為相形見拙的。

我在巴黎的生活很樸素，一方面因為我素不浮華，一方面因為我將三分之一的月薪（初為二百美元，後來增至二百五十）寄莫斯科供兩子之用。彼時對外貿易商店尚未設立。雖盧布貶值，而人為的匯率迄未改變。食物缺乏致物價高漲。我母親往往要付出三至五元才能購到一磅牛油。

我住在馬得蓮街旅館中一間閣樓，因為早出晚歸，無需住公寓，當一般低級職員下班後，我們仍須辦公，星期日亦如此。

每星期有一兩夜，我們黨的細胞在大使館開會，討論各種國內時事問題及我們在巴黎的工作和生活。此項細胞不對外公開，除討論外，亦無他種活動，但每人均熱烈參加，每次開到清晨二三時。

當我們走出大使館時，仍然高聲地用俄語爭辯着。法國警衛往往瞪視我們，又呆又疑惑。「這些神經病俄國人！」爲了改換空氣，我們到蒙巴那斯大街的東、曲浦喝一杯啤酒。在那裏我的腦子仍被五年計劃的辯論眩昏了，環顧一些法國的浪人，歡樂地高談闊論，和一些賣笑的女人翹待地坐着。他們似乎是另一世界的浮光掠影。

我們難得有時間過私生活或作娛樂，並且總是太倦乏了，無心做任何個人的創造工作。下班後，蘇維埃屋子的人們，如不出外看電影，就互相在公寓中飲酒，唱歌，或玩紙牌，直到深夜。

在稀有的週末，我可以自由支配，就到巴黎一些名勝地方參觀。我對於盧佛畫苑，盧森堡博物館，克隆尼，和聖母院教堂，都感到極深的興趣。羅丹的雕刻之力和美，也使我獲得極深印象。同樣的，我佩服法國人的透視法的高明。從盧佛遠望到凱旋門，和凡爾賽的台階，都是最美麗的遠景。

電影對於我不獨爲娛樂，且爲藝術及教育。我在莫斯科時不能看到許多西方歷史的名作，如賈波林的「尋金記」和「大馬戲團」，因爲它無法在那裏上演。等我到巴黎，這些片子又過時了。此時全巴黎都在看亞爾喬遜的「爵士」歌王。那是一部美國的初期有聲電影。我耐性地翻閱報紙，來找這些影片在郊外小戲院中重映的日期。

某夜，我從細胞會上偷出來，坐了街車到麥尼蒙丹一家小戲院去看「尋金記」。片子模糊，放映機也不行，但我對它的欣賞遠較一些巴黎的時髦影戲院更多。不久，我又看了兩部葛萊菲斯導演的名片「建國」和「復仇」，那都是電影藝術時代的作品。

我在巴黎的第二年中，因爲工作上的需要，參加了工藝學校的夜班，學習工業化學。因此，我更無暇享受巴黎夜生活了。同時，我們黨部的委員會鑒於同志們的週末生活和娛樂缺乏健全組織，決定每星期日，區裏的同人都是郊外參觀名勝別墅，教堂，及戰場。而晚間則舉行音樂式跳舞會。這些會是在代表團的地下室舉行的。

晚會的另一目的爲促進蘇聯和法國僱員間的友誼。我們有兩百名法國同事，他們在工作時間內，同我們都很生疎的。這些人都是法國共產黨所推薦的，或爲他們的朋友或親戚。蘇聯政府爲避免貿易機構和法共發生任何公開關係，決定了凡爲我們工作的法國黨員，都得暫時脫黨，並停止政治活動。其餘的法國職員則對政治並無興趣。但問題是我們晚會應包含那些節目呢？

法國人很自然地建議找一個爵士樂隊開舞會，跳流行的狐步，探戈等。但狐步及探戈在蘇聯是認爲「小資產階

級腐化象徵」而禁止的。蘇聯在國外工作人員也不許跳。因此難題來了。

起初黨組織決定實施此種規則。在第一次晚會中，樂隊奏了華爾滋及波加舞音樂。但法國來賓和樂隊都不起勁，晚會完全失敗了。

下次，黨裏人決定折衷辦法。樂隊可以奏狐步音樂，來賓可以跳；但蘇聯職員們則不許。因此，我們得乖乖地坐着看法國人跳狐步，要等到樂隊奏華爾滋或波加時，才能加入。當然，主人和來賓都覺得很窘。

我想這種幼稚是沒有什麼好處的，就決心使我們細胞的委員們感到一點意外。杜大使和我要好。我帶了一位比較開明的老布什維克依凡諾夫去訪問他。

「我們如果將階級辯論認真，」我半笑地說，「就應當禁華爾滋而不禁狐步，因為後者為被歧視的黑人所發明的。華爾滋則正為貴族的舞，——流行於歐洲宮廷。」

讀者中曾經在真理報看過馬克思主義者反對狐步舞的論調，必不能贊同我的看法。但我佔了卜風。第二次晚會中，樂隊奏起狐步舞樂時，杜大使，依凡諾夫，我，和布萊斯拉夫請了四位法國女賓下了舞池。我跳得不算壞，因為前三晚我特地到跳舞學院學習了一番。

我們那晚興致都很高，並沒有出什麼亂子。整個晚會進行得很順利，直到天曙，連樂隊也很滿意而歸。我們的道德家沉默了。但兩個月後，聽到關於此事的一些奇怪反響。我從中央委員會國外局的一位朋友處接了

封信，其中說有人報告，說雖則巴黎的工作很忙，但有些人，連我也在內，還費許多時候在跳舞上。當然他不信此說，但囑我最好謹慎，俾不致損了名譽。

此時我每天從早晨八時工作到晚間一兩點鐘，同時還在工藝學校上課。我很煩悶，拿了信去見杜瑪諾夫。「不要緊，」杜氏說：「我正向莫斯科請求批准昇你做進口部監督。對於你過去及現在工作的成績，都詳細呈報了，那會要制止閑話的。」

我的昇遷很快地就得到批准了。

巴黎白俄領袖庫提波夫將軍被綁架的事件，使我們紛擾了六個星期之久。我對於庫的遭遇一點也不清楚。假定他被格別烏綁去了（證據似乎如此），那是與巴黎的蘇聯官方完全無涉的。

但當時輿論，則認我們和格別烏同爲此一事件的兇手。白俄移民們都很激昂慷慨。保皇黨的報紙伏茲羅茲丹尼也鼓勵移民中的軍人們採取激烈行動。移民組織的職員們在格倫芮街開會，我們接到警告，據稱他們要攻擊使館。

杜大使宣佈緊急事態，黨員們都武裝起來，日夜在大使館輪值佈哨。假如有人襲擊，我們是不惜以武力來保衛此巴黎中心區的一塊蘇聯領土的。

我記得同大使館秘書地維可夫斯基睡在使館樓下。當伏洛夫斯基大使被刺時，地氏曾在洛桑受了傷。他是一位很神經質的人，睡眠極壞，半夜裏驟然驚覺，手中拔出槍來。杜大使則極沉靜富於自制力。某晚，使館外有示威遊行，法國警察都走光了。我和大使立於大門後，準備它隨時被突破，並且將手槍的保險掣也開了。但示威者並未進來。從國內傳來的稀疎消息，除了報導關於新工業建設的驚人成功外，對於成功的背景描得很悲慘。強迫集體化，富農的逮捕和放逐，對於知識份子的苛刻手段，黨內的磨擦，麵包票制度，配給品的減少，邊遠地區的暴動，——這一切都使我們感到不安。在國外的商務代表團中，若干非黨員的專家，在此時奉召回國，但他們都拒絕不去。其中有許多人加入了外國商行，因為回俄國是等於放棄舒服的生活，並且要招認在國外的行爲和作風。許多人並非基於政治上的反對，但決定抗命。中央委員會鑒於此種情形，就決定開始一切駐外使節及商務代表團的清除運動。

中央派出的清除代表團訪問了每個歐洲首都，毫無情面地調查蘇聯代表團的人們。每人心中都懷着恐懼。他們將各人的私生活，娛樂，過去成績，個人出身，契約，種種情形都翻了出來。在一次會中，他們介紹了我們和使團相見。一位老年粗暴，氣焰極盛的團員，開始質問我們，似乎我們都受了小資產階級的腐化。我生氣了，不禁直言無忌地挺上去。而結果則殊出人意料，莫斯科中央委員會推舉了我當黨的細胞的書記，我畢竟當選了。在一百名共產黨員中，經過此一代表團考詢後，只有十六人逃了譴責、開除黨籍、或奉召返國的處分。

爲了使我們不受小資產階級影響起見，他們建議我們只讀法國共產黨報「人道報」。白俄報紙「波斯列尼亞」和「伏茲洛茲地尼」是絕對禁閱的。我們中間很少有人看得懂人道報的，而其餘的人，如奉行此項法令，就得從寄來很遲的莫斯科報紙中找新聞。新的命令強調說，讀這些巴黎的俄文報，縱不受它們影響，也等於津貼它們。但命令沒有多少效力，除了胆小者外，一般人暗中買它來看。

我覺得此種情形，較之報紙內容，更有害處。當選了書記後，我就決心糾正它。我和杜大使商量後，獲得一項合理的解決辦法，我們決定相信我們區裏人們有抵制白俄宣傳的能力，取消了禁止閱讀的命令。同時，我們關照職員俱樂部，每天訂了三份白俄的報紙，陳列於圖書室，供同人閱讀。

我在此時，極力想糾正我前任所鼓勵的一些偽善和自欺。杜大使很贊助我，並且當我在黨細胞會上受到一些澈底派的攻擊時，他往往支持了我的立場。我們二人成了摯友。我常到大使館中，與他一道消磨很多時間。杜氏很

有文學修養。有時我們一起打撲克。杜，我，蘇聯銀行巴黎分行經理牟拉丁和阿斯特諾夫斯基。牟拉丁現在監獄或集中營內。阿氏則失蹤了。杜大使則在整肅運動發生之前死了。

有時，我們在大使館的客廳內遇到巴黎總領事庫茲明。他也是一位革命中的老兵，他的命運是很能象徵那個時代的。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庫氏在巴黎住過一段很長的時期，在列寧之下爲職業革命者。革命後，他指揮紅軍在白海及阿堪遮一帶與米勒將軍及英美遠征軍作戰。他以移民的資格，很想舊地重遊，一嘗蒙巴拉斯及蒙馬特的風光。黨就樂成其志地派他來巴黎。他認爲只要呼吸一口巴黎的空氣，也是無窮的樂趣。

其次，他回到莫斯科時，很愚笨地告訴他的朋友伏洛希羅夫，他如何厭倦小資產階級國家度移民的生活。在布什維克圈子內談這種話是認爲很得體的。他回來數星期後，獲到一封電報，使他啼笑皆非。原來伏洛希羅夫爲了幫忙他，告訴已派他在西伯利亞任軍職，庫茲明只得逆來順受，束裝返國。

過慣了多美和洛東的夜生活，衣爾庫斯克和克來斯諾雅斯克的枯燥是不很合式的。他在這遼僻的軍職中，和一位女人發生了不幸的戀愛。隨後，他被派到阿堪遮主持一個北冰洋航運公司。不久破冰船「西比利亞可夫」號沉沒，在一九三六——三七年，他們將這件罪名套在他頭上，但真的罪過，則爲他當內戰期中曾和辛諾維夫有交誼。因此，庫茲明，這位最超然法國化的俄羅斯人，被控爲「人民公敵」而被清算了。

二六、米蘭——倫敦——布魯塞爾

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一年派我做駐布魯塞爾商務代表。比利時此際尙未承認蘇聯，故商務代表亦是半官方式的外交代表。爲了辦理必需的簽證手續，我要等幾個月。當我在預備期間，他們先派我去米蘭做進口監督。

我到達後，就去西西里接洽購買五百萬個檸檬。雖則無人獲悉此行的目的，但我才到巴勒摩及密西那，檸檬的出口價格就漲了兩成。這是很恭維我的，但非我所望。我決定裝作普通遊客，到巴勒摩附近小邨中休憩，並調查市况。當這些出口商相信我不要檸檬時，價錢也恢復了正常。我並且用我的手段，獲得了一些便宜。我那時不懂義文，而密西那商人的法文也不像樣。但我們仍進行得很好。

法西斯義大利對蘇聯頗表友善。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中，義大利接了好些重要的訂貨單。這些商行給我們長期的

貸款，而且索價也較英美的貨品低廉，並供給我們許多優良的機器。蘇聯技術家認為義大利雖一直被列為落後國家，但戰後進步甚速，且已享有最新式工業設備。

我們購了飛雅特汽車，飛機發動機，造船設備，和輪船。威尼斯熱那亞，和的里雅斯，德的海軍船塢都為蘇聯造了許多船舶。我遍遊義國各城市，會晤了許多實業界領袖。我原想從老海軍上將齊亞諾伯爵那裏購買幾條船，但我們要求五年的信用貸款，而他只允三年，因此未能談妥。我和飛雅特工廠的厄內利上議員及電氣工業領袖班尼的談判，則較順利。

我在近代化義大利所見到最驚險的一幕，就是米蘭的空戰演習。三百架「敵」機，在黑夜中向米蘭進襲，投下烟火。這是一次很偉大的演習。它使我認識在空戰中，攻擊者佔有很危險的優勢。就是設防的城市，也要受到很大的破壞。雖然經過此種演習和義大利的道赫特將軍（他是空中閃電戰的先知）的著作宣傳，但一般民主國家拒絕了此種教訓，迄至希特勒的空中閃電戰使他們受了極大的犧牲。

莫斯科此時派了一位共產黨工程師普欽，來幫我訂購一批機器。他是一位年青的科學家，專心致志在比亞德可夫領導下，建設化學工業。一九三六年，他的名字不知何故列於十六名辛諾維夫審判案中而被槍決了。

我的兩個兒子那時就讀於莫斯科附近一模范學校中。我在義國時，一位朋友前往探視他們，寫了封驚人的信給我。「空氣很好，學校位於一個松林中。但學生則飢不得食，且紀律全無，打架詬罵，無所不為。較長的男生甚至與女生發生不良關係。」當我在巴黎服務期中，曾一度返莫斯科，對於俄國實際生活情形，畧有所聞。蘇聯官方報紙及外國同情的刊物，則不斷宣傳蘇聯一般水準都在提高，它已成爲人類的樂土。我朋友的信和自己觀察，使我決定將波里斯及舒拉接來同住。他們現在快八歲了。

我在米蘭車站接了他們。他們變了多麼孱弱的小東西，穿了這些艱苦年中一些可憐的衣服啊！伴他們旅行的一位女友告訴我，當他們到了維也納車站食堂時，看到那麼豐盛的食物，都驚呆了。那是他們青年生活中從未夢想得到的。波里斯驚愕地問：「他們做好了五年計劃嗎？是否因此獲得如此豐富的食物呢？」這句話常被人們在莫斯科提起並且傳播得很遠。

七個月後，我去比利時的護照辦好了，就動身上布魯塞爾。我將兩個兒子安置在比利時海濱一家寄宿舍中。比國當局決定不承認蘇聯的存在，拒絕在外交護照上簽字，當然我的外交護照也是不能成立的。他們在另外一頁上簽了字，但有效期間僅一個月，過此要重行申請展期。因此我在比國不能有正式地位，只能以私人資格經營

商務。銀行及重要工業機關都抵制我們，這是因爲革命中比國商人利益在俄國損失極鉅。同時，若干比國商人仍要求保留他們被沒收產業中名義上的主權。遲至一九三一年，某比國冶煉公司的週年報告仍稱「我們視察員未能獲准訪問烏克蘭境內宇佐夫加地方我們的一些工廠，因爲它們暫被布什維克佔據。」但生意總是生意，因此比國人向我們買了鐵產和木材。他們也買了牛油及罐頭魚，兩者都是訂價很廉的。比國人員則拒絕和我們發生接觸。有些比國政客們，感到局勢的荒謬，自願爲我們居間人。例如：受我的委託，某國會議員寫信給外交部長海門斯先生，請示蘇聯船隻如進入安特衛普海港是否有被沒收的危險？海門斯先生保證決無危險。但他的回答非向我提出，而係向他的國會同事提出的。

我在布魯塞爾結識了兩個新朋友——社會黨議員瓦特及皮拉德。他們助我尋獲了一九二四年我由雅典赴那不勒斯途中同船的文德金斯博士。在他殞桌上，我們重提起八年前地中海上海上關於政治的討論。

我們兩人都有點變了。文氏感到五年計劃的成功似乎漸漸同意我的說法，認爲布什維克暴力，無產階級專政和史達林的毅力和專制政策，已經產生效果。當然他對於這些成功的代價和犧牲是不大清楚的。一個世界上最落後的國家，不是在我們目覩下，變成了社會主義工業國家嗎？另一方面，則我內心感覺疑慮。我親眼看見兩個兒子，在艱苦環境下，得了貧血症和完全失去健康。我也看到在鐵的需要下，和更苛刻的黨的紀律下，一個被吸枯了血的，實行配給的莫斯科。因此，我懷疑爲工業勝利而付的痛苦和疲憊的代價，是否太高，和終極政治上的影响，究將如何？

也許我的同伴業已忘了八年前所談的一切。但我回憶過去，則很可見到一些大的轉變。一般革命老戰士，鑒於史達林的日趨墮落，覺得心灰意懶，堅定地反對他的獨裁和官僚作風。一些改良派，溫和派，及自由派，從前一直反對革命，現在看了極權國家的成功，也躍躍欲試。在我們談話時——一九三二年，德國威瑪憲法，已經漸漸成尾聲，一般改良社會主義者亦無法挽救其危病，而此種危病，則似乎逐漸波及於整個民主世界。蘇聯，在另一方面，則正竭其全力，以建設它的偉大工業前途。此一對照，說明若干自由主義者爲何對史達林的俄國，發生了新的熱望。

雖然困難很多，我漸漸地將貿易推動起來。我簽了出售石棉和錳的合約。我們的木材輸出做到很大的數量。不久，莫斯科派來一位助手，他名叫耳字夫，是一位愛說話，很自負的青年，但不懂法文，不明一般商業，而尤不精於木材業務，他以前曾在黨的分委會作過宣傳工作。我不久就發現他之獲得此職，因爲是勞働人民委員長濟康的親

信的關係（濟氏的名字早已湮沒無聞了）。耳字夫不時將一些襯衫，領帶，絲襪之類的禮物，經外交信袋，送給他的老上司。

公開的批評愈被壓制，秘密徇私就更盛行。真的，大家都聽到相互批評，但這不過是單方面的，從上級批評下級而已。它的主要用途，只是爲了上級獲罪後，找人來做替死的羔羊。關於徇私，我可以舉兩個例證。

亞斯穆斯之被任爲駐赫新基公使，完全因卡根諾維治的提拔。亞那時在維也納使館爲隨員，卡氏爲中央政治局委員，到奧國就醫，亞對他招待很週到。李維諾夫原擬派他做領事，但政治局的命令發出後，却派了他任赫新基的要職，使一般人都感到驚奇。

阿斯特洛夫斯基任駐巴黎商務代表時，曾被一些俄國移民申通蒙蔽，在一筆出售木材的貿易上，損失了數十萬法郎。羅生高爾茲將他撤了職，並寫了一份不利於他的報告，連有關證件，送呈黨的管制委員會，建議予以處分。但阿氏爲伏洛希羅夫的寵信，因此被派到布加勒斯特爲大使，管制委員會毫無辦法。

比利時人對於我們的交易，完全不予信用貸款，因此我們所購物資較之出售者爲少，對他們的貿易收支，頗爲不利。蘇聯既不能在比國有正式商務代表，故我計劃組織一比蘇合營的貿易公司，由雙方投資，或至少在股東方面加入若干比國人。此一公司直到我離開比國後，才正式成立，但非完全基於志願的。

我留比數月後，即獲得訪問倫敦的機會。我對於此一偉大英國首都，極感興趣。英國小說的俄國譯本早已使我獲得若干先入的想象，如迭更斯和吉卜甯的大名，如貧窮，僞善，秩序，傳統，某種的和善，偉大等。我第一次看到白崖，感到親切的激動。我不久就迷失於此舊世界最大首都的漩渦中，看到各種類的情形，浮動着最好和最劣的，而最顯著的特點，則爲一般人民都有高度紀律心，對於私人的權利，特別尊重。

我自倫敦歸來不久，即被召赴巴黎，但在由布魯塞爾去列日的火車中，聽到杜美爾總統被俄人行刺消息。俄國人嗎？我們蘇聯駐外官員常爲猜疑忌嫉，甚至誤會的目標，使我立刻想到可能的一些糾紛。我決計中止旅行，折返布魯塞爾，應付一切。果如所料，一般右派記者都將此事連到蘇聯身上。但他們很失面子，因爲第二天就宣佈了刺哥爾古諾夫，是一個法西斯瘋子或是瘋的法西斯份子。有些朋友告訴我，謂巴黎的蘇聯大使館也如此的想法，預備了防衛，安排哨兵，一如事變的時候。

回到布魯塞爾後，我發現我的辦公室及整個公寓被翻得零亂不堪，我的住處所受的強暴摧殘，使我發生一種反抗的心理。我的一切東西，無論如何微末，都飛滿地上，受過踐踏。抽屜開得空空的，帳簿丟了，衣物亂擺在地板

上，箱子的鎖也打開了。有好多書信及照片也不見了。保險櫃上貼起了封條。我在桌上發現一張字條，囑我立刻到警察局。

在司法宮內一位巡官頗無禮貌地接見了我，連椅子也不讓我坐。我在開始抗議這些侵入和搶劫的暴行前，自己跨在一張安樂椅上坐下。

談話在緊張中開始。

「你用侵入兩字，」巡官咆哮說：「就是侮辱我的人，他們是奉命而行的。」

「我無意指摘你的手下，」我說：「但我毋須否認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遇了一件很笨的打劫。這是後來我才發現我受了不合法的搜查，而這種搜查又是用了不必要的暴力執行的。我們既然置身於文明國家，可否向你指出這裡還有像人權的東西嗎？」

我開始了解，原來搜查命令乃蒙城檢察官所簽發的。我既未到過蒙城，在那裡亦無友人和書信往來。蒙城此時礦工正在罷工，發生了若干意外，噓辱了社會主義黨的部長樊得維爾，將好些警察投入運河中，並幽禁了一些工程師在辦公室裏。誰的主使呢？他們從未想到，也許工人們太不滿了，所以自動地開始暴動。不會的。此時在布魯塞爾正有一位布什維克官方代理人，他也許白天裝做生意，而夜間則在遠的礦山上策動搗亂。

那就是這位官員的思想程序，並且，基於此一理由，他覺得應將我的住所施以搜查。我的抗議激怒了巡官。使他相信我至少是共產國際一個危險份子。當我正在隣室等候我的私人所有物時，我發現兩三名便衣警察挨我身邊走過。我伸手摸我的褲袋，他們趕來攔我，但發現我僅取出一隻毫無危害的香煙盒。

他們待陪我回家撕封條並檢查保險櫃。我當然不願請他們坐在我的公事汽車；更不願坐到他們的車上，那是一部囚車。

「好罷，」我說：「你坐你們的車，我坐我的。」

「不可能，我們不能讓你離開視綫。」

「我難道被捕了嗎？」

「沒有的事，但法律不許我們離開你，直到封條取去為止。」

「好，既然我不是你們的囚犯，那麼，你們是我的了。」

我們折衷地坐街車走。

我的保險櫃完全是空的，他們眼睛從頭上跳出來了。驚奇——失望——佩服。顯然，我在貼封條前或以後，就將櫃子弄空了。好巧妙的詭計。

莫斯科獲悉我的一切後，召我返國報告詳細經過。我在那時正集中全力計劃列寧格勒——安特衛普的航運綫。雖然此項計劃很重要，而且我又聘了一位名律師賈思柏幫忙，但比國政府只允給我一個月內有效的回頭簽證，這是不夠時間我來回的。我知道這位警察巡官一定對我的傲慢態度不滿，上了不利的報告。

「這是警察局在那裡搗鬼。」我的比國友人告訴我。

「爲了蒙城罷工嗎？」

「特別是你使他們失望了。他們認爲你是有嫌疑的。」

我將孩子們留在俄斯坦德，逕回莫斯科。對外貿易部核准了我的列甯格勒——安特衛普航綫計劃。我料理些別的事務後，就動身返比國。但我的護照過期了，因爲要在柏林申請新的簽證。比利時總領事很難爲情地告訴我，他奉了命令拒絕發給簽證，而且不許我越過比國邊境。

「但我的兒子還在比利時哩！」我驚喊着。

「我很抱歉，但愛莫能助！」

我的兩個孩子受了一切戰爭的光榮，他們的出走很像戰俘的交換。一位駐巴黎商務代表團的官員特地去比國將他們護送到德國邊境，在那裡我迎接了他們。

我後來才多少明白了此一喜劇的背景。一位前格別烏特務名叫亞加貝可夫的，在近東一帶將反間諜工作做得一團糟以後，就投效了比國警察，做他們關於蘇聯情報的主要密探。他得不到消息，就製造一些。爲了保持地位，他有時自己招一批假格別烏，隨後向政府告密。因此，他認爲誣指一位蘇聯官員與蒙城罷工有關係，是不算一回事的。

三年後，比國承認了蘇聯，派了大使駐莫斯科，並且接待了駐布魯塞爾的商務代表團。比國駐雅典的外交官也友誼地訪問我。我們閑談了關於布魯日和干特的風景，以及布魯塞爾司法宮建築的宏麗。但我爲了顧全我同僚的情緒起見，從未提及這一段不幸的往事。外交的風雲轉向了。

在此我想提出另一觀感。當蘇維埃政權尚在窮苦革命中掙扎時，外面一些關於它的外交官或商務代表對於工潮的干預，大都爲故甚其詞的。事實上，共產國際自有其與莫斯科交通的途徑，而格別烏也有它獨立組織。我們外交

叫及商務人員儘可能地埋頭於自己的合法的工作中。當一般外國輿論不斷地攻擊並懷疑我們時，真正作宣傳及滲入工作的代理人們，正在國外毫不受阻礙地推行工作。

另一方面，蘇聯政府既已躋於強國之一，經濟較前充裕，黃金產量亦增至可觀數量，而史達林政權又毫無道德觀念，不惜一切手段，俾擴張權勢，因此蘇聯正式代表們也做了許多極不合法的勾當。格別烏後來就利用了外交及商務代表，並非為推動工潮或罷工，而進行在外國警察的視綫下，明目張胆的侮辱和殘暴政治暗殺事件。此類事件在法國，瑞士，西班牙及墨西哥，都差不多毫無阻礙地發生過。

二七五年計劃下的真况

我回比國的企圖失敗後，莫斯科只好召我返國。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我被任爲「史坦科進口部」(一個專營機器工具輸入的信託組織)的第一副經理。此一公司從全球各地購買工廠設備。進口物資的大部份是用之於現正極力建設的航空工業。

在我出國四年中，僅一度在莫斯科作長期勾留。那是一九三〇年的夏季，我出席了第十六次黨大會。此次中央委員會邀請了駐歐洲的柏林，倫敦及巴黎三個最重要的黨的細胞的書記，以來賓資格參加大會。

縱然人們對共產主義有很深的信仰，對於當時情形也不能無動於中。經過一九二二——二八的改良後，莫斯科起了可怖的變化。每一個人和每一所房屋都顯明地表示愁苦，困乏和灰心。商店幾乎絕蹟了，在剩下來的一些間商店，其櫥窗的陳設也顯得極淒涼。它們僅有些紙盒和食物罐子陳列在外面。店主們爲了失望，貼上紙條，標明係「空」的。人們的衣服都是做舊的，質料更劣到不堪形容。我穿起巴黎裏的西裝在街上走，很覺自慚。一切都缺乏，尤其是肥皂，蔬菜，肉類，牛油，及一切脂肪食物。

我很驚奇地看到人羣在糖果店前候着，同道者走馬看花地觀光了俄國後，也許要說出一些很動人的故事。那就是在此一社會主義樂園中，人們不排隊擠麵包，而是爲的買糖菓。事實却並不如此。飢民無從果腹，就是糖精和大豆做的甜東西，也只好拿來吞嚥。在那裏實在沒有別的可買的東西，但每磅糖的代價也要一天的工資。

製造品及食物較錢稀少，而錢又較職業稀少。誠如國外宣傳所稱，在蘇聯沒有失業者。但專靠工人工資來維持生活，此乃世界上最苦的事情。房荒空前地嚴重。在空洞的合作社前，成群的人們日夜排隊等待着，希望配給可憐

小數的食品。在任何其他地方，出賣這樣壞的東西是會被人咒詛的，而且必然破產。與革命初期不同，鄉間的情形較之大城市更惡劣。

我對於此種危機的物質證明感到很震駭，凡屬任何與五年計劃有關的人們，如一般共產黨員，智識份子，技術專家，和工人們，都是神經緊張，使我不安。人們的臉上都顯露憂鬱和疲勞。他們的心中都似乎不能再抑制情感。每人都遭遇了各種難關，亂哄哄的命令，行不通的事，復發的困難，堂皇的說話，迫切的需要，恐懼，疑慮，糾纏不清。

我在中央委員會所辦的馬利諾休息所住了幾天。就在那裏，前時的歡笑和興致也消失了。我所遇的都是面容戚戚的人們，所聽到的都是低聲，默氣。他們都似乎神疲力竭，情緒頹唐。我在此地遇了一位列寧格勒來的年青馬克思教授比里哥辛，他在英國時和蘭斯布里的女兒結了婚，後來做了莫斯科哲學及歷史學院院長，但基羅夫事件發生後，他就失蹤了。我怕他也和辛諾維夫的朋友們一起消滅了。蘭斯布里的女兒的後來情形如何，亦不得而知。

我參加了中央委員會組織部的會議。在法律上，組織部和中央政治局有同等的重要，一個處理行政，一個處理政策。組織部由中委會的五個書記和工會書記及青年運動書記所組成。加馬尼克代表了軍隊。卡干諾維治做這次開會主席。羅生高爾茲的助理，費了兩月光陰預備了一篇報告，說明我們在國外代表們的人事情形，和逃職的原因。卡氏祇給他六分鐘做報告。別人祇獲到兩分鐘，而若干人則完全無發言機會。

我們的對外貿易委員長羅生高爾茲看來仍年青。他穿了半軍裝的襯衫和皮靴。他拿出一張貿易部的人事名單預備向同僚宣讀。卡氏似乎在奇怪他的大胆，阻止他下去說：「我們再談罷」。雖然表面上開會是要交換意見，事實却沒有意思見可以發表。他作了最後決定，將國外服務人員裁減一半，並派兩百名忠誠可靠的黨員到駐外人員中工作。當我離開會場時，對當時情況已瞭如指掌。凡關於一切重要問題的決定，商量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大權完全握在史達林親信手中。

在第十六次黨大會中，並無重大事故發生。會場是擠得滿滿的，在那裏像開運動會地有不斷的歡呼，但連一次重要辯論亦未舉行過。史達林作了關於世界大勢的報告。他的講話也如往常一樣，不甚高明。他帶着喬治亞的重音，不時舉臂作手勢。他預言了共產黨在全世界行將獲得勝利，和德國革命的降臨，附帶指摘了法國參謀部對蘇聯的侵畧陰謀。

我深深地感到愁鬱，但不敢暴露我的情緒。最壞的就是史氏的一字一句都獲得熱烈的讚譽和鼓掌。這很明顯人

們所說的和所想的是截然無關的。整個事件不過勝利的歌頌，工業成功的讚揚，和對於「一般路線」的擁護。雖然事實上國內局勢已到了危機一髮，朝不保夕的程度。

右派的人士，如里可夫，布哈林，及湯姆斯基之流，正在苟全性命，對「一般路線」表示懺悔的忠誠。他們不僅似乎失敗了，而且是完全消沉了，一點奮鬥精神也沒有。祇要他們肯努力，仍然是可以激出一個反對組織的。湯姆斯基於表示妥協中，堅不承認自己和他的朋友的錯誤，史達林會因此對他作了很大的譏諷。

針對着此種官方的樂觀，農業人民委員長雅可夫利夫的報告却指出農民廣泛地破壞了牲畜。雅氏後來在整肅運動中失蹤。

史達林想不靠組織及專家督導來完成五年計劃的奇蹟，而僅僅依賴羣衆的狂熱和超人的努力。他確能獲得若干奇蹟，但整個計劃則似乎都要陷入無政府狀態中。成本增高，而勞工與人力的浪費則異常龐大。我對於此一工業化運動得了許多第一流的資料。下述一件意外，說明我爲什麼用「無政府」來形容那時的情形。同時，它也說明鑄成若干大錯和獲得若干成功的心理動機究竟何在。

西里布羅夫斯基，是一位著名黨員和出色的工程師，對於美國的鍊油工業極有心得。他受命主持一個五金信託組織。蘇聯的銅產量從未超出四萬噸一年，但中央委員會則提出口號稱：「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銅的生產，明年可達十五萬噸。」西氏的第一名助手牟拉杜夫對於這個毫無希望執行的命令提出了抗議。他指出如要完成此種數字，就得開採遠處的礦藏，要橫過沙漠修造數百哩的鐵道，並要建一個完全新的礦業。這是要三四年才能實現的。這些計劃如果實行起來，必然會破壞了在馬格尼託哥爾斯克和庫茲內斯克一些冶鍊廠中原有的機器設備，並浪費一些固有的投資。

爲了敢於反對此一有害的政策，牟拉杜夫被指爲右派投機者，蓄意破壞中央委員會的計劃而撤去職務。既然中委會要維持威信，他只得承認他的認識不夠，除了服從命令外，更無可說。他將銅產提高到十萬噸的建議，也被拒絕了。

西里布羅夫斯基在真理報一篇論文中，公開地斥責了他助手的機會主義，並且保證將銅的生產於一年內提高達十五萬噸。從經驗言，他深知這是做不到的。但中央委員會及其領袖堅持他公開表示對黨的忠誠和紀律的服從。事實上，在整個五年計劃中，人們用了一切力量，但蘇聯的銅產量，從未超過五萬噸。並且費了許多時候，才能將產量穩定於此一數字。

在俄國發生過數以千計的類似事件。凡是敢於直言不畏的人們，受到較此更嚴厲的處分。無數的技術專家，因為維持職業的獨立心，不願盲從，而被迫入格別烏集中營或被槍決。在牟拉杜夫事件中，牟因為此種獨立心而與黨發生衝突，但後者終於勝利了。以黨員的地位而論，他承認錯了，但從工程師的立場言，則他的見解是對的。

此種道德上的犧牲是無裨於實際的。西里布羅夫斯基和牟拉杜夫都是最優秀的工程師，和鍊冶工業中第一流人才。但他們今天縱未死，也仍在獄中。至於銅礦工業，則雖然花了無數的金錢，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末期，仍毫無進步。一些新的機器也變腐壞了。在許多蘇聯工廠中，都發現了類似情形。

在龐大浪費的代價下，那只有在國有經濟的國家才可以繼續推行而不致於破產的。蘇聯漸漸獲到一些生產和管理初步教訓。蘇聯的工業成就，較美國水準的距離如何，可以從懷特論莫斯科及列甯格勒工業情形的報告獲悉梗概。人們也許想此種情形是受了戰爭影響。那是錯了。戰爭使人民意志集中，在國有經濟中，它是可以提高效率的。

那時人們所以忠於史達林，主要地基於下列信心：沒有人可以代替他，更換領袖極危險，國家必須繼續現行政策，因為任何躊躇或退出，將使前功盡棄。我在一九三二年回國時，莫斯科的情形較之一九三〇年時改變得更多。我費了許多時間才了解此種改變的程度。我們只有身歷其境才能感到就是做到一個生存的水準，人們都要如何努力去計劃追求。

此時烏克蘭及其他較遠的幾省正開災荒。這是與亢旱無關的。糧荒的起因是完全因為農業的崩潰。強迫集體化及農民的反對，和無限制輸出政策促成了農業的破壞。城市中也鬧飢荒，但那裏組織了由上至下的供應制度，如食物票，分類配給，對外貿易商店，以及專為機關政府人員而設的商店之類。在特別商店中，享有特權的人們，如專家及政府官員，仍可以購買少量的東西，如食物，藥品，及衣服。對外貿易商店，原是和外僑做生意的。但外僑既寥寥無幾，主要顧客仍為蘇聯人。任何人只要他付得出金，銀，手飾，或外幣，都可以買到一切的東西。對外貿易商店收受牙齒的鑲飾物，銀神座，錶，結婚戒指，銀匙，以及中國或阿根廷銀元。在那裏可以購到各種稀有的物品，如皮靴，衣料，阿斯比靈，茶葉，巧克力糖，及肥皂。

只有極少數人們，最高官吏，外僑，和高級專家，住得起有餐廳，酒吧及音樂設備的第一流旅館。在都城飯店吃一頓晚餐的代價，抵得上一個小職員兩月的工資。我做斯坦哥進口部副經理的薪水，五倍于那個數目——五百盧布一月，即等於一個「官僚」的工資。除薪水外，我感謝羅生高爾茲的照顧，使對外貿易部為我在城中心區的新莫

斯科旅館供給了一間房子。我之所以能進去住，就是因爲部裏代付每天三十盧布的租金。

吃的問題很複雜，在我旅館餐廳中，一盆湯要五至七盧布，一碟肉類廿二盧布，一杯茶一盧布。我要照顧兩個孩子和照管他們的女僕，需要幾個月的好煩手續，才找到一張麵包票。我如何過活呢？我在國外時，有汽車的好，它現在救了。當我離開布魯塞爾時，禁止國外人員購置汽車的規定已取銷了。因此我費了一百英鎊購了一部別克車子，從倫敦裝運到列寧格勒。我費了許多手續，獲得特許，才將它售給對外貿易商店，得了五百個國外盧布。此時每一盧布約合四十紙盧布，我們靠這筆款子維持了一年半的生活。

旅館規定房間中，絕對不許煮東西。但我的女傭在房內暗中做案。經理幾次跑來要將我們趕出去，我們答應不再犯來敷衍他算數。如此經過八個月，才在我們部裏特別留下的公寓中找到兩間房子。當然這房子是有許多人爭的。他們都有同一樣的困難，都有背景，都有理由，但羅生高爾茲斷然地將它撥給我們住。

我將別克汽車出賣來維持生活以前，我會用了它來獲悉一些五年計劃下的交通情形。直到此時，我只知道蘇聯報紙所告訴我們的一些情形。我知道我們的汽車工業很幼稚，路也很壞，但我認爲在這方面，進步也很快，也許超過了許多先進的鄰國。

我計劃在中部俄羅斯作一次汽車旅行。我有一位朋友也是很喜歡駕車的，相約同我到列寧格勒去取他的汽車。我們的車子都是裝在一船的。我們看到起重機將車子卸下碼頭時，不禁心跳了。我想我的華麗的別克車，較之一般蘇聯官員所乘的破敝的汽車不知要高明得多少。但我們得到第一次失望了，這些車子的一切的配件都在船上被人偷光了。

這是一個冷而晴朗的天氣，在零下十度。我們想將車子裝運回莫斯科，而自己則坐火車。但這似乎是一種變壞，一種對國家及政府完全缺乏信心的行爲。人們都知道，一世紀以來，聖彼得堡至莫斯科一段公路爲全俄國最好的一條。它差不多直綫地腳接着兩大都會，並且在經常愛護下，它是帝俄時代公路橋樑部得意之作。我們決定循這條路走。風景也許單調的，田地及樹林，都已沒入積雪中，但至少我們像真正歐洲人一樣，可以作一次公路旅行。全程四五〇哩，也許十四五小時的汽車時間就够了。

第一，我們須獲得買汽油的許可証。我們向管理公路和汽車的汽車社，汽油配給處以及黨委員會申請，俾能加緊完成必需的手續。因爲我們都是高級官員，在兩天內就辦好手續了。我們的汽油許可証使我們在全國各處皆可取得汽油，毋需任何說明。

我們興緻勃勃地上了路。第一個一五〇哩的旅行很愉快地過去了，沿途是白雪和一點白冰洋的風光。我們隨時看見路旁停了一些卡車，有些空的，有些載着貨物，但司機者則全無蹟象。這些載重車子在雪白的路上，都似乎是被遺棄了，情形頗使我們驚訝。我們走得愈遠，類此的卡車更多，竟似整隊的車輛，都委棄在路側。我們很難遇到一輛駛動的車子，但看到時，就可以發現司機者以驚奇而含有尊敬的表情注視我們。

我們開始想到要加油，決定到下一個市鎮去添。那是一個交通中心，連接着以前梯威政府下的一些大城市。這個小城在陽光中闐無聲息。我們走入一間酒店。

「那裏有汽油呢？」有幾個卡車司機圍在桌上做起譏諷的面孔。

「汽油，同志們，我們等了兩天了。這條路上任何地方一滴也找不到。你們不會看見拋錨的汽車嗎？」

我們只好對面愕然，因為我們相信除美國外，蘇聯是產汽油最多的國家。關於此一神秘，我們不妨將來再研究，但如何解決目前的難題呢？我們絞了一刻鐘的腦汁，但最後我的朋友得了一個靈感。

「這裏一定有藥房的，我們將石油精全部買下來！」

我們走遍了全城，將困難對藥房解說了。他們聽說我們是貿易部的官員，很肯幫忙，結果使我們獲得幾夸脫石油精。在一般被擱淺的司機驚奇的注視下，我們重新上路。他們並不疑我們爲魔術家，但也許想格別烏幫了我們解決困難。因爲只有他們才有點汽油，而我們也是同道的關係。

我們滿想在莫斯科附近可以再加油。但因爲就攔了，當晚回家已不可能。我們想在附近住一宵，但這問題不見得比汽油容易解決。在這條路上沒有旅館，就是酒店也滿坑滿谷都是人，推手車的，司機，地方公務員，農民等。我們最後才在客廳內找到兩張牀和被單。這當然是被單，但有人先我們用過的。酒店主人說：「我們每月洗一次」。睡在車上有凍死的危險，所以只得有什麼拿什麼。

翌日，我們的石油精使車子開了七十哩，就用完了。我們驚駭地發現前途還有二百哩，這白帶子一般的道路，似乎綿延不盡。沿途棄置的車輛竟如一支潰退的軍隊，有些被雪埋沒得看不見了。在每一村，每一加油站，我們問了同一問題，但毫無結果。簡直找不到汽油。我們開始憎惡這些汽油器，那上面說明「任何俄國境內」都可以添油的。爲什麼不簡單地告訴我們經過五年的勝利工業化，從列寧格勒到莫斯科沒有汽油可加，或者說添油站是有的，但都空了呢？

「這等事情常有嗎？」我們問。

「它要不發生那才奇怪哩。」人們回答。

在莫斯科，我們親眼見成百的人排着隊等買幾夸脫汽油。黑市上出四五倍高於官價的錢，是可以買到汽油的，但我們想主，持五年計劃的人們似乎至少應當爲在此一主要連系兩個都會的公路上，將必需的汽油，供應爲國家服務而旅行的人。這些破壞了的卡車，就意味着工作的崩潰，和糧食運輸的失敗。

我們第二晚在一家空添油站歇下了。無論如何，我們需要趕回莫斯科。我瞥見了一隻桶子，「火油嗎？」我問。危險是頗大的，但不妨試試。我們的車子一直用慣殼牌汽油的，這種又黑又污的火油是點燈用的，也許我們的機器消化不了罷。但總算勉強地將車子開動了。

這條路現在已不成其爲公路，高低不平，一段是雪，一段是冰。彈簧破了，只好草草地在路旁一家鐵店修好了。我們又凍又疲，我的同伴差不多將車子翻到小溪內。我們竟像莫斯科的大撤退，而不是坐了近代化汽車去莫斯科旅行的。最後，在加里甯城才找到一點汽油，勝利！

但失敗却在莫斯科城門期待我。剛出城外，鄰近賽馬場，公路變爲一條完全近代化快車道，誰疑心此處有陷阱呢？曾走過此地的人們是知道迴避的，但我却是生手。附近一個陰溝壞了，水流過雪地山坡，使凝成一塊如鏡的冰。當我看時已經遲了。我的別克滑了下去，衝斷了一枝小樹，在另一枝樹前停了下來，擊碎了。

一些人圍上來看它的遺骸。修理呢，至少要一千盧布。禍不單行，一輛重卡車忽然碰撞在坡上，也朝我的方面滑救下來。它也許將我的車完全燬了，若不是一位可憐人正好奇地站在我的車沿做了緩衝。他被壓在兩車之間，一輛護車將他帶走。我也沒有問他，因爲我在骨神經痛病中結束了此一次娛樂旅行。他是否生還，我也不知道。

至於別克呢，我後來決定留不起它。每一月的汽車租金就得花去我的薪水三分之一，這樣的公路我也受够了。並且我連飯也吃不起，又何能養車子呢，因此，如我所述，將它售於對外貿易商店。

二八、官僚腐化

一九三三年中央政治局決定派一個政府使團赴波蘭作友誼訪問。團長爲副人民委員長波也夫（後來任阿姆托格總理），而我則爲團員之一。俄國此時正向波蘭遞送秋波。在一段長久時期中，蘇聯因與德國締結刺帕羅條約及一

連申商務協定關係，一直認波蘭爲危險敵人，稱它爲「法帝國主義的戰士並凡爾賽條約的擁護者」。每年春天，中央政治局要討論波蘭人入侵的可能性，俾鼓勵全國敵愾的心理。不久，有人建議德國既已淪於納粹政權，我們應當設法與波蘭修好。史達林雖仍企圖與希特勒獲得諒解，但一方面則向華沙作外交試探，獲得了良好的反應。

我們抵達波蘭後，他們的歡迎，不獨禮貌，而且近乎公開的同情。輿論對於兩國間緊張的消除表示欣慰，而商人方面，則希望在俄國找得急切需要的市場。波蘭怕德國甚於怕蘇聯，因爲她與柏林至少有三種宿嫌：走廊問題，上西利西亞，及波斯南。但波蘇間則毫無裂痕，且蘇聯可供波蘭工業出路。柏克上校當然是恐懼布什維克的，而正向柏林進行勾結。但無論如何，就是官方也極表友誼，舉行多次盛宴，歡迎我們。

這幾天的招待，使我對於舉杯祝賀的儀式表示厭倦。我如果未能了解官方招待的空洞無謂，這次就獲了不少教訓。他們對於我們奉承無所不至，並請我們參觀了一些模範工廠，其中大部份因危機而停了工。

吉尼亞海港使我明瞭近代工業的力量，它是近數年中，從一塊荒無人居的沙灘建設起來的，現在已可以容納海洋船舶，並作海軍基地。全城寬濶偉大，一切都有條有理，經過縝密設計，而不是像有些蘇聯新城市用強迫工人建設的。我對於某些事情仍在疑似之間，我覺得蘇聯集中營的政治囚犯們，確曾貢獻極大力量開發北方森林，並建築基賓諾哥爾斯克及馬格尼託哥爾斯克的偉大工廠，和白海——波羅的海運河。

我們的訪問團除了獲得幾張不重要的訂單外，並無其他成績。五金入口部購了些上西利西亞的鐵，我也爲斯坦科進口部買了些機器工具。

與我們旅行有關的最後一次儀式是在莫斯科舉行的。波蘭大使盧加西維克茲舉行了盛大的招待會並晚宴歡迎代表團歸來。出席招待會的有外交部，外交部及對外貿易部官員，及紅軍高級將領。杜嘉契益舍夫司基，布丹尼，及衣果羅夫將軍都出席，並參加了跳舞及游藝節目，以及那晚的一些重要討論。

宴會是比較親切的事件，參與者僅兩部主管及高級官員。盧大使左右坐了羅生高爾茲及外交部代理委員長克萊斯丁斯基（李維諾夫適在國外），其餘同席者則爲副委員長蘇科尼可夫，依利瓦，羅干諾夫斯基及拉德克。後來這批人或殺或被控爲「法西斯間諜」。盧大使及波也夫爲我們一行的重要成績及將來的蘇波友好關係互相舉杯祝賀。

在華沙時，我患了傷風，迄未痊癒，故歸來後數日，即往克姆林宮的醫院請芮雲醫生診治。他對於病人極週到，爲一般官員所信仰。一九三八年他被槍決了，因爲據他供詞稱，他曾奉雅哥達之命，將高爾基的生命縮短了數小時。雅彼時爲格別烏主管，權勢極大，但亦不過史達林的工具而已。老芮雲醫生每天都竭力爲病人謀福利，并減少

痛苦，我相信他絕不致有殺人行爲的。雅哥達爲知道事件真相的人，但也與芮雲同時遇害。

我此時也經過了一番危機。迄至目前，我會深信黨的睿智，希望五年計劃的成功可以治愈一切災難。在國外時，我專心工作，信賴黨內領袖的意見，使自己爲政府謊言所蒙蔽。我知道他們正在進行不可能的工作，忍受絕大的痛苦，我總希望計劃的結果不久可以顯現出來。但莫斯科的情形已開了我的眼界。只有少數人的生活獲得改善，廣泛的民衆，則情形如此惡劣，似乎已委諸一切於失望中。他們絕未夢想到怨訴。

我住的地方的脚伏每晚在他小屋中修理皮鞋，他的週圍擠着一群小孩。

「你爲何如此辛苦呢？」我問，因爲我知道他每天工作時間極長。

「爲什麼？」他說：「因爲我會挨餓。我有七口要食，而工錢才一二〇盧布。」

「但現在麵包票雖已取銷，工錢增了百分之十，以補償麵包的漲價。那應該有些幫助罷？」

「你真如此想嗎？我們七個人連妻及五個孩子，每天需要七公斤麵包，除此以外，我是無力購別的東西的。一磅黑麵包要一個盧布，而白麵包則爲兩個盧布。但我工錢才增加八個盧布。請不要忘了百分之十不是按工錢增加，而爲按配給券上所用於麵包一部份的。那不是七磅，而爲三磅。所以同志看我每晚如不工作，就得偷竊，否則只好坐視一家挨餓。」

當我聆悉在無產階級革命十五年後，一般工人如此絕望，我憤怒得發抖，也覺得慚愧。我們應當業已經過了最險惡階段，但享福者僅僅幾個人。百萬的人們則故意淪於貧窮與愁苦。從前工人們還可以買到一些廉價食品的「特種」商店現已關閉了，繼之而起者爲根據普遍富裕理想而設的自由商店。在那裏一切東西都以不可思議的高價出售。此種新政策，實爲假藉工業化美名，對於人民無恥的掠奪。盧布的購買力逐漸低落到比一九二六年水準的十，廿，卅，或四十倍，視所買的東西爲定。而同一時期，工資尙未增高一倍。莫斯科委員會書記克魯斯舍夫對於工資問題，會稱技術工人增加爲二百盧布一月，而普通工人則爲一百盧布。普通工人階級家庭須將百分之九十的收入用於食物。這較之我所住過的西方國家是如何可憐的食物呢？一九三三年俄國工人生活水準，可將他們的工資與「自由」國營商店的食物價格作一比較。

肉，九至十盧布一公斤，白麵包兩盧布，黑麵包一盧布，糖十盧布，米九盧布，牛油廿二——廿六盧布，雞蛋十至十二盧布十個，皮鞋一百至一百五十盧布。因此，按克氏所稱工人收入爲一百至二百盧布一月，他們就完全不能享受牛油與雞蛋，也很難得肉食。他們主要的食物祇有黑麵包，馬鈴薯，白菜，和蕎麥一類東西。

蘇聯報紙很慎重地隱諱了此種情形，使國外不能知道。官方報紙常常應許人民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中，可以增加工資，但這並不能鎮靜我受激怒了的情緒。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結果使我對二次的計劃失去信心。一九三五年莫洛托夫總理向巴黎時代報記者鄭重表示，兩年後物價可以減低一半，這使我的希望畧畧恢復。此一諾言從未兌現。他的說話完全是謊偽。雖則名義上他們爲國家的統治者，無產階級的災難，一點未獲解救。一切爲改善人民生活的努力，都不及維持獨裁的重要。

我經過一番內心的鬥爭，才漸漸明瞭此一事實，這種思考的每一步驟中，我得與我對黨的忠誠，權威，及理想，發生衝突。這是因爲我孕育於黨的環境中，全部成年生活，和思想判斷及意志，均未與黨隔斷。黨在我心目中代表一種集體思想及知識，即遠較我自己的高明。但我現在感到如一味盲從，則不如自己毀滅爲愈。但我能否對黨非議或斥責黨的政策呢？從此時起，我的獨立判斷，逐漸形成，但仍須積數年經驗及觀察，才能達到一個結論。我的例子並不奇特。對於成千的布什維克，迄至一九三七——三八年，此一時期爲一個轉變階段。

我在斯坦科進口部的職位使我獲得參加一些貿易部的高級官員中的活動。此後三年中，在羅生高爾茲督導下，我獲得親切觀察蘇聯政府機器的運用，以及計劃上的一些變動。羅氏此時已經不再有「黃金戰爭」時代的作風。他以前喜掌權勢，並管理得很嚴格。我覺得他是一個百份之百的官僚，在職務範圍內充滿效力，但畏懼批評——兩者都是不可分離的特質。我可以敘述某些工作，俾說明他的變化，及一般趨向。

我從波蘭歸來不久，中央政治局就命令我們取銷德國機器訂單，修正預算，而將優先給英國和美國。英國政府會邀請我們參加帝國機器展覽會，但因爲國內事忙，亦無人可派，只得婉却。自「工程師」審判案後，當局對於派遣專家出國頗有戒心，因爲他們一到國外，就有長住不歸的趨向。

人們流行地說：「他們如果想訂單，讓外國行家的主管們來莫斯科看我們罷！」如此我獲識了一個英國機器公司的經理白朗先生。我請他參觀我們新的軸珠廠。那是我的朋友波德羅夫所監造的。波氏在布丹尼騎兵中當過政治委員，後來做布哈拉大使館參事，而最後則成爲能幹的工業家。當瑞士拒絕將機器售於蘇聯時，他用從美國購來的機器設立了第一個蘇聯製表工廠。

軸珠的製造，須要詳細的計數和極精密的工作技術。機器極貴，而需要特別愛護。我帶白朗參觀時，因無人知道使用方法，有許多機器停頓着，再則我的客人發現工廠地板爲水泥鋪的。他告訴我們，水泥的灰塵最易損壞細巧的機件。此事從未有人想起過。他建議用一種油的副產品塗在地上，減少灰塵。我根據他的建議，向工業部送了一份

兩年後我再到此一工廠。在那裏正進行一種反對劣質成品的鬥爭。不符標準的產品的百分數一天天增高。他們不斷地調查原因，揭發破壞，並進行「突擊手段」，鼓吹「按照原計劃進行」。但我發現地面上仍是水泥，並未改良，因為他們沒有時間停止機器作必要的修理。黨的首腦們堅持此一著名的工廠，務須不惜一切，超過生產數額。波德羅夫在中央政治局激勵下，已將每月軸珠的產量提高到一百萬枚，但這是基於日夜不息地將機器開動的成績。因為失於必需的修理，機器漸漸不靈了，使他的手下人極傷腦筋。重工業人民委員長阿陽尼基茲要求將產量提高到三百萬枚。波氏堅持修理機器，結果以破壞的罪名被免職。他同別人同樣也失蹤了。一位名叫麥拉默德的工程師繼任，俾得實現中央政治局所規定的最高限額。他保証可以完成超出的一百萬枚，而且在三個月中，居然使每月產量達到此數，因此他獲到很熱烈的酬報。但不合格的成品百分率可怕地增高了，整部門機器得停止開動。他也因為讓機器損壞的緣故，被斥為「人民之敵」。一位以史泰漢諾夫熱忱著名的青年工程師處新代替了麥氏，他的後文如何，我却不知道。

我們的報紙往往只記載工業生產的「紀錄」，而對於成本則一字不提。按普通情形，我們的機器是從不加修理的，要一直用破後，再裝新的。因此，雖則工資極低，蘇聯工業品的真實成本則遠高於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此種超削剝制度原應該可以補償損失，製造低廉產品的，但低能的官僚制度將勞工及原料任意浪費，摧毀了此一可能性。我在別部門的工業中，亦會親觀此種情形。

主要癥結是一般管理方面，因無競爭，亦無自由工會之故，就毋須運用腦筋。他們儘可以浪費和低能，因為受不到競爭者的壓力，需要製造價廉物美的東西，也受不到工人的壓力，需要增加工資，他們的問題要簡單得多。當利潤不能抵償浪費時，他們就減低工資。因此，雖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工作須一天一天增劇，而蘇聯工業却不能予以同等像樣的生活水準。列甯的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經濟如欲證明其值得存在的理由，必須較之資本主義國家生產更多更好的貨品，而成本又較低廉，俾保障工人較優裕的生活。我在此後數年中，常懷想到列甯的主張，疑惑我們是否走對了路。

一年的斯坦科進口部工作，使我熟悉了管理蘇聯國家的龐大和高度集中化官僚體系的運用情形。很自然的，我想中央政治局只會關心到斯坦科進口部的較廣泛工作方面，那是每年動用數千萬盧布的一個進口門。但我很驚奇地發現它的關心是無微不至，而且其中要通過一直達到史達林的不斷的官樣文章。

基於此種過度的中央集權化，許多時間都浪費於細微末節，而用於真正重要問題的時間則不够。我親見中央政治局費了很多時候討論我的進口部一件小合約。

此一合約是關於德國史多克公司供應機器工具及配件的事。我們此時接了關於這些工具質料不良的指訴，而且賬目也不太清楚。工廠主持人寫信給史達林直接提出指摘。他與史氏會有一面之緣，史氏猶能憶及。因此中央政治局要開會聽取報告，奉命列席者為羅生高爾茲及助理，工業部門主管及其助理，斯坦科進口部總經理及我，以及提出申訴的工廠的總工程師。爲了此一牽涉不到數十萬盧布的小事，我們全部高級官員得放下別的要公不辦，預備節畧，解釋交易，並保護自己的立場。我爲此事共花了三天三夜。

開會的那天，我們三點鐘就到了克姆林宮，齊集於一個爲出席中央政治局訪問者而設的會客室。在那裏有許多高級官員，黨和蘇維埃統治者，及各部門，公司，工廠的主管。他們一坐下就是好幾小時，直至被傳，而他們的機關就只好老等。這是中央政治局開會時所常有的現象。在此室內，人們閑話着政府一些消息，而候見的官員則吃火腿乳酪三文治，飲茶，不斷地抽俄國香煙。

到七點鐘才輪到我們的案子。我們魚貫地走入政治局大廳。伏洛希羅夫，莫洛託夫，及其他共產黨部最高機關的委員們圍坐於一張圓桌。史達林口含雪茄，雙手叉於腰後在窗前踱來踱去。也很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做主席，而將主席讓於加里甯，卡干諾維治或莫洛託夫。當我們走入時，史達林對提出指訴的工廠主任微笑點頭。他此一恩惠的象徵，立刻反映於一般人的態度上。我們都不免感到歉咎。

這位主任滔滔不絕地講了一個長時間，將蘇聯日曆中所有的罪名，都推到我們公司，從與資本家簽訂「喪權」的合約，到公開的破壞。史達林不時地，不等主席加里甯的承認，參入些批評或譏刺。

「所以斯坦科進口公司出賣給德國人了！」他說。

主子的過份幽默，使全廳的人都失聲哄然了。我望望可憐的羅生高爾茲，連他也免強陪着苦笑。

控訴者與被控者糾纏不清，冒着汗辯論了兩小時。政治局委員們也提出些外行的問題。這是一件很專門的事件，因爲都是關於機器工具一些性能規定細節。很顯明地史氏和其他委員都不會仔細聽我們的討論。偶然他發出一兩問題。但如果要明瞭真象，就是一位專家也得將証件，合約，圖樣，擺在面前研究好些天方才有辦法。

最後，史達林立起來說：

「好罷，這够了。我們很容易看出斯坦科進口部的合約訂得很壞。我建議羅生高爾茲應受警告，斯坦科進口部

派人到德國將事情弄清楚，它的總經理海柏斯丹，予以嚴厲處分。」

加里甯連頭也不抬，說：「你們聽到建議了。如果沒有反對，我們就照辦罷。」

那裏沒有人反對，我們散了會，讓地方給第二批受害者。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中，人們仍然維持着集體工作的微薄形式。史達林絕不「命令」，但只「建議」或「提議」。表決的虛文是保留了，但表決總不會不支持他的「建議」的。政治局十位委員都簽名於決議案上，史達林的簽字也在內。但每人都知道只有一位主子。決定書的名詞和稱謂都按黨的沿革，但在此一切後面，史達林同志的字就是法律。

當我聽到政治局委員們哼着對史氏建議的贊同時，我自己問，假使有人站起說「我不同意史達林同志」，他會遭遇什麼呢？但這是妄想。史達林事前早已設法將任何可能的反對派搜索出來。如他對付基羅夫一樣，任何有潛力的人，在他獲得試驗機會時，早就被史達林消除了。史氏不獨爲整個官僚組織所公認的主子，但他是唯一無二的主子。

因此，蘇聯的官僚組織爲一笨重而不易推動的機器。下屬官員的創發力完全被窒息了。每人都不願負責任，每一事都要請示。成千計的比較不重要或是很重要的公事和問題，都得經過史達林作最後決定，因此，上面積壓得不得了。人們常常得等候：委員們在史達林辦公室等，公司經理們在委員長那裏等，循序而下。我常在羅生高爾茲處費許多時間等史達林的決定，而我的職員又等我從羅氏那裏請示。史達林厭倦時就到他的別墅作休憩，下令不許任何人擾他。頂層機器完全停頓了，而全部工作都行不通。

史達林何故要堅持對蘇聯生活的每一方面親自處理，使自己負上如此重担呢？答案是像他這樣的一個人，只有如是，才能繼續維持獨裁的地位。任何溫和和睿智，較少猜疑的人，只要有一些可靠而精明的助手，就可以保持權勢，而毋須每事躬親過問，但此非史氏所能做到的。

此種制度的結果，是要使人們墮落的，尤其是有主管天才和創造力很强的知識份子。有許多我很敬重的人現在也可悲地改變了。以舒米亞斯基爲例，我以前曾在波斯和他共事。他自德黑蘭歸來後，即奉命主持莫斯科中國軍官學校，訓練革命中國軍隊的士官。短期後他奉調服務於東方工作者學院，最後他被任爲電影製造局主任。以他的充沛的精力，嗜好，以及廣泛的教育，這應當是最能使他發展天才的工作了。但不然。自從愛恩斯坦，普杜夫金和杜夫任科的幾部名片後。雖有宏大的攝影場，一百種不同民族的習慣風俗，和轟轟烈烈的最近歷史背景，蘇聯電影却

每況愈下，沒有一部精彩作品。我對於此種現象常感到驚奇，但我們的共同朋友告訴我一些舒氏的生活情形後，就覺得毫無足怪了。蘇聯電影檢查使任何一點發明的天才消滅無遺。中央當局的命令侵越了思想與意識的各方面。舒氏雖負有主持之責，但經常沒有工夫見他的導演們，無論他們是如何負盛名的。他同他各部門的主管，也只能每星期有幾分鐘的接洽機會。但因為人們都知史達林相信他，所以沒有獲到他的指示或批准前，一點工作也進行不了。史達林對電影是頗感興趣的。

舒氏這位大組織家和老革命者，如何消磨他的時間呢？為製片工作向高級官僚們討恩惠嗎？全不是的。他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一般要人們如卡干諾維治，伏洛希羅夫，米高揚，和主子的一些其他朋友的別墅裏，替他們放映電影。他們都有私人放映室，而片子則多半是用黃金從外國輸入的。不用說民衆看不到，就是電影業本身也看不到。那只是為一般蘇維埃貴族的娛樂而輸入的。

任何蘇聯影片公演前，必先由史達林及其親信那裏預映，舒氏得聽他們的意見，將影片修改或禁止整個片子，或因為主子不高興，開除藝員或經理。

在舒米亞斯基領域內，賞罰是沒有標準的。鄂洛娃因為在「馬戲團」及「快樂孩子」中獲得史達林賞識，就無緣無故地被昇為「共和國光榮藝術家」。那是一個要具有二三十年特殊表演成績的人們才可獲得的殊榮。試想想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對此作何感想。他在戲劇上作了劃時代的貢獻後才獲了此種榮譽。

舒氏不獨不能應付他的工作，並且對於他的部下，起了麻痺和阻礙的作用。他本人則變成統治官僚階級中一個雜役。他為自己在莫斯科蓋了一所華麗的屋子，但享受不多久。除了他是老布什維克外，我不清楚史達林為何反對他，因為他對於反對派從未表示過同情。但一九三七年他被控瀆職而失蹤了。既然原則上高級官員無退休的可能，我想他若未被槍斃，就大概在某一個集中營終其餘年了。

就是最細微的事件也可以說明此時一般人們的作風。某夜，我和一些頗有名氣的蘇聯知識份子閑談。其中某君為一著名建築師。他講起正在施工中的蘇維埃宮。這地址在克姆林宮下邊，對着莫斯科河，他們已經在炸燬救主堂教堂，來作基址。此時建築圖案競賽已揭曉，史達林選了一個龐大的，笨重的圓形建築，四週繞以石柱。在建築上端，我們領袖的建築天才使他想到了要添一座完全用不銹鋼鑄造的列甯的偉大塑像。

「整個東西，」這位建築師說：「會像柏林糖果店所最喜歡陳列的大巧克力蛋糕，一層層的上，有時堆一枝洋燭，或一個洋娃，或一束花。從技術上看，這是退化到前一世紀最壞的裝飾建築。大部份的房間需要靠人工光綫

。出路也不够多，而且房間太大，造成建築上特殊困難。但最壞的是此處土質太鬆，僅能負荷起一個教堂的建築。大部份的地基在泥沼內，要千萬金錢才能將地基填好。爲什麼在克姆林宮旁要蓋這樣一所屋子呢？任何懂得風雅的人都是夢想不到的。」

幾天後我在報上看到某君對於這所新宮殿的計劃，譽揚不置，他因爲被請發表意見，所以不得不如此敷衍一番。

這就是當時的風尚。我想我應對此項整個計劃，說明立場。在莫斯科整個居民都在鬧屋荒時候，爲何要費百萬金錢，來建築一座宮殿呢？莫斯科的蘇維埃，爲何沒有一位工人階級的委員立起來說：「同志們，爲何不將款子用來蓋工人住宅呢？」但蘇維埃早已名存實亡，而任何委員敢於認真，則縱不被人視爲笨伯，也要被指爲反革命份子。史達林不是對於什麼應該做的知道得更清切嗎？

許多人們都知道這是不對的，但一籌莫展，只能苦笑而已。黨的知識份子中有句流行的話，很可代表此種情緒：「最好不想；如果想，最好不要說出；如果說，最好不寫下；如果寫，最好不付印；如果印了，立刻供認並懺悔。」

在我與職員的接觸中，也發現了同一的變化。工會主義早已渙然無存了。以前工會爲一有力機構，關於處罰，解僱或任何與工作有關的事，都有權參與。現在，工廠主任或蘇維埃機關的主管們，毋須顧到工人的代表。分工會仍存在着，但它的職務僅限於執行黨細胞的決定。此外，它主要的是督促工人繳納對政府的捐獻。機關的職員和廠裏的工人，已經失去任何保障。

整個空氣如此苦悶，使我夢想如何獲得一個完全不負責任的職位，如圖書館職員或戲院票房管事之類。我想找到時間去想，並且在社會梯子的低層，找到一些職位，使我能較批評地觀察一切，并思考究竟我的疑慮是否合理？一九三三年末，我辭了斯坦科進口部職務，請求紅軍參謀部將我從預備役調至現役。

二九、故友重逢

我希望回到軍隊後，可以入空軍學校受技術訓練，如此至少有四年可以逃避政治及官僚主義的風波。這樣對我就是天大福氣了。但我失望了。

蘇維埃曾將小額軍火，經由若干部門，送到東方某些國家，史達林現在下令將全部軍火輸出集中於一處，直接受中央政治局監督。對外貿易部原有一個小的信託組織，經營汽車輸出業務。爲了掩護計，他們決定將此一信託擴大，而將軍火輸出業務併入其內。

當我辭斯坦科進口部職務時，他們正要找人担任此一新機構的總經理。參謀部想找一位軍人，因此，不獨未將我召回並派入航校，而將我推薦於中央政治局担任新職。史達林核准了我的任命。

羅生高爾茲召見我，告以這項消息。

「你是軍人，」他說：「對於國外貿易及外交素有經驗。再則，你對於汽車也感興趣。」此時他對我隱眼示意，因爲我從列甯格勒到莫斯科的汽車旅行故事成了一個很多人熟悉的笑話。「這正是你要做的事。你的責任很大——有整個東方市場都待你來征服。」

黨的紀律很嚴，我只得忘了我的夢想及學業。我成了汽車出口信託公司的第一任總經理。它的一部門經營汽車，另一部門經營軍火，而後者則爲蘇維埃政治中顯要部份。汽車出口業務是很公開進行的，但我比較重要和困難的工作，則爲軍火交易，而且那是必須保持秘密的。

迄至這一個時期，蘇聯一直輸入汽車和軍火，即目前我們亦無意在歐洲與西方製造者競爭，但新疆，阿富汗，蒙古，土耳其及波斯一帶，則因爲交通的關係，可以成爲我們的市場。

我在獲得汽車及軍火工作中，遇到最大的困難。中央政治局對於一切輸出及輸入計劃都得過問。除非有史達林簽署的中央政治局特准外，沒有一斗麥子，一磅牛油，或一包棉花，一噸礦物或一碼布，一輛汽車，一件機器，可以在正式進出口業務計劃外，獲得輸出或輸入。一切業務內容都要經過政治局討論。一切出口單價及付款方法均得呈史達林核准。無論貿易部，設計局，或直接管理生產的部門，以前作了任何決定，他有最後決定權。每種計劃都由這些機構按年按季地修正，列舉何者輸入何國，並按時送呈中央政治局。

不獨進出口商業得經過此種程式，即國內物資分配亦然。信託公司及管理機構將需要量列明，然後工業部計劃配給次序，呈中央政治局核定。

一切決定經黨的中央政治局的主子史達林批准後，還得送到部長會議，由政府正式核准。部長會議不過爲一呈轉機關，對於中央政治局交來的決定，從不修改一字。莫洛托夫僅是史達林的橡皮圖章。當我奉到一張上面有書記長史達林簽署的中央政治局的公事，命我將一百輛汽車運到新疆，我立刻就會照辦。但四五天後，同一決定，在部

長會議的公文紙上有莫洛托夫總理的簽字，一字不易地，送到我那裏。那時汽車早已在途中了。此種荒謬的情形，一直到一九四一年春才改變。史達林鑒於戰爭危機日迫，並效法希特勒的身兼總理與黨內元首兩要職，才率性廢除此種虛文，自任總理。

在斯坦科進口部任職時，我已深深涉足於蘇聯的官僚化中，但做了汽車輸出信託公司的主管後，我就全身被它淹沒了。我每動一步就得和有關部門開無止境的討論會。我得與外交部商量，俾不致影響它對於有關國家的一般政策。我得和工業部計劃詳細的生產產數量。我得和軍部接洽關於公開最新軍事模型及發明問題。此後關於售價及資命問題，則須與貿易部門洽商。關於運輸及輪運問題，又要向不同的部門接洽。我幾個月前就得預計需要多少火車載位，目的地是何處，這些項目都得包含在道路及交通部的每季報告中。

我花了好幾個星期從一部跑到另一部，調停他們衝突的計劃。不獨我一人，連我手下的主管人員亦如此，或是看人，或是開會。對於本身的業務，却只好晚間去做。

最後，我的一切軍火佈置，於呈送中央政治局前，須由最高國防委員會的軍火輸出委員會核准。這個會的主席爲軍事人民委員長伏洛希羅夫，杜嘉契益夫司基和加馬尼克爲副主席。我希望我的老長官和友人杜嘉契益夫司基可以在職務上幫點忙——至少是關於參謀部一方面的事情。他盡了力量，但幫助不太大。因爲連軍隊此時也陷入了無所不屬的官僚文章中。

我與杜氏的第一次重逢，印象極親切難忘。這位元帥以對待部屬的和藹態度來歡迎我。他已較前肥碩，兩鬢已斑，但精神仍極年青而富朝氣。他很安閑地注意聆聽我的陳述。

我們談話中，電話鈴响了。元帥安閑地接了聽筒，忽然跳起來改變了完全很恭順的口氣。

「早安，克來門地。伊弗里莫維治……完全照你意思，克來門地。伊弗里莫維治……那是可以的……克來門地。伊弗里莫維治……」這是他如何接受伏洛希羅夫的命命。

此一事件使我獲得一悲觀印象。看了一位偉大軍人如此聽命。使我想起爲何我的問題需要這樣長時間才能得到答覆。連杜氏這樣的人，也不敢有所決定了，而只是唯唯聽命，他也得隨時請示，他的每一動作，都得符合命令，一方面伏洛希羅夫，另一方面爲中央政治局。從我與他的一些交涉中，我獲到結論，就是他的意志也得屈服，而且在這個大的官僚機器中，他成了一個輪齒。以前他曾經是一位領袖，現在則淪爲一個公務員。

有一次，我做了份冗長的關於我們要交給土耳其的坦克車的報告，其中都是些純技術問題。這個報告是給杜氏

的。它退回來後，我發現其中寫了很多的註解，批評，改正，和命令，都是伏洛希羅夫親筆。我原想杜氏會交給他部下作答的。中央集權竟到了如此程度，就是在最高圈子內創發力也被壓制了。有很多事伏氏不敢自作決定，而必須請示史達林。

某次，有一件關於交給波斯政府的飛機的問題發生了。因為伏氏在休假中，故我將問題呈杜、加兩氏。此事原不甚重要，因為政治局將這些飛機已作決定，而現在牽涉到的不過為配件問題，應當有軍事部的批准。我與這兩位軍事首長的交涉進行了三星期之久，因此這些配件無法交貨。事情擱下來的原因是伏氏在黑海濱未曾回來，無人敢於作主。後來我請加馬尼克通電話和他商量，但他的秘書在高加索回答說：「等軍事人民委員長回來再辦」。

此時我常遇到從前在參謀大學時的其他兩位老友——阿克斯尼斯和赫克爾將軍。我回憶起他們的命運。阿氏於獲得飛行員資格並作過許多驚險和打破紀錄的飛行後，被任為我們空軍總司令。這個空軍可以說是他一手建立的。他是一位紀律家並且有高度的效率標準，每次檢閱時很注意到飛行官員的服裝和修潔。他告訴我說飛行是亟須注意到小節的，需要鐵的紀律。他也許急躁，但是他很有系統的人，將一個全新的精神灌輸到我們空軍中。蘇聯空軍之獲到今日的威力，完全是他的功績。目前不獨阿氏已經早被槍決，就是同他共事的人，也在整肅運動中遇到悲慘的結局。

經了此次打擊，蘇聯空軍實力經過長時間才獲得恢復。

赫克爾此時任伏氏的交際主任，負責一切與外國武官的接洽，為一極需要手腕的職位。他得忘了軍人的身份，而作一名外交人材。有幾次我招待土耳其及立陶宛派來購買軍火的代表團。赫氏對我貢獻了許多意見，教我如何去做得很得體。當我對客人舉杯敬酒時，他在桌子遠遠的一端注視我，似乎很關切我的禮貌。我覺得在他眼光中，我仍舊是參謀大學的「不難明」，雖則我又長了十二歲了。但在卅多位對外貿易系統的公司總經理中，我仍是一「不難明」。我此時才卅四歲，但未使他失望。

當一九三五年我離國赴希臘時，曾向赫氏道別。他那時剛任軍團司令，着了很新的有厚邊的制服，等於美國軍隊中的三星將軍階級。他服務許多年後，獲得昇遷，頗感高興。他身邊有許多道賀的朋友，赫氏託我從希臘寄兩碼較好質料的金邊給他。我照辦了寄去。這是不退色的金邊，他在被捕及失蹤前不久才收到的。

我想在這章內追述我最後一次參加黨大會和紅軍閱兵儀式的情形。

蘇維埃大會係在克姆林宮中大廳內召開的。當杜嘉契益夫司基走上講壇時，全場的人們都起立鼓掌歡呼。這次

歡呼不同的地方，是因爲情緒的誠懇而有力量。杜氏的演講也和別人不同，因爲他從不看講稿。在一般老布什維克的英雄時代，那種演說作風原是很流行的。自從取締邪說和托洛斯基被開除後，一般人都怕失言，因此一切演說，都是照着稿子念的。

杜氏是一天才演說家，演詞感人至深。軍械和新兵增加的百分率表示紅軍偉大的威力。人們都靜默地聽着，似乎每一句話都有魔力。我看見史達林也表面地讚揚杜氏。

閱兵典禮是我所參加過的一長串雄偉的奇觀。我起初做學生時參加過遊行隊伍，但後來則爲觀禮的來賓。杜氏因伏洛希羅夫請假，主持了閱兵典禮。此次有一意外事件，後來頗有諷刺的重要性。土耳其軍事代表團剛來莫斯科。我很想替他們弄幾張入場券，俾得參觀紅軍的雄姿。

我各處設法，都不成功。有人勸我找包克爾和伏羅維治。他們爲格別烏的高級官員，負保護史達林的責任。凡史氏所到之處，他們有權過問入場券的分配。我和他們接洽後，馬上成功了。這很顯明的，史氏的性命實操之於他們二人手中。如果他們要謀害史氏是極容易的。雖然如此，在一九三八年整肅運動中，包、伏兩人，都被控爲謀刺史氏的恐怖黨。真正的理由是一般格別烏的高級人員，都會辦理整肅審判中主要被害者的調查工作。外間却不知道雅哥達以及他各部門的負責人都在一九三八年被槍決了。這完全是滅口的計劃，因爲只有他們才知道一班被害者的「供詞」是如何獲得的。一切清算別人者也被清算了，使死人不能說話。

鐘鳴十下時，一陣奔騎的蹄聲，打破了紅場的沉寂空氣，杜氏乘着馬經拜占廷高塔下的教主門入場。莫斯科衛戍司令科克，騎在馬上向杜氏敬禮並報告檢閱情形。閱兵台上擠滿了人。史達林立於列寧墓上，兩手扶着石欄干。杜、科兩氏，被包圍於他們的僚屬中，立於史氏下面，開始了檢閱。荷着上刺刀來福槍的步兵，騎兵，載着高射砲的卡車，以及大型，小型，水陸兩棲型坦克，一隊一隊走過。阿克西斯斯指揮的空軍飛機佈滿了天空。這真是一個最光榮的日子。誰也不會料到這位列寧墓上看檢閱的人，會不久將這種偉大力量的創造者及指揮者指控爲賣國罪人而加以殘殺。

在西方國家中，竟有若干政治家及輿論相信這些紅軍高級將領勾結納粹的無稽故事。史達林在全球都有浩大的宣傳力量。但聰明的讀者會追問他們掩飾了一些什麼事實。兩年後，史達林與希特勒協定將問題明顯地答覆了。此一協定註明史、希之間，早已進行長時間的秘密談判。史氏本人就犯了他所藉口殺害這一班將領的罪。

有人懷疑杜氏和他的一派對於德國縱無直接接觸，也具有政治同情，並曾向德國投下試驗氣球，以窺測其反應。

。這種想法，是昧於史達林與伏洛希羅夫在軍隊中控制的力量。凡關於軍中的政治問題，縱極微末，亦非杜氏，加馬尼克或伏氏可以處理，而必須獲得政治局，那就是史達林的具體訓令。至於涉及對外國的問題，縱為純技術的，則此種程序的實行更為嚴格。每一關於對外軍事技術援助的合約，都將在政治局中，逐條研究。一切通訊，均受嚴格監督及管理。我知道蘇聯軍事領袖絕對不能瞞着史達林及伏洛希羅夫與外國代表進行談話及書信往來。

這些將領的處死刑，使紅軍受到可怕的打擊，因為他們不獨為領袖中的菁華，而且在預料到的反法西斯戰爭中，他們都可以組成蘇聯的參謀及高級指揮部。此後在芬蘭戰爭中的失敗以及德蘇戰爭第一年的慘局，即可證明。我認為這些被史達林殘殺的將領，不獨不致於作此種罪行，即心理上也會想不到。他們都矢志於祖國。若干年來努力建設紅軍，其最後目的，即為準備反納粹及反法西斯戰爭。

史達林——希特勒協定及史氏的對外政策，暴露了他的狡詐陰險。他深知杜氏及其他將領均為堅決反對納粹德國而主張聯合民主國家反抗希特勒者。因此，他需要排除他們，俾能完成他與希特勒的協定。

俄國保皇黨在巴黎的機關報伏茲洛茲地尼會刊登一個名叫阿力西也夫的一篇聲明，指控杜氏。據他稱杜氏當參加英王喬治五世喪禮並與英法進行談判時，即與德國參謀部進行密切勾結。隨後阿氏以德國間諜罪名，在法國受秘密軍法審判。

史達林從一些同時為格別烏和格殺打撲做特務的人們獲得此項偽造事實。格殺打撲的目的為雙重的，一方面剷除紅軍最優秀將領，俾希特勒可以隨時出擊；一方面助史達林愚弄民主國家。得到了這些捏造的證據後，史達林開始向捷克的政治家，並通過他們向英法說明杜氏的罪狀。只有如此，史氏才能繼續進行他的兩面騙術，直到他和希特勒結盟時候。

一九三九年八月廿九日，史希協定簽字六日後，納粹報紙法蘭克福日報會登載一段消息，說明紅軍將領及其他蘇聯領袖的被害究竟是為了誰的利益。消息的標題為「德蘇協定的歷史背景——莫斯科通訊員寄」。

「（莫斯科廿七日電）……德國和蘇聯的友好，經了好幾月的努力，方獲成功。在蘇聯國內，近數年來會發生若干組織上及人事上的變化。我們認為此種變化，乃通史發展中所不可免的前提。蘇聯上層社會生活中，有若干人會因托洛斯基的罪名而被清除，此一事實無疑地為蘇德友善中一極主要因素。」

基於將才的缺乏，德蘇戰爭的初期，紅軍受到了慘敗。這證明希特勒會為納粹德國利益，利用了史達林的罪惡的愚昧，和盲目的嫉妬。為此，俄國人民得付去數百萬的死亡，全國最富庶的區域被破毀，並受了兩年的潰退及納

粹佔領。在擊退希特勒以前，一般青年士官，要得從流血的年代中的悲慘學校獲得訓練，俾成爲新的將領。戴維斯會說過，有遠見的史達林，會爲預備在反希特勒戰爭中，肅清第五縱隊，所以將紅軍將領殺害了。這是絕對不符事實的寓言。

三〇、一位軍火輸出者的苦難

我的信託公司最大的一宗軍火生意，是與土耳其交易的。土政府從蘇聯獲得八百萬金元的信用，訂期廿年無息償還。這筆貸款，目的在於使土蘇兩國在政治和軍事上更密切合作。我和土大使華西夫培簽了合約。大批的坦克裝甲車和大砲，偽裝成普通的汽車，由土國運輸艦裝出。中央政治局會命我們要運出去最優良的設備，而我們也盡力奉行這些命令。製造這些軍用品的工廠，特別注意到品質方面，俾我們的出品，能與西方列強抗衡。

很可異的，雖則史達林和伏洛希洛夫對於供應土國軍火的交易，曾數度在中央政治局提出討論，而對於最重要的問題，究應交出若干數量的坦克和裝甲車，則未作指示。這是因爲事先忽略了訂價的問題。貸款既有一定限額，故訂價是很重要的，我得向羅生高爾茲請示。

「我們送中央政治局的計劃中，每一輛坦克，裝甲車，大砲和防毒面具應怎樣討價呢？」我問他：「這裏是我們的生產成本，和紅軍所付的官價，但你當然清楚，這價錢是很低的。土耳其人可以獲到多少貨品，要看價目才能決定。」羅氏考慮了一回。這個責任很大，他有點不大願意負擔。他坐立不安地望別的地方。

「你知道應該怎樣辦？」他說：「你有我們競爭者——克魯伯和維克爾斯的價單，自己打算一下罷！」

「是的，亞加堤巴夫洛維治。」我說：「但用什麼原則來計算呢？」

他將我揮開：「用你自己的判斷力就是了。」

到底還是土耳其人幫忙我決定了。土國陸軍部長派來一個軍事專家代表團。雖則凱末爾已經廢除了「巴沙」的稱號，這個代表團的團長仍被稱爲「巴沙」。這班專家們向我打聽坦克車和裝甲車上裝的機關槍，和一些子彈，是否以仿照德國的口徑，使我感覺驚奇。

這是什麼意思呢？德國口徑的機關槍，會使他們靠德國供給彈藥。「他們預備打誰呢？」我問我自己。我對羅生高爾茲指出，土耳其也許有一天用我們的配備來對付我們。我告訴他，我們送坦克圖樣到土國的人，曾經報告說

：土耳其參謀部內，德國人勢力很大。他沒有回答。我又說：土國人用現款買軍火時，他們喜歡和法國，德國或瑞典接洽，而不向我們購買。羅氏裝作未聽見我所說的。

我無法可想，只得決計討最高的價錢，因而將交貨的數量減少。政治局核准了我所擬的價目和數量。我把計劃送交華西夫培後，過了兩天，安哥拉覆電表示接受。很明顯地，土耳其人對於這些事不願計較，反正有廿年可以付款，天曉得在此冗長時期中將會發生什麼呢？

我所售給土耳其人的貨物中，包含數百輛軍用卡車，和一百輛供安哥拉市政當局用的公共汽車。後面一項是頗有趣的。一個像土耳其般的落後國家，爲它十五萬人口的首都，訂一百部公共汽車，莫斯科有三百五十萬人口，但不到四百輛，其中三分之一經常在修理中。土耳其人很明顯地將我們的出口品看作禮物了。

我們預備交給土國政府的坦克，我是列寧格勒坦克工廠承造的。我獲悉這工廠正因爲修理機器而暫時停工，但還有一些坦克預備交給紅軍用。因此，我向杜嘉契益夫司基請示，可否將其中一部份先給我交付土國。

「我很願意給你，」他說：「但我想你不應當交給他們，看這份報告罷！」我讀了遠東軍司令的報告書。那是關於蘇聯和日本軍隊在蒙古邊境作戰的分析，這時候，邊境衝突相當激烈，雙方都用了坦克，大砲和空軍。報告說，紅軍對於使用坦克車，經驗不大好。這些坦克車是用釘子裝製的，砲彈的震動力往往將釘子彈了出來，對於駕駛人和坦克兵的威脅，好比槍彈的一樣。而且這種坦克，很易受反坦克砲的損傷。那報告書建議，以後製造坦克，不宜用釘，而用電焊。

「這是我們停止製造這種坦克車的原因，」杜氏說：「你告訴土耳其人耐心點罷。」我們雖未把他們所須要的坦克立即交付，但後來他們仍獲得了電的新式坦克車。

七年後，我在美國報上獲悉美國坦克工廠——其中之一是克萊斯勒廠——被迫停止製造坦克。這時北非洲的戰爭，正在緊急關頭。停工的原因爲釘子裝製的坦克，不獨易受砲擊，並且往往對於車中的人們，發生危險。砲彈的震動力往往把釘子震彈出來，像槍彈地危及性命。這項新聞，一如七年前我和杜氏所見的報告，一字不易。我很奇怪，爲什麼俄國對坦克經驗的秘密。一直保留到美國竭力重建軍備的初年。

我對於這一個消息，特別抱憾，因爲我原可以把我的經驗告訴我的新國家同胞。但爲了不能控制的情形，使我失去機會。我初抵美國時，我在巴黎結識的顯要美國友人李普曼曾介紹我到克萊斯勒廠接洽工作。因爲交涉拖得太久，我後來被迫尋了別的職業。

回到關於土耳其的交涉。經過數月的稽延他們所訂的坦克，軍火，卡車和公共汽車，都已集中在敖得賽的碼頭上。同時，土政府派了船從伊斯丹堡來接運。羅生高爾茲來了電話，着令停止裝船。

「但爲什麼，阿加堤夫洛維治？」

「執照管制局剛通知我說，這批貨物不見於政治局核准的本季輸出計劃中。」

「但這是在全年計劃已獲批准的，而且政治局關於交土耳其的物資會採取特別決定。土國大使會請我加速運出，也許我們要受到處分的。」

主子正忙於其他事情。笨重的官僚機器無法推動。土輪只好半空着開回去。但分季計劃是較商業，常識，和信用更重要的。政治局如不允許把這批物資包括在計劃中，羅氏是無能爲力的。就是他同意了，敖得賽的海關當局也不會讓貨物裝船。

爲了這些具文，我們損失了不少寶貴光陰。我會提醒了羅氏，爲了迅速起見，有時不待莫洛托夫的公文，就先將政治局的決定抄給我。他有時並直接向政治局請示，以圖節省時間。

「草擬一個政治局方案，巴明。」他有時對我說。他將方案修正後，就趁主子見客時呈閱。每一件事都得有史達林的魔術簽署，它不獨發現於我們的售貨和資金運用計劃上，即我們的運輸計劃中，也不能少。

我強調史達林對於我們工作管理的嚴格，因爲在第三次莫斯科審判案時，羅生高爾茲曾被逼供認爲托派破壞者和法西斯代理人。他也被逼供出會侵吞貿易部公款，資助托洛斯基的國外陰謀，並明知國內工廠因缺乏金屬原料不能開工，而把大量生鐵故意輸往日本。他供狀中所述的一些經營，據我們知道內幕的人看來，都是除非獲得史達林批准，無法辦到的。凡曾在蘇聯商務，工業和財政機關以及黨部服務的人們，一看這種供詞，立即知道不可能成爲事實的。

當我讀到羅氏供詞提及故意將生鐵輸日，以阻碍蘇聯工業，並助長法西斯勢力的時候，我不禁感到極度的反抗和厭惡。我記得羅氏每次召我到他辦公室宣示政治局核准的關於我的公司的出口，在這些決議上，我得親自署名，表示執行責任。我也記得在那裏常遇到技術出口部的總經理波里斯查克，他的公司是經營鐵路，農業機械，和生鐵的輸出的。主要市場是東方國家。我憶起在一張有史達林簽署的指令上，在關於我的公司對新疆的軍火和卡車輸出一段下，有一段是關於技術出口部的。其內容大致如後：

「技術出口部本季計劃中所列的生鐵輸出數量殊屬不夠。因此，我們決定將其提至若干萬噸，並指令對外貿易

部羅生高爾茲同志和技術出口部波里斯查克同志，負責把這表中所列補充數量於卅日內輸出於國外市場。關於這節，應特別注意這一種物資，在日本，土耳其，和波斯的有利價格。阿陽尼基茲和比亞德可夫同志，跟羅生高爾茲同志協商後，應負責督導有關工廠，於規定期間內，把必需的數量交出。黨管制委員會主席葉靈夫同志應監督這項決定的實施，並把結果向政治局具報。」

可憐的波里斯查克決不料到他的長官，也許連他自己在內，會爲了執行主子這個「具體指令」而喪失腦袋的。波是執行這項決策的人，但他的名字未見於審判案中，因爲他對於這事是知情的，也許早已失蹤了。

羅氏如想爲自己辯護，也很可以引證那時的真理報。其中對於鐵的輸出的增加，尤其對日本的，極表讚揚，認爲這是俄國工業化成功的證明。該報編輯麥克思，也是史達林秘書之一。

因爲我的需要和紅軍衝突，我常感到不易獲得出口的軍用物資。我們的工業，不能同時滿足兩方面的定貨。因此，我常得請參謀部幫忙，並且遇有重大的麻煩時，找加馬尼克和杜克海舍夫斯基。我們有時謀得折衷辦法，或則停止他們的訂貨，或則停止我國外的交貨。如不能獲得協議，我的長官羅生高爾茲就出面向軍部首長交涉，或請史達林作主。

雖則我的輸出，使他們很傷腦筋，但參謀部很合作。有幾次，他們從軍火庫中將我所急需的軍火借給我。有時兵工官員將不能用的火藥或過時的防毒面具充數，杜氏和他的助手總是幫我的忙。砲兵和坦克部門最優秀專家都和我们合作，協助我們做技術規定，參加與外國購置代表團的談判，並主持實驗。我記起在某次招待會中，坦克兵的首長卡聶斯基笑對杜氏說：「巴明使我的官員們做了許多額外工作」。並要杜制止我這種「剝削」。但一般地說，軍事專家們都極幫忙，並做出第一流的成績。我唯一遇到的困難，就是我的老友和同學阿克西斯的空軍部門。他爲了發展蘇聯空軍，自己已忙不過來，所以他的官員無暇爲我們工作。

我同軍部的關係很融洽，而且彼此都有諒解。雖則這是對於貿易部很有利的，但羅氏總以爲我過於聽信參謀部的意見。

「你既是汽車出口公司的總經理，就最好忘了你後備軍人的地位。不必管什麼精誠團結，對於參謀部的朋友，是不宜於太容易講話的。」

年中時，我的公司業務，正突飛猛晉，軍部忽然調我參加三個月的訓練。羅氏對此頗不高興。但我指出在政府工業，和外交部門中的高級人員，有好幾十名後備役人員，都同時被調。

但羅氏有他固執的典型官僚思想。兩個月後，我從訓練班回來，他很滿意地接待我。

「現在你成爲平民了。」他說。「經我請求的結果，政府已命令你退出預備役。參謀部雖曾提出抗議，但仍然核准了。你現在可以去拿退役證明書。從此你可以向他們說：你是百份之百的國外貿易官員了。事情就是這樣的。——這一意外發展，既未對我們有任何益處，也未減輕我工作困難。但這事使我獲得一部份補償。紅軍對於退役軍人，發給等於服役時期的退役金，而作戰時期，則以雙薪計算。以我十六年的軍役和及旅長階級，總數達數千盧布。我這時正計劃爲我母親和孩子們添置些衣服，改善食物，並到南方休息。這筆意外收入，使我解決了問題。」

一九三四年底，政治局派我和阿富汗大使談判軍火輸出問題，包括飛機，山炮和其他軍備，以優厚的信用條件交貨。

因爲阿富汗是蘇聯和印度間的緩衝國，英國人對於阿馬弩拉王和蘇聯間的日增友好，很不喜歡。這時候，一位名巴察薩科的酋長糾集武裝部隊，反對阿馬弩拉，獲得英人支持，並向首都進逼。莫斯科獲悉阿王的權力可能崩潰，中央政治局遂決定派遣兩師精銳紅軍赴援，阿富汗軍政部長也跟着指揮官出發。但當紅軍預備開入希拉特，巴已擊潰了政府軍隊，阿馬弩拉逃亡義大利，莫斯科鑒於大勢已去，只得即把軍隊召回。這次軍事行動，極爲秘密。外間竟未知俄國在阿富汗的戰爭，是間不容髮的。

英國人不久發現巴察薩科不是容易駕馭的。我們也許最好乘機贏取巴氏的信心，以抵制英國。但史達林則不願意跟這一位打倒了王族的農民發生任何接觸。隨後英國將巴驅逐和處死。另立那迪爾王。史達林決計跟那迪爾王交涉。我和阿富汗大使作了多次的談判，但他似乎極爲愚笨，談判一無進展。後來我想：那迪爾王的大使也許並不魯鈍，而僅係玩着英國人的把戲呢！

中國西部的龐大的新疆，也是我們注意的另一個對象。它與中國其他部份被沙漠阻隔，而與俄國毗連，似是蘇聯入侵的理想地域。當我開始設立新公司的時候，政治局已決定予新疆主席以全力支持。他這時正被回教叛軍包圍於省會中。這些叛軍，據我觀察，或係英人鼓動的。我負責把軍火輸入新疆，工作極爲困難。

新疆省會已受叛徒威脅。政治局派了兩旅格別烏軍隊和紅軍的空軍單位，來打通道路並消滅叛軍。同時，政治局着令把一批飛機和炸彈，運至新疆邊境。因爲通迪化的路被叛兵遮斷了，軍火無法運達。最後，紅軍把炸彈投於叛軍中，並將飛機降落於被圍城中的機場。我奉命將炸彈和其他物資的賬單，送交新疆主席。

蘇聯軍隊擊敗了叛兵，進達迪化。不久，新疆的親蘇主席就樹立了他的政權。

根據史達林的計劃，新疆要成爲俄國獨享的勢力範圍，和蘇聯勢力在東方的堡壘。我們得完全裝備一萬名新疆軍隊，從皮鞋到國民黨黨徽。事實上，部長階級的蘇聯顧問被派到新疆主席左右，供他諮詢。同時，蘇聯派了以史達妻林舅史伐尼德西爲首的代表團草擬全省建設計劃。我的公司也奉命派出若干工程師，替新疆建築道路，機場和飛機庫。

新疆不久就成了蘇聯殖民地。蘇聯政府給予龐大銀元借款，以保證貨幣信用，控制了它的商業，並監督了它的政治。雖然名義上仍屬中國，但新疆派了它自己駐俄國的領事。中國大使雖知道這情形，却未提出反對。同時在九三五年，蔣介石通過他的空軍部，向蘇聯要求飛機。我奉命拒絕了，因爲史達林不願增強蔣的政府。

爲了新疆的槍炮問題，我和格別烏發生過一件小的爭執。新疆主席告訴我們槍炮是舊的，雖然標明是新貨。經調查後，我們才發現了原來格別烏軍隊，幫助鎮壓了叛兵後，將他們的舊槍換去了我們交去的新槍，並未把這事通知莫斯科。我向羅生高爾茲申斥。他說：「不要和格別烏的人們發生任何爭執。答應對新疆打點折扣算了罷。」

一般說來，我極力使工作不受格別烏的干涉，直到後來才獲悉他們對我十分注意。我的工作日益繁重，每晚得趕夜工，因此請求貿易部添派一名速記員。部裏薦來一位青年女子，她裝飾入時，衣服顯然是從外國購來的，並且膚色很嫩，漆了指甲，帶着珍飾，絕不像一般俄國婦女那般樸陋。她告訴我：她丈夫格羅佐夫斯基，在中央委員會服務，新自國外歸來。她的介紹人來頭很大，我因此要她經手我的秘密函件。事實上，差不多有三四個月，我的一切通信，都交她保管。她對工作，似乎不太熱心，這時請求辭職，理由是要照顧孩子。我畧不抱歉地讓她辭了。

若非四年後我在巴黎避難時，她的姓名見於報紙，我也許把這一小事忘了。那時，報紙正滿載白俄移民領袖米勒將軍被綁的驚人消息。法國警察和報紙，指控蘇的大使館曾主持綁架。他們指出一位享受外交特權的高級格別烏官員在罪行發生後，忽忽離法赴莫斯科。警察疑心他的夫人參與陰謀。她在商務代表團任秘書，但住在大使館中。在調查期間，當局禁止她離開巴黎。她出來時，總坐了大使館漂亮的加的拉克汽車，有幾位館員陪同着。法國警察也坐了小型雪特龍汽車遠遠地追蹤她。

當要求將她逮捕的輿論達到高潮時，她有一早晨照例坐汽車出現，而她車後仍有雪特龍車跟着。她的車駛出郊外，交通漸稀，司機加速馬力，竟一去不返。翌晨報紙宣佈。「格羅佐夫斯基夫人和她丈夫已逃出法國。」那時候，我才悟到當我在汽車轉口公司任職時，曾受到格別烏密切的監視。

我的工作使我和外交團常有接觸機會，尤其是東方政府的代表們。我不獨認識了他們工作情形，並且看到他在

莫斯科的社交生活。在我和齊捷林共事以後的十五年中，已經發生了許多變遷。所有的列強，現在都在這一個世界革命首都派駐了代表，其中最特出的人物，無疑地是蒲立特，華西夫培，和盧加西維克茲大使，分別代表了美國，土耳其和波蘭。外交代表中最奇特的人物，却是立陶宛公使巴爾特魯薩蒂斯，他在戰前是一位有名的俄國詩人。在人事上及政治上，此三年中的莫斯科外交生活，均極饒聲色。但我現在擬敘述一對於許多人頗有歷史意義的意外事件。

三一、傘兵隊的誕生

一九三四年，當我仍名列預備役時，曾奉召加入再訓練班，在莫斯科參謀總部工作了三個月。那時候，我獲得機會參觀紅軍所設計和創造的一種英勇的新武器——傘兵。

許多人都感覺驚奇，這一種精湛的軍事技術，爲什麼竟在工業落伍的國家首先出現。它的起原的故事，從未聽人說過，但我却於無意中得之。這是頗有興趣的，因爲傘兵的思想是輾轉從美國傳來的，但非得于它的工業，而爲從遊戲中得來的。

在我們空軍中，嚴重的意外極多。學生，飛行員，和監視者的死亡率，比較其他國家的高出許多，一九二九年我們空軍首長阿爾克斯尼斯決計派一觀察員到美國研究跳傘的成就。他選了空軍中一位年青有爲的少校米諾夫。我在一位朋友富拉德金將軍處認識了他。米諾夫這時取道巴黎赴美，我正在巴黎，而富氏則爲我購買飛機器材的助手。我們三人一起消磨了好幾小時。米氏對於此行效果，頗感懷疑，因爲他們讓不讓他參觀，和他可以學得多少，都成問題。他說：「如果關於跳傘有任何新東西，美國人是會曉得的。」

他留美國一年，歸途再經巴黎時，對於所見一切，極感興奮。雖美國尚未承認蘇聯，但米諾夫在各處都受到禮貌的招待。他參觀了飛機製造廠，機場和航空學校，對於美國降落傘質地的優良，和訓練的認真，贊不絕口。他又在美國做了第一次的跳傘。

「但你知道」他繼續說——就在巴黎咖啡店喝酒時也不忘蘇聯的思想方式，——「我看見許多可笑的事情。在不景氣中，有好些第一流飛行員，爲了糊口，不惜在游藝場中作跳降落傘表演。我見到一個人在賽會中跳傘。你想，我們認爲救命的發明，差不多是一種醫療工具，竟用來供看熱鬧的人們找刺激！」

是的，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美國。我們未知自有降落傘發明後，美國的老百姓就在賽會中看到跳傘的表演。倖運地，我們在蘇聯，人類的才能是有計劃地分配了的，因此一位有技巧的飛行員不須在賽會上來作這表演種種謀生。

富拉德金和我都預備話題轉到別的事物去，但米諾夫却念念不忘這事。

「仍然，」他說：「你們應當看看觀衆的興趣。如此的驚奇是一定有宣傳價值的。」

在米諾夫呈空軍首長的報告中，他提到跳降落傘可以成爲引起濃厚興趣的一種體育運動，並建議蘇聯人民，尤其是青年的興趣，應當以跳傘爲運動工具，而引向飛行方面。阿爾克斯尼斯把他的意見轉陳政治局，史達林認爲很不錯，立刻發動宣傳。蘇聯報紙中登載了好多鼓吹跳傘的文章，全國各地設立了跳傘俱樂部。一般跳傘者都獲到全國性的宣傳，因此，青年們不甘寂寞，都來加入這一個運動，以爲成名的捷徑。男女青年都極踴躍。

無線電和報紙不斷記載跳傘者的成績，而每一政府宣傳刊物都提倡這一個運動。不久，它的受人歡迎，一如棒球之在美國。他們舉行了各種各類的競賽，並且在不同的情形下舉行跳傘；夜間，冬季，森林上，湖中，單人，團體，帶着軍事設備，或徒手降落。無線電有時傳出類此的消息，某農民的兒子義凡比特羅夫回集體農場訪問家園，他并非趁火車或步行，而係從天空中降落在父親的門前。他的跳傘要在他的鄉間哄動好些時候。蘇聯的跳傘家，男女都有，創造了好些世界紀錄，其中若干人獲得政府獎章。

這個運動結果是數以萬計的年青蘇聯公民都成專門跳傘家。很多人因此養成愛好航空的熱忱，而參加了空軍。別的人經過兩年的強迫兵役（自十八歲開始）後，參加了步兵。蘇聯高級指揮部發現除了每一師團的正式空軍配備外，在步兵中有成千的有跳傘經驗士兵。因此，他們將會跳降落傘的人們分開加以特別訓練，使成獨立單位。

這就是蘇聯的傘兵，如何由於一位飛行員在美國的跳傘表演觀察中所得的印象而發展成功。

紅軍戰畧家已不信西方的革命可以由工人自然發動。只有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發動戰爭才能產生革命。在這一個戰爭中，蘇聯傘兵將降落於敵人後方，組織工人們來和資本主義軍隊作戰。這一個思想，使傘兵感到崇高的使命，並使他們在紅軍上成爲一個上流階級。

一九三五年的紅軍演習，係在烏克蘭西部舉行的。雅基爾將軍請我去參觀，若干列強的軍事觀察家也在場。雅基爾主持操演，除高級官員外，伏洛希羅夫和杜嘉契益夫司基也參加檢閱。我們從山上的一個看台俯視假作戰的表演。

我們看到第一次用傘兵佔領一個適宜於軍隊運輸的着陸點。這項爲時僅數分鐘的動作，極爲深刻。一整個三千五百軍隊的旅團，携帶輕型坦克和大砲，從天上降落下來。最初一千二百名傘兵降落於一個普通美國機場大小的地

區。十分鐘後，他們已將佔領地完全控制，隨即大批運輸機在傘兵炮火保護下着陸。從這些飛機中，卸下輕型野戰炮和小型坦克。

所有外國觀察家，都對這些新式武器表示讚美，很顯明地，它對於戰畧具有重大的意義。我想他們向政府作報告時，一定將這點提出。

在一九三六年中，在不同的軍區舉行了七八次類似的演習，最後一次是在莫斯科舉行的。有莫洛托夫總理和軍事人民委員長伏洛希羅夫出席，參加的傘兵和空中步兵共五千餘人。

在白俄羅斯的操演後，歐布里維茲將軍設宴招待參觀演習的各國軍事代表。一般人們都認為這些國家將聯合史達林與希特勒作戰。宴會中歐氏莊嚴地舉杯說：「我謹向英法和捷克的軍隊和代表們，我們的貴賓致敬。」

英國代表是一個肥矮的軍官——第二阿爾達舒特師團司令。他用最漂亮的俄文代表來賓致答詞說：「紅軍偉大的技術成就，給我們一個深刻的印象。我們很欣佩傘兵的工作，謹祝紅軍和伏洛希羅夫元帥健康。」

這位致答詞者就是華威爾將軍，他現在經過克利地戰役後，想必對於這項紅軍技術成績，更感覺到意義重大。我想他當時對於蘇聯的傘兵情形會作緊急報告。也許在那時候，英法高級指揮部尚為這祇是一種無足重輕的新玩意而已，但德國人則是最首先瞭解它的重要性的。

希特勒立刻建立了他自己的降落傘部隊，以德國的高度效能和組織技術，德國傘兵不久就勝過了俄國的成績。回憶我們奧斯陸，鹿特丹，衣本衣馬，和克利地的登陸就可以證明。德國軍隊從挪威的海峽到希臘的島嶼，創造了歷史。每一個失去的堡壘，都是用社嘉契益夫司基元帥以及他的助手們雅基爾，歐布里維茲，和阿爾克斯尼斯所發明和建設的這一個新武器所佔領的。但史達林已將這些建立跳傘部隊的人們都處死了，使這項工具受到了致命的打擊。當我們將它用於芬蘭戰役中，結果差不多完全失敗。不獨它的組織缺乏領導，而且這樣的用途，也是與初衷相違背的。這些降落於芬蘭後方的傘兵們不獨不為等待脫離資本主義桎梏的工人所歡迎，反被那些給激怒了而為反對蘇聯極權主軍隊而鬥爭的芬蘭人民一一射斃。

德國人則不獨較高明，而且他們的傘兵自始即為用之於劫掠去的，故得稱雄一時。但是，威猛的英美傘兵不久也成立了，就將德國人的優勢擊潰，贏得更多的勝利。

三二、我陷入官僚制度的網中

在我的汽車部裏，主要輸出是一種名「賽斯」的三噸卡車，它是按照美國標準在莫斯科的史達林工廠製造的。我們同時在高爾基城造較小型的卡車和客車，那是按照亨利福特的技術建議和藍圖而製成的。雖然我們遲至一九三四年仍在製造一九三〇年型汽車，但有遠見的福特先生與我們訂的合約，禁止我們將這些車子輸出。爲了供應東方顧客們所需的汽車和卡車，我們得先從國外購入，然後轉售給他們。我因此與英國的獲素公司以及埃及的福特公司訂了合約，指定我們擔任他們在蒙古、新疆和阿富汗北部的唯一代表人。

爲引起國外對我們汽車工業的注意，我們從莫斯科運了幾部滿載的「賽斯」卡車到波斯和阿富汗去參加競賽。這些車子，都有很強的發動機，爲的要有力，而非經濟，因此在不良的道路上，行駛的表演極佳。當地官紳們很熱烈地歡迎了我們的司機和工程師。在波斯某地，我們的卡車走近一條小溪，那上面的橋樑已被大水沖去。有好幾部英美製的車子都等待擺渡過來，因爲它們的機器是比較輕而經濟的，不能涉水。我們的司機加上油，毫無顧慮地開過彼岸。經過這次表演，我們在波斯和阿富汗售出了很多卡車。

我建議在芬蘭舉行類似的表演，並送兩部汽車參加巴黎的汽車展覽會。羅生高爾茲拿我的計劃向克姆林宮請示，但未蒙史達林核准。

我的公司在倫敦銀行的賬上，尙存有四、五千英鎊。這筆錢係英美行家爲我們在東方市場代銷汽車所付的佣金。這時候，有幾位波斯和阿富汗的顧主，行將抵達莫斯科接洽生意。我建議動用一小部份存款，購一部講究的美國汽車，專供招待他們之用，將來即保留它爲公司財產。羅氏不能作主，須請示主子，而主子則不贊同，只得作罷。因此，爲了招待我的客人——汽車公司的客人，我得向旅行局借車子。

基於同一理由，對外貿易並不較易於我在莫斯科的工作。某次，我派了助理到波斯，簽訂了二五〇輛卡重的合約。同時，對外貿易部副委員長伊利亞華才從德黑蘭歸來，對於那裏情形，極表樂觀。根據他的報告，政治局就命令我的公司將對波斯出售的汽車增至四百輛。但因羅生高爾茲那裏某一位職員的疏忽，竟未將政治局這項決定通知我。我對此一無所聞，直到黨的管制委員會傳我進去質詢。這個委員會是一個可怕的組織，它經常注視共產黨員主管們的行動。

那時候委員會的主席是葉壽夫。他於雅哥達被殺後，在一九三七——三八年最瘋狂的整肅運動高潮中，任格別烏的主持人。某日，他突被免職失蹤。關於這位權勢赫赫的人物，曾做過中央會書記和管制委員會主席的命運，竟無一字提及。據說他結果進瘋人院。這是很可能的。

葉氏的助理佐可夫斯基嚴厲地盤問我一番。

「這不是我的過失，」我說：「命令從來不會送到我那裏。假如這樣重要的決定，別的人都送到了，除了它的執行人，那麼誰應負責呢？」

「不懂得法律是有罪的，政治局的命令有法律的效力。」

「無論如何，命令是執行不通的，因為蘇波銀行不能再給予信用。」

至此，佐可夫斯基發脾氣了。他是不喜歡人們和他辯論的。據我後來學到，凡是被他喚去調查的官員，最好立刻認罪。「行不通」這句話是不能用於政治局的決定的。在此次他却裝成驚訝的樣子。

「說什麼？難道你說我們的輸出要自己的銀行來供給資金嗎？誰獲利呢——當然是資本家的商行。我想你覺悟你犯了罪罷！」

很顯然，他對於我們和東方交易的方式完全不明瞭。一般輸出國家都設立銀行，其目的為便利他們自己的商業交易。我們在波斯的合約，是和與一家名拉馬薩諾夫公司所訂的。它一方面要供給波斯經手人的信用，但為了交付貨款計，不得不向蘇波銀行借款。但這是不冒風險的，因為銀行直至債務清償為止，對於貨物享有所有權，且拉馬薩諾夫也是信譽極佳的。

我力圖解釋，但佐氏似乎不願意明瞭。另一件事使他更怒。我派去德黑蘭進行交涉的助手諾德爾不是黨員。「巴明，你犯了很重大的偏差。整個事情都有疏忽，我們對你要採取步驟。」

我深知獲得寬宥的機會極微小，唯一的補救，就是執行政治局的決定。為此，我只好向莫斯科國外貿易銀行商量借款。它的主任史伐尼德西似乎贊助我。但當我要款子時，問題來了，因為管制委員會有電話來不許撥款。銀行的職員表示很抱歉。我見到他們都被管制委員會嚇壞了，並且訓令德黑蘭的蘇聯銀行停止一切對拉馬薩諾夫的信用，因此使我連原訂的二五〇輛卡車的交易合約也無從執行。我回家時，發現格到烏的經濟組也要我問話。這說明我的違法有兩個機構在同時進行調查。但格別烏聽到管制委員會已進行調查，它就攔起了自己的調查。

我去問羅生高爾茲的助理羅于諾夫斯基，究竟會有什麼處分？他說：「我猜你會受譴責。」譴責為黨的紀律

次一等處罰，其次序爲——警告，譴責，嚴重譴責，開除黨籍。

施基里亞托夫是葉濤夫的另一助理，審訊我的事件委員會的主席。這時候拉馬薩諾夫的商行發現蘇聯銀行已取銷貸款，獲得伊朗銀行的支持，仍能按時交付訂貨的價款。這一事實對我頗有利，但因交貨日期已過，以及交涉已告中斷，想把對波斯輸出數額增加，俾符合政治局的決定，已不可能。管制委員會的干涉，完全誤了我們的事。事實上佐可夫斯基不獨破壞了我們輸出的計劃，並毀損了我們在波斯的財政信譽。羅生高爾茲和羅干諾夫斯基明知如此，但他們面對黨的審判員，也不敢將真理說出。

佐氏的譴責報告中，指我玩忽了職責，對於一個資金不健全的商行訂了合約並給予信用，因此使國家在物質上蒙了損失。我引述了伊利華的有利報告，並說明拉馬薩諾夫，雖在蘇聯銀行停止通融後，仍繼續付款。波斯銀行對它的支持證明它的地位不弱。因此，我們並未受到經濟損失。

我覺得我的辯白徒然增加了委員會的惡感。施基里亞托夫改變了攻擊的方式。

「但政治局的決定未曾執行。」

「我不會獲悉這一個決定。迄至目前，我已竭盡全力，如不能成功，不是我的錯過。」

「政治局的決定，是無人可以漠視的。」

在同一審訊中，蘇聯油類出口公司理事之一的列夫斯基，也以類似的案件被傳訊。他自始即未辯護，僅請求委員會寬恕。散會時，羅干諾夫斯基對我說：

「你做得像孩子一樣。爲何不承認錯誤？那麼，可以像別人一樣，獲得警告就了事了。」

列氏真的只受警告，而我則被譴責。此乃我入黨以來十七年中首次獲得處分，而且因爲它的不公平，使我痛心。羅生高爾茲拒絕干涉。當我指出重工業委員長阿陽尼基茲爲他的同事受譴責，也曾向葉濤夫抗爭時，他命我向伊利華提出申訴。他打電話給葉氏，但未發生效力。葉氏那時候是史達林的新心腹，在幕後握有大權，即一般黨內顯要，都畏之如虎。

爲了公事，我常去莫斯科的史達林汽車工廠和尼茲尼·諾夫哥羅德的高爾基製造廠。這兩個廠都經常處於緊張狀態中，工作日夜不停，黨的督導員隨處可見，主管們都疲於奔命，連修面，睡眠和就食的時間都沒有。在任何時間，都可以看到一些新危機，工人問題，原料問題或管理問題，不斷的亂哄哄。但無論如何，汽車生產的計劃得照常進行，否則每一負責的人都有付出生命代價的危險。

我仍記得史達林工廠的主任李嘉哲夫，跑來跑去，面色發紫，在一些工程師和監工中，喊罵和發誓。他那裏是一個活地獄。忽然，中委會來電話，他跳起來接，又是新麻煩來了。他手下有二萬五千工人，其中一萬以上正在建造新的工場。有許多必要的東西，是應當由別的工業供給的，但他無法獲得，所以一切都得自己創造。這增加了他不少困難。

在高爾基也有同樣的情形。狄亞可諾夫之下有二萬五千至二萬七千工人，另有一萬五千工人在建築新廠。他日夜都在廠中，但他各部門主管很難有機會每星期和他詳談一次。他的辦公室堆滿了辦不完的公事，看不完的命令，計劃，圖樣。全部光陰都消磨在會議和處理各種的意外和小節上。他犧牲了一切，但還不能避免最後失蹤的命運。當一九三七年——三八年中，數以千計的公司，工廠，國家農場，器材庫主管們都遇到同一命運。他們都消失于虛無縹緲中。新人雖來，而制度仍舊。

在汽車工業體系中，李嘉哲夫和狄亞可諾夫都受命於一位從美國回來的以前無政府黨工人戴貝特斯。戴氏于一九二〇年回俄國。因他在美時與布哈林相識，故由他介紹入共產黨。他精明能幹，對於汽車工業貢獻至大。一九三八年戴和他的助理邁爾斯一同被捕。在中央委員會的檔案中，曾有布哈林推薦他的證件，那是很壞的。廿年來，凡被布氏推薦的人們，都遇到同一的慘運。

我記在一九三一年曾在安特衛普看見福特汽車廠的主任，使我驚奇他的工廠管理方式，與蘇聯的有天壤之別。他在工廠中心一間玻璃隔間的辦公室接見我。他的桌上，只有一本拍紙簿，完全不像一位蘇聯工業主管桌上的擺滿了各種公文，圖樣，雜亂無章。他本人也幽閒快樂，偶而通一電話，毫無緊張氣氛。在一個習於蘇聯制度者的眼光中，簡直不相信任何工廠可以如此順遂平靜地進行。我離開時，對於美國的管理方法，羨慕不已。

另一次，我帶了一位老布什維克阿波倫斯基·阿辛斯基，參觀巴黎的雲特龍汽車廠。阿氏學問極淵博，並為第一位獻議設立汽車工業者。雪特龍先生對於我們的計劃和成就，很表示興趣。阿氏想誇耀五年計劃，微笑說：「我們高爾基工廠的生產量超過你們所有工廠的總和。」

雪氏很得體的回覆，畧如下述：「我很敬佩你們所作的努力。不過像這樣集中的工業，須要超等的技術效率，生產的傳統，和源源不絕的原料供給。如果這些條件尚未具備，則我認爲寧可設立若干分散的小型工廠，似較有利，因爲龐大工業的管理殊不易作好。」

我們知道這位聰明資本家和富於經驗的工程師的意見是一點不錯的。在不同的環境下，蘇聯對美國工業的盲目

做效，產生了悲慘的後果。史達林獲到了這些慘痛經驗後，也翻然變計。從前他所認為魔術的「美國制度」現在成了罪惡的「龐大狂」。當然，他要找許多羔羊來贖他早期的錯誤。

我此後即再未遇到阿新斯基。他後來主持中央統計局，隨後被捕入獄。如一般在最早時期即為共和國服務的人們一般，他也被控是「人民敵人」。

有天，阿陽尼基茲來莫斯科汽車廠，看見了一部作輸出用的發亮的卡車。我會堅持凡屬出口卡車，都要漆得光彩，與國內用的迥異。

「我要求所有產品都做到這種品質。」他對李嘉哲夫說。

李氏眼也不瞬地回答：「好罷，我遵辦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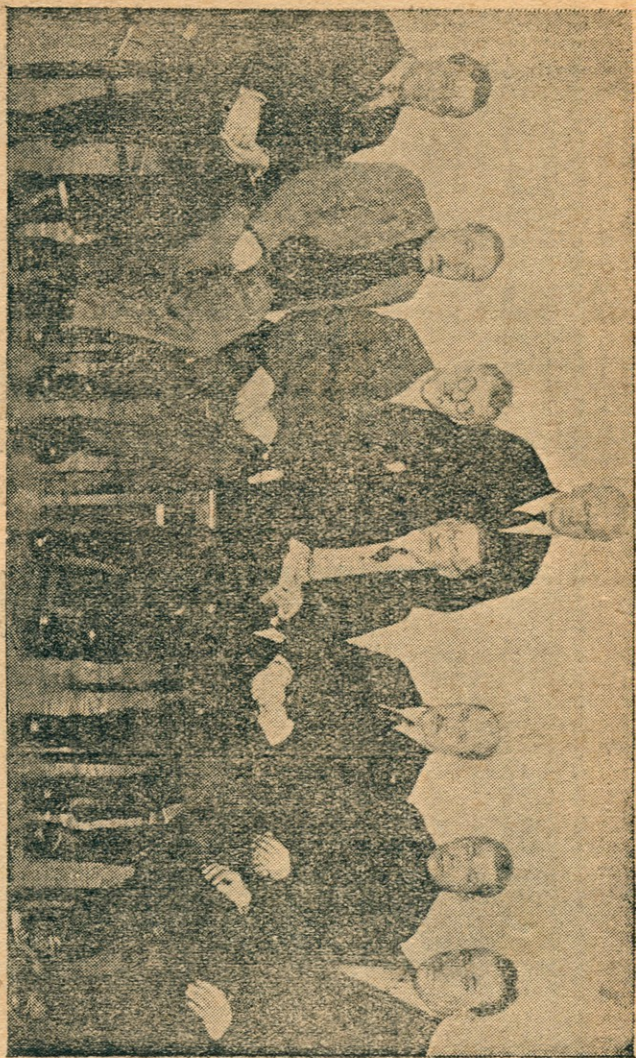
當然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廠的技術設備經常用於增產的競賽上。阿的另一口號：「將計劃增進一步」，使它不可能做到。

當我正忙於一個有關的問題時，有人告訴了我這個命令。我的三噸卡車是極強的，波斯司機們，有時帶私貨，裝了六七噸貨。我們的卡車是按俄國公路的載重力，將馬力和載重，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差額來製造的。這種車型太重，力量太強。因此，我建議將模型修改，製造一種較經濟的六噸載重卡車。但這樣需要在某些方面更準確更標準化。

我帶了很多波斯司機的請求信，很便利地獲得李嘉哲夫和卡于諾維治的同意。汽車雜誌也刊出我關於這問題的論文，但阿陽尼基茲則將建議擱起來，只說：「不行，最好等到我們成立一個新廠。款子和人力都不成問題。」他妄想只要發出一道命令，就憑空可將產量增加，但一提到創造新的和較經濟的模型時，就失去創發力了。總言之：他寧可將資金用於建設新廠，而不願改進原有的技術方法。

如我所云，我們將一些獲素和福特廠的華貴流綫型汽車運到蒙古和新疆。同時也供應一批自製較粗劣的卡車。從紐約裝箱運出的福特車要經過數千哩的海程才運到列寧格勒和敖得賽，再經過七千哩的鐵道達到西伯利亞和啓耳基茲。在韋克紐丁斯克，這些漆成藍色，鍍鎳的福特車，要從箱子中拿出來，駛過泥沼縱橫的道路，運達蒙古的首部烏蘭巴托。

蒙古政府將汽車分配於一般高官們和人民黨的首長。這般官員都是酷嗜狩獵的，不久就發明了新的方式來利用這些近代技術的產物。他們命司機開車到草原去，射擊被驚的野兔和禽類。這樣用汽車是很易損壞的，我們就得供



蘇維埃聯邦和七名主席（由左至右）——哥耶夫（烏伯基斯坦）一九三八年被槍決；馬沙比哥夫（白俄）生於一九三八年遭槍殺；比陀夫耶夫（烏克爾斯坦）同年失蹤；加里寧（俄羅斯）尚存；捷維魯夫（捷克斯拉夫）生於一九三八年遭槍殺；愛塔哥夫（土耳其斯坦）生於一九三八年遭槍殺；歷廉比耶夫（蘇聯）前任蘇維埃聯邦秘書。後立者為瑪諾基斯，前任蘇維埃聯邦秘書。



前任對外貿易委員，蘇空軍總司令維生高爾茲，於一九三八年被控賣國，在莫斯科受審，後遭槍決。



前任政治局委員，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秘書基羅夫，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列寧格勒被殺。

應許多零件，那是須要冗長的時間，才能到達的。

波斯和土耳其的，文明較高，問題也不同。我們跟他們貿易要有很大的伸縮性和效率，因此我們要改變經營的方式。在俄國，我們可以出售不附配件的汽車。顧主如需要零件，不妨等幾個星期。而在波斯和土耳其，如果我們不能供給，他們可以從別處購買。因此我們必然失掉生意。在羅生高爾茲主持下的一次全體公司主管人會議上，我建議在亞斯哈巴得，巴庫，和敖得賽設立零件庫，使我們能更迅速地應付訂貨，但部裏的官員消極地抵制了我的計劃，毫無克服辦法。

我的話說得很嚴重。他們默默地聽了，而我的計劃也被打消。羅氏這這時候待我很誠摯，但此際却故意改變了友誼態度。我竟敢於批評官僚制度了！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他過度敏感的脾氣認爲我攻擊了他所主持的一個體系的精神。

日子久了，羅氏對我的冷淡更加露骨。他的部下對於這種情形是看得見的，因此我的工作受了阻碍。我所爭取的技術專家始終未派來，而我的報告也延擱了不覆。最後我遞了辭呈。我知道他接了我的信，但兩個月內，雖則我們經常晤面，尚無下文。我知他不願提起，但仍堅持辭職。經過了兩年汽車出口公司的工作，我已無意再置身於蘇聯對外貿易的高級官員中。同時政治情形和黨內生活，使我極端厭倦，又想如何恢復我寂寞的學習的生活。我希望參謀部也許可以幫我進航空學校。因此，當羅氏最後批准我辭職，我去和他道別時，我對他的情緒差不多是很友善的。但我們都未料到，此爲最後的一次握手。

羅生高爾茲那時剛過了五十歲，是一潤肩膊，漂亮的猶太人，有很厚的下顎和鐵的性格。我會遇到他前妻所生的女兒，面貌和脾性都很像他。這是一九三五年我在高加索的嘉格里休憩所居住的時候。她正要到她父親友人在拉科巴的別墅去。那晚，我們在休憩所的平台跳舞，我就覺得她似乎強作歡顏，心上實有難言之隱。有人告訴我說，她的婚姻不甚美滿，兩日後消息傳來，她已在山上自殺。

她父親住在克姆林宮附近一所公家房子，渡着退休的生活，將夜間用於工作。他爲一具有魄力的主管人材，愛權勢，爲一位天生的官僚。而當我與他相識時，則效忠於史達林。但當戰爭時，他已獲識托洛斯基，並且在一九二二——二八年，參加了反對派。在那時，這一派人還有幾分成功的希望。此後，他就小心翼翼地，並且毫不猶豫地爲史達林服務。

他最近和一位年青女子結了婚。她會在他的辦公室做事，是一位快樂的紅髮女郎，學問不高，而出身於宗教家

庭。當整肅的空氣日益惡劣時，她爲了迷信倖運，將一個宗教牌子給丈夫帶在袋中。這件東西在他身上發現了，後來第三次莫斯科審判案中，被帶到法庭上。原來不過是一位受驚的和迷惑的女人所爲的一種恩愛表記，却成了譏諷的對象。在判刑前，他受了史達林的檢察官的不少嘲弄。

他供認了自己叛國和破壞的罪名後，最後的遺言是「史達林萬歲」。翌日，他就給槍決了。

三三、同志們！生活更快樂了

在我的三年莫斯科工作期間，一九三三——三五年，史達林的政策，起了最急劇的變化。那是自他得勢以來最劃時代的。這些變化不獨決定了蘇聯的命運，而且在廣泛程度上，決定了近代歐洲歷史。莫斯科的外國記者或文藝作家，對於這種變化是不能充分了解的。事實上，苟非與布什維古黨的中心圈子接觸，絕對無從窺其全豹。因此，我擬於本章中，把這種變化和它對我們觀點和情緒的影響，作一敘述。

讓我們回到一九三三年。

史達林費了很大的努力，才克復了他實行強迫集體化所釀成的一九三一——三二年的災荒。他深知飢荒使他的領導地位發生了問題，而另一次的歉收和災難可能降臨。因此，他將黨的全部力量投於一九三三年的春季播種運動。他從政府各方面募集了數以千計的黨員，到鄉間去協助農民。同時，他們對農民實施了最嚴密的政治和警察的監督。格別烏堅決地剷除了一切不合作份子。全國人民的神經都極度緊張，但努力則獲得成功了。

是年夏，各地報告收成良好。黨內的緊張也鬆弛了。以前若干觀望的人們也在想：雖則史達林用了極權手段，國家的困難總算克復了。我看到經濟情形漸漸改善，也重新鼓起希望。這些改善的象徵，首先在莫斯科出現，一些從前見不到的珍貴食物，也在櫥窗陳列了。衣服和食物，只要有錢，也比較容易買得到。

黨內的情緒已較若干年來更爲樂觀。在經濟方面獲得成就後，我們都希望黨內可以緩和下來，停止開除和鎮壓手段。我們在國內已不須再用恐怖政策，俾生活能正常發展。唯一的需要厥爲黨的一致，和國家的和平，這是國際形勢和國內緊張情形所急切需要的。這時，在德國不獨未如我們領袖們所預期的發生革命，而納粹黨已攫得政權，且在英法的縱容下，重整軍備，看來德國的武力是爲對付我們用的。俄國人民必需準備作戰。這一形勢，要求我們採取在黨內以及黨與國家間的調和政策，俾能增加生產，提高紀律，並使政府獲得更廣泛的人民支持。同時，這也

可以使蘇聯在國際間完成李維諾夫在日內瓦所標榜的「集體安全」制度，而與民主國家相友善。

真的，他們已開始實施此種政策。若干因表示反對意見而被除名的布什維克獲得重新入黨機會。其中有數以千計的人們回到工業的崗位上。重工業委員長阿陽尼基茲甚至用了許多人去做重要職位。

這些變化的功臣為政治局委員和列寧格勒區黨的書記基羅夫。他部份地恢復了舊的「自由」精神，在列寧格勒儘可能地採取了調和政策，使它成為革命後文化與科學的中心。基氏在政治局却是史達林的「一般路綫」的忠實擁護者。關於他的正統派，是毫無可疑的。因為這一事實和他主持五年計劃的功績，以及組織家和雄辯家的天才，不久就使他成為調和政策的最卓越代言人。

加美列夫和辛諾維夫也是老布什維克中的重許入黨者。在一九三四年二月的黨大會中，史達林竟允許了他們兩人致詞，這表示他如何地進行調和政策。同時，各地方的討論也較前熱烈。人們對格別烏鐵拳的恐懼也漸減少。基羅夫是特別主張寬大的，他曾下令列寧格勒不許拘捕持異議的份子。大家都知道，在一九三三年，史達林曾建議將柳丁處死刑，因為他公然提出開除史氏的主張。基羅夫却說服了政治局委員們不必為反對意見使黨內流血。史氏雖認為柳丁的計劃實際上是主謀暗殺，但並未堅持他的意見。因此基氏得勝了，而柳丁暫時得以不死。一九三四年中，格別烏發現若干青年工人和學生有「恐怖」嫌疑，基氏也主張從輕處置，認為這不過是過激的討論而已。

在一九三四年二月的黨大會中，基氏受到熱烈歡呼。他致詞後，全場起立致敬。有人暗中討論人們對基羅夫的鼓掌是否較對史達林更熱誠。這次，他被選為中央委員會書記，那就是說他要從列寧格勒遷到莫斯科，在黨的機構中心與史達林共事。在偉大的對黨表示敬意的紅場遊行中，基氏被推致答詞。他的激昂演說，等於一篇歌頌新時代的降臨，受了人民的熱烈歡迎。

史氏也似乎贊成基羅夫所謳歌的調和政策，不久就宣佈他要制定「世界上最民主」的蘇聯新憲法。他並且指派了黨中最有頭腦的人物，包括以前的反對派派拉德克，布哈林，和蘇科尼可夫在內，組織非常委員會，草擬新憲法。

這似乎表示紛爭和鎮壓的年代已成遺蹟了，新時代已見曙光。

我們很難斷定史達林對於新政策的恐怖始於何時。基羅夫日益增高的聲望和他的政策顯然地使史氏驚慌。他恐怕民主化的新政策，結果將引出下列一種問題：施行新政不是需要新的領袖嗎？因此，獨裁和獨裁者是否需要的問題也發生了。如果寬大的民主政權成功，則人們必將反對史氏的殘忍和獨裁高壓，並迫其讓位於其他領袖的。在史氏眼中，基羅夫代表着這種威脅。

大會中的內層圈子，不久就看出史氏的不滿。在某些政治局會議上，基氏未被邀參加。同時，他離列寧格勒到莫斯科就職的日期也一再展緩。史達林藉口列寧格勒職務的重要，使基氏遲了九個月才來莫斯科。但基氏的勢力仍有增無已。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委會會議中，他建議加強調和政策，獲得會中的熱忱擁護，並成了一時人望所歸的領袖。他到莫斯科就職的問題重新提出了，並一致認為他辦好移交後，馬上應該回首都。

數日後，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當基氏離辦公室進入斯摩爾尼走廊時，他被一位名叫尼哥拉葉夫的青年共產黨員開槍擊死。

消息使黨震呆了。誰會要殺害這一個調和政策的有力支持者呢？黨內是不會有任何人想謀害他的。最初官方報告也考慮到此層。人們說尼哥拉葉夫是某一法西斯國家的代理人，曾從列寧格勒一個外國領事處獲到金錢接濟。根據此一報告，並為報仇計，他們將暗殺案前早已入獄的一〇四名反蘇維埃陰謀者提出槍決。這種忽然發生的恐怖政策使我驚駭了。這似乎是史達林對於基氏被暗殺的震怒和惶恐，但我希望它不是新的恐怖時代的預兆。我們不信這一單獨事件，將促使史氏放棄調和政策。

數日後，莫斯科區黨部召開大會。我同英國工黨領袖蘭斯伯萊的女婿普里戈辛一同走入會場。普那時候是莫斯科哲學學院主任。他於若干年前，曾短期地和辛諾維夫，或其他反對派份子合作過，但這是早已忘了的事情——至少他是這樣想的。

會場的空氣極緊張。區領袖們在台上顯得極嚴肅。我想這也許是因為會議是很莊嚴的原故。區部書記厲聲地講話。他簡短地提到死者的功績後，就談到別的問題。我們很驚訝地聽他說道：

「我們須要警覺，更多的驚覺……；在黨內有成千的帶假面具的敵人……；」

這裏會發生什麼呢？我們想這一切早成過去了。

「史達林同志會親自主持基羅夫暗殺的調查，並詳細訊問尼哥拉葉夫。反對派領袖們將手槍放在尼的手中！」

我們從這裏獲悉十五名青年共產黨員，被控同謀罪名，已與尼一道被處死刑。前反對派領袖辛諾維夫及加美列夫也受了秘密審訊，現在被繫獄中。

我們都明白這事情的意義。調和已成陳蹟，新的恐怖正開端。我望普里戈辛。他的面容已變成慘白了。

演講者說完後，人們都起立表示贊成新的政策。「我們要求中央委員會嚴辦……；整肅我們的黨……；檢查每一黨員的記錄……；」

大會中的內層圈子，不久就看出史氏的不滿。在某些政治局會議上，基氏未被邀參加。同時，他離列寧格勒到莫斯科就職的日期也一再展緩。史達林藉口列寧格勒職務的重要，使基氏遲了九個月才來莫斯科。但基氏的勢力仍有增無已。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委會會議中，他建議加強調和政策，獲得會中的熱忱擁護，並成了一時人望所歸的領袖。他到莫斯科就職的問題重新提出了，並一致認為他辦好移交後，馬上應該回首都。

數日後，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當基氏離辦公室進入斯摩爾尼走廊時，他被一位名叫尼哥拉葉夫的青年共產黨員開槍擊死。

消息使黨震呆了。誰會要殺害這一個調和政策的有力支持者呢？黨內是不會有任何人想謀害他的。最初官方報告也考慮到此層。人們說尼哥拉葉夫是某一法西斯國家的代理人，曾從列寧格勒一個外國領事處獲到金錢接濟。根據此一報告，並為報仇計，他們將暗殺案前早已入獄的一〇四名反蘇維埃陰謀者提出槍決。這種忽然發生的恐怖政策使我驚駭了。這似乎是史達林對於基氏被暗殺的震怒和惶恐，但我希望它不是新的恐怖時代的預兆。我們不信這一單獨事件，將促使史氏放棄調和政策。

數日後，莫斯科區黨部召開大會。我同英國工黨領袖蘭斯伯萊的女婿普里戈辛一同走入會場。普那時候是莫斯科哲學學院主任。他於若干年前，曾短期地和辛諾維夫，或其他反對派份子合作過，但這是早已忘了的事情——至少他是這樣想的。

會場的空氣極緊張。區領袖們在台上顯得極嚴肅。我想這也許是因為會議是很莊嚴的原故。區部書記厲聲地講話。他簡短地提到死者的功績後，就談到別的問題。我們很驚訝地聽他說道：

「我們須要警覺，更多的驚覺……：在黨內有成千的帶假面具的敵人……：」

這裏會發生什麼呢？我們想這一切早成過去了。

「史達林同志會親自主持基羅夫暗殺的調查，並詳細訊問尼哥拉葉夫。反對派領袖們將手槍放在尼的手中！」

我們從這裏獲悉十五名青年共產黨員，被控同謀罪名，已與尼一道被處死刑。前反對派領袖辛諾維夫及加美列夫也受了秘密審訊，現在被繫獄中。

我們都明白這事情的意義。調和已成陳蹟，新的恐怖正開端。我望普里戈辛。他的面容已變成慘白了。

演講者說完後，人們都起立表示贊成新的政策。「我們要求中央委員會嚴辦……：整肅我們的黨……：檢查每一黨員的記錄……：」

無人敢於提起「法西斯代理人」的假定，爲了它會處決了一〇四名囚犯。更無人想到基羅夫是一向主張對反對派所要求的政策的。人們都爭先恐後來詆譏反對派，並要求嚴厲制裁他們。這看來似乎是被強迫的，而幕後的動機則基於恐懼。

這一新動向的後果是極可怕的。我們只希望史達林的震怒不致爲時太久，因爲它意味着黨的鬥爭，對於一切會與史氏意見不同的人們的鬥爭。

我們走出到寒冷的空氣中，普里戈辛顫動地說：「我一切都完了，沒有人可以逃得脫。」

三日後，他來到我公寓。「我被開除黨籍了，」他說：「因爲他們發現我的講授中有偏差，我掉了差事。」

普氏很絕望地立着，俯首歎息。「我不知怎樣才好，每天只等他們來逮捕，我的妻和孩子如何結局呢？」

我爲他發愁，並感到束手無策，有什麼可說呢？

我勸他遠離莫斯科去找工作。「離得愈遠，則你的希望愈大。」我說。

我此後未與他再晤，結局如何，一無所悉。我打電話給他時，有人回說綫斷了。

他們在黨內用了鐵的掃帚，使成千的人們走到死亡路上。全國各處，無一能避免劫運的。凡會投過反對派的票或表示過同情者，都被一網打盡。爲了將實施恐怖政策的理由，株連到基羅夫暗殺事件，他們使加美列夫和辛諾維夫承認暗殺罪行，應負「道德上」的責任。他們告訴加、辛二人，這是對黨應作的犧牲，藉以制裁他們的信徒們，並使黨能熔成一致，以對付方興未艾的恐怖潮流。

在史達林之下，這種手段，並不妨害官方的道德觀念。真理必須服從黨的利益。但他們這種比較「溫和」的供狀，却爲史達林和他的格別烏獲得了後來震動了世界的更偉大的「莫斯科供狀」的良好起點。

在某些地方，整部份的居民都被流逐了，俾能肅清「敵人份子」。據估計，在列甯格勒一城，即有五至十萬人民被送到波羅的，伏爾加，和西伯利亞的集中營。有好幾星期，火車站都擠塞了這一新毒辣政策的被迫害者。

我們無一人敢提起當前發生的事故，對於好友和相識的命運，也毫不敢作任何批評。我在區大會後，聞羅生高爾茲說起我們精密機器公司的經理赫爾茲堡也被捕了。赫會和我在同一位女教員處學習外國語。這位教員極誇獎赫的有功。有天，她告訴我，赫氏不在辦公室等候上課，很覺奇怪。他難道發生事故了嗎？次日，她當然要更驚怪了。但我不能將真象對她說。任何關於整肅消息的洩露，都是不謹慎的，因爲這樣可以使人們表示情感或意見。後來赫氏的名字，在加美列夫和辛諾維夫的名單中發現了。我們的教員對於她的得意學生的慘運，感到鬼一般的沉默。

區大會開過數星期後，我們汽車出口公司的黨細胞接了中委會的通函，其中註明「要在秘密會上宣讀」。這是對於一般以前的反對派一種「仇恨的歌」，並號召人們採取鎮壓手段。它的內容極盡毒辣能事。我們獲悉自整肅開始後，數以千計的黨員，都將黨證撕毀後逃亡了。他們都隱伏起來了，改名換姓，遠走高飛。有的人竟企圖逃出邊境。寫這封信的人們並未想到他們所描寫的是反革命的勝利，因為那時在匈牙利和巴伐利亞的蘇維埃政權正相繼被打倒。他們只說明黨內有許多賣國份子，必須加緊整肅的狂焰。

我們那時對於當前的事故，似乎毫無認識。史達林正開始毀滅老的共產黨。這一黨迄那時候仍是蘇聯政權的基礎，並誠實地努力建造一個較好的世界。史達林之所以敢於用武力摧毀黨，當然是看了希特勒一九三四年的流血整肅運動。在這一運動中無數的人們坐在家裏未經審判就被殺了。它不獨在國內很成功，而在國外，也未引起文明國家對元首的輕蔑或抵制。許多年後，英法的政治家對希氏繼續尊敬。有人說，李維諾夫曾警告史大林謂：此種大規模殘殺也許會影響民主國家的同情和阻礙人民陣綫的政策。史氏回答說：「他們會吞了下去的。」

我們所難明瞭的，厥為黨史氏在一九三五年進行極權的反革命時，他對於蘇聯報紙及情報的控制。當基羅夫被刺後，報紙對他的譽揚及悲悼事實上遠甚於對列甯的死。至少有十二天之久，全國報紙從頭至尾，都記載此一親愛的領袖的生前死後情形。在印着黑邊誌哀的報紙上，他們告訴讀者，全國人民如何悲悼，尤其領袖們，和最悲戚的史達林。

同時，我們獲悉格別烏早已知道尼哥拉葉夫為一神經質的有暗殺傾向的青年。他曾公開地對黨的官僚們談他的謀殺野心。史達林發現了列寧格勒的格別烏疏於職責，將其主持人判刑，其中一人判了十年。這一切，我們都聽到了，但它的意義却被嫉惡反對派的仇恨心理所淹沒了。史達林掌握了獨裁者兩件武器——恐懼與宣傳，因此將整個黨的判斷力都轉移了。

在悲鬱與混亂中，我們忘了一個重要的事實。由於基羅夫的死，最獲利者為史達林，因為基是黨內唯一可與他抗衡的領袖。

我們同時也未注意到格別烏湯職官員比較輕微的處罰，和一〇四名毫不相干的人們的槍決和十五名共產黨員的被殺，都是很非常的（格別烏官員並未真正入獄，不過被派集中營服務而已）。

我們不會留意，全國對基羅夫的震悼和反對派的憤怒都是人為而荒謬的，基氏為反對派所唯一寄以厚望的領袖，因為他主張調和政策，使反對派可以獲得工作機會，為建設社會主義國家致力。

根據上述事實，並不能證明基氏的被害乃史達林所策動。列寧格勒的格別烏的疏忽，也許得到史氏的默許。他毋須彰明地向格別烏首長雅哥達下命令。但雅氏也許會向史氏指摘過基羅夫的寬大政策，使格別烏不容易執行在列寧格勒取締異己份子。唯氏也許表示在此種情形下要格別烏來保衛基氏是很困難的，因為基曾下令將一批證據不足的嫌疑犯釋放。例如，就在目前，基氏身邊有一位青年，曾批評黨的領袖，並主張恐怖政策。

史達林也許有意義地說過：「既然基氏夫要如此，讓他去罷！」

雅哥達後來的供狀——這也許是莫斯科審判案中唯一可信的供狀——曾提到他在史達林下所做的下毒反謀殺工作。這說明他是應當能懂得史氏的暗示的。

這也可說明如何列寧格勒的格別烏對於保護調和政策的英雄及托洛斯基後唯一有爭黨的領導權者的神秘疏忽。基氏的死，標誌了共產黨的結束，並為自有史以來最流血的革命的先兆。

史達林一方面在統治階層進行了血的鎮壓，但另一方面在民間却未放棄調和的政策。在國內，凡可能反對或質問他的獨裁的幹部，都有系統地被史氏肅清了。當然，他要找能支持他的人們，那就是一般政治意識不高的民衆。此時，他所謂「世界上最民主的」新憲法也鄭重地宣佈了，雖則起草的人們都已不經法律手續被捕並行將處決。

豐年和糧食情形的改善，便利了史達林的策劃。一九三五年，麵包票制度取銷了，市上可以隨意購得麵包。為加強他的地位計，史氏特許集體農民得以耕種自己私有的一塊土地，並飼養自己的牲畜。他們並可以將剩餘物資在市場出售。

同時，史氏將各種各類的獎章，榮譽及酬報施於民間。探險家和「勞動英雄」給造成了「共和國英雄」。他恢復了紅軍中的官階和特權，如元帥尊號，並將紅星勳章，列寧勳章，紅旗勳章，及勞動紅旗勳章，慷慨地頒給士兵，水手，工人，及工程師們。為了智識份子，他創設了國家藝術家，光榮藝術家及光榮學者等稱號。因此，史達林於開始毀黨前，糾集了一批新的擁護者。這般人都靠他而在蘇聯生活中突然取得顯要地位。

這位獨裁者在一篇演詞中會稱：

「同志們，生活已改善了，生活變得更快樂。」

人們都隨聲附和。報紙中充滿了對蘇聯新憲法的歌頌。它是人類最高理性的勝利。它保證出版，言論，集會的自由，男女平等普選權，秘密投票，及不受未經拘票任意逮捕及搜查的自由，它甚至保證了「工作權」。這部憲法被描摹為「史達林睿智的紀念牌」，或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曲。史氏於接見霍華德時會稱：「在這一憲法下的選舉

中，「不獨共產黨可以列出候選人的名單，即黨以外的社會組織，也可以提名。」

這一民主憲法對史達林的意義及用途，已於第一次選舉中証明。對於史氏謊言，認真的一些選舉人很驚奇地發現當他進選舉欄作秘密投票時，選票只有一位候選人，而且沒有地位寫別人的名字。這一候選人不獨爲共產黨所推薦，且爲其他團體所推薦者。那就是史氏如何履行了他對霍華德所作的誇詞。再者，史氏在統治幹部中所進行的整肅，既差不多與「民主議會」的選舉同時，若干票上的候選人，曾經在報紙中大吹大擂作過競選宣傳，而現在則被格別烏拘禁。因此票上的候選人只得改換。選民到最後一刻往往發現他所投的候選人爲毫不熟悉者。有些人雖獲選了，但在議會召集前，早已被整肅。基於這種原因，一方面選民只能投票上所列出的人。而此人獲選後，畢竟完全不能出席代表。

因爲整肅運動繼續至第一屆最高蘇維埃會議以後，故有四分之一的代表在休會中被格別烏逮捕。他們並未舉行補選，因爲那是浪費時間的。

最後，在第一次會議中，選出了主席團，俾領導討論。但在第二屆開會時，則主席團中，亦有若干人失蹤。沒有人說明他們缺席之故，但主席宣佈提名以補充足數。在普通的恐懼空氣中，一般人皆認爲對於這些人的忽然缺席，以不談爲妙。至於議會的成份，我想連希特勒對於此等地方的創造力也不例外，這是歷史上僅見的一個，在這一民選的議會中，竟有百分之十五的代表，爲秘密警察的高級官員——格別烏的區及各部門首長。

這就是史達林鞏固他的極權勢力時「人民意志」的表現。美國人於讀到蘇聯軍隊「解放」的國家的「民主選舉」時，應注意此點，我們無理由相信它的程序會異於上述情形。

在國外的同情及自由圈子中，人們認爲蘇聯憲法爲一偉大成功。它孕育了人民陣綫的政策，並使人相信史達林與民主國家結合以反對希特勒的姿態。

在黨內，我們覺到憲法是僅用之於炫耀的。但我們仍盼它的公佈可將基羅夫暗殺案後的恐怖作一段落。我們未能認清調和政策，及所謂「民主形式」政府，到史達林手中，都變了他在真正政府中——共產黨，清除敵人的工具，和鞏固獨裁的工具。在它的六年歷史中，此所謂「最民主的憲法」僅做了世界上最毒辣極權暴虐的諷刺掩護。我深覺外國觀察家對於這一事實尙未完全了解。

三四、我所認識的史達林

我於敘述這些年代俄國情形時，除有關於我自己的故事者外，對於史達林的人格，殊少涉及。但自一九四一年以來，希特勒拒絕了史氏狂妄的綏靖，企圖使他走向民主同盟國家陣營。因此，在英美發生了一種感情用事的趨向，使人們寬恕或甚至敬佩史氏粗暴的個性和力量。我想這是很不幸的，也許我應當說明對於一般會在他領導下竭忠服務如此長久，而結果不免一死的人們，史達林爲怎樣的人。

在元長的十三年中，我獲得多次遇見史氏的機會。這不獨是在正式場合中，如接見代表團或出席群眾集會，而在他辦公室工作時間，亦會有機會和他接觸過。我和史氏第二位夫人及唯一親信巴維爾阿里魯頁夫很友善，並且常無意地從他的談話中獲悉他姊氏的痛苦婚姻，以及她一九三二年的驟然亡故的因果，那是引起了許多謠傳的一件「神秘」事件。我和史氏的幾位秘書也很相得，其中一位會與我有同房之誼。此人也許早故世了，但我因不詳其命運，故不能將他名字洩露。我們經常閑談史氏的生活起居，例如當史氏放逐托洛斯基的決定送到黨部以前幾天，我就早知道這消息了。

我之舉出這些事實，並非謂專憑道聽途說，就可以代替個人的認識。我僅要說明我對史氏的個人印象，是有若干常和史氏接近的人們的談話，可以補充証明的。他們的談話，往往增強了我個人的經驗，我覺得我對史達林知道得很深，凡我所不敢確定者，則不擬在此提出。

我第一次瞥見史氏，係在一九二二年的共產國際第四屆會議中。此時史氏尙爲一尋常人物，實際上，在黨或政府內，他都不是特出的領袖。他的職位爲中央委員會的一位書記，雖則史氏不久即將它變爲攫取較專制沙皇更高權力的捷徑，但書記名份則不過爲第二流技術位置。在那時無人料想中央委員會的一位書記，縱爲三位書記中之年資最高者，並身兼工農指導委員的第二流政府官職，能於兩年內成爲政治上領袖人物，並於以後的十年中幾乎成爲神祇。他在大會中的比較，無足重輕，爲大家瞭然的事實。像托洛斯基，布哈林，辛諾維夫，拉德克，和拉可夫斯基等第一流領袖，當入場時就會有全球各地的代表圍着，一字一句，爲人們所恭聽。而史達林則獨自進場，無人理會。

當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正要離開聖喬治大廳的會場。史氏在非正式軍服上，着了軍大衣及皮靴。他走到扶梯

盡頭時，一位共產國際辦事處的年青職員攔了他問話。我這時坐在附近一條長凳上，抽着烟，幽閒地看代表們離開會場。這位國際共產局職員個子極小，但誠如一般矮個子的個性，却十分活躍。雖則史氏身長不過五呎六吋，這位小職員連他的肩也比不上。史氏昂然立着，偶爾點頭，或問一二句，靜靜地聽着。這位小東西，在他前面跳來跳去，滔滔不絕地講，似乎他的熱忱無法宣洩。我對此一幕特別感觸的，就是史達林過人的耐性，他爲一理想的聽講者。在此時，他正預備走了，一足踏在扶梯下，但他仍站了差不多一句鐘，鎮定，從容，注意，似乎他儘有一切的時間來聽這位喋喋不休的小職員。這是他作風中一件很特出的地方。

那個初次的印象，經常留於我的腦海中，不可磨滅。在要人中，耐性爲一稀有的特質，列寧於臨終前寫給黨的「遺書」中曾以西種品性形容史達林：那就是「浮華」，「不忠實」，「粗魯」及酷嗜權力。但這些品性是很少與耐心連系在一起的。此一稀有的結合，爲史氏性格的一個主要鑰匙。

史達林本人的像貌，和世人所見的修飾過的照像，及石印有好些不同之處。他看起來較粗糙，普通，並小些。他的臉龐而萎黃，他烏黑的頭髮已變了深灰，他的鬚髯及眉毛亦有斑紋，他的眼睛棕黃而畧帶蔚藍。他的表情並不代表他的內心。我覺得他有種奇怪的沉重和快快地神氣。他既不似歐洲人，亦不似亞洲人，而爲兩者的混合體。我初次見他所着的半軍服，直到他着了元帥的輝皇制服，成了他經常不易的服裝。這裏也許有好些理由，其一即爲他的權力感。爲了生理上的缺憾，史氏一臂患了萎症，並有兩趾駢生，使他不能參加沙皇的軍隊。因此，他之傾向於軍服，也許是爲了想要補償這種缺憾。

但他之所以不改變服裝的主要理由，實更微妙。在極權制度下，社會的穩定需要廣泛人民視其領袖如神明。爲此，他們需要一個不變的偶像，因爲神的特質之一卽爲不變。史達林很狡猾地意味了此一事實。

在公共集會中，史氏從不坐在中央，但喜歡坐在旁席或後面。當他起立致詞時，常常揮手示意，要人們停止鼓掌，一若感覺厭倦者。而實際上則他極愛稱讚。在正式宴會中，如招待勞動英雄，北極飛行家等，他裝成特別謹慎的樸素——使人感覺他爲大眾的朋友，尤其是一般不大自信的鄉下人的朋友。他在家宴客時，往往親自選擇留聲機片，將它放在唱盤上。他自己不跳舞，但常勸別人去跳，俾使他們克服在領袖前所感的忸怩。有時他甚至爲青年男賓選擇舞伴。

在黨會或各種業務會議中，史達林喜歡抽着紙烟或雪茄，默坐靜聽。他一面聽，一面在拍紙簿上畫東西。他的兩名私人秘書波斯克魯基捷夫，以及德文斯基，曾在真理報稱史達林往往在紙上寫着「列寧——老師——朋友」等

字。他們並謂：「每日散班後，我們可以從他的辦公桌上，拿去很多的紙，上面都畫滿了這些字。」史氏是不惜叫人們爲他作這種宣傳的，但我們不必相信他是如何地有情感。

在戰前，史達林除了到高加索休假外，很少出外旅行。當基羅夫暗殺事件時，他到列寧格勒的旅行爲一件劃時代事件。他不贊成沙皇時代君主們所作的凱旋式的遊行鋪張，因爲他很謹慎，覺得躲在家裏平安些。他也懂得與人保持相當距離，可以增加他神秘的色彩。據我所知，史氏除參加出喪的行列及在週年慶祝中出現於紅場的列寧墓外，只冒險在莫斯科街上走過一次。這次短的驟然的從布爾壽劇場到克姆林宮的散步，創造了驚人的消息。第二天的蘇聯報紙很顯著地將它記載出來。凡史氏經過的地方，格別烏軍隊早在數小時前就要將行人肅清，以策安全。

史氏曾廣泛地被看作「神秘人物」。史氏要保持神秘的理由，就是想將它用爲近代專制主義的技術。他之所以要帶點神秘，就猶如沙皇之愛用紫色一樣。再則史氏是工於心計的，一位毒辣得將最心腹的朋友一一殺害的人，他自己必將心事秘而不宣。

但他在爲他工作的人們眼光中，並不神秘。他似乎具有一種自卑感，使他敏感，固執，猜疑。他似乎殘酷陰鷲，一心一意只想增加個人的權勢。並且部份地基於此一原因，部份地爲了自然限制，他缺乏政治家遠見。我們都知道他爲一遲鈍穩重的思想者，小心而多疑。在匈牙利利倡導布什維克革命失敗了的領袖培拉昆，會很恰當的批評史氏說：「他是走得很慢的」。史達林的忠實傳記者巴布賽，曾經蒐羅了許多關於他的稗史，却不太恰當的說史達林像獅子一般的小心翼翼。史氏本人某次會謂「健全的猜疑爲最良合作基礎」。這句話對他不僅是一句格言，也是他的性情的表現及行爲的規律。它滲透了全蘇聯的社會關係，並影響了一億八千萬人民的生命。

托洛斯基曾詆譏史達林是一個庸材，從天才，嗜好，知識，智慧各方面觀察，這是很對的批評。但事實俱在，這位庸材竟將托氏從高位拖了下來，放逐出國，宣判他的死刑，並將它執行。在某些品質方面，史氏是絕不庸碌：強的志力，忍耐，狡猾，辨識人性弱點的能力及無情地利用這些弱點，和他最卓越的不顧一切達到他所選定的目標的天才。在這些方面，他的天賦極優。假如史氏真爲一位遲鈍及小心的思想者，但當他開始行動後，則迅速而殘酷。

許多人奇怪爲何在「遺書」這樣帶政治性的文件中，列寧對史達林的警告却提起「粗魯」的特質。人們也許認爲，這乃是無產階級革命者一種美德。此種想法，乃基於一般人不明史達林在缺乏同情下，將粗魯的藝術，用到什麼程度。史氏第一次見到列寧遺書時所作的批評即爲一良好例子，但我不幸地不能將它在本書中引証。

雖然史氏在一般政客中文化程度並不大低落，但他與列寧的其他部下相較，則是一不學無術者。此乃史氏發生自卑原因之一。布什維克革命的上層領袖們，大都是中等社會及貴族知識份子。他們不獨濡染了本國文化，對歐洲文明，亦有造詣甚高者。他們多能講兩種以上的外國語，而且對於本國文字亦能典雅的運用自如。史氏則爲例外，無論在演說，寫作，及理論方面，他都是最不出色的一個。他從未久留國外，並且，卽就俄國人而言，他的眼光也受了地域的限制。

史氏九歲時才開始學俄文，但迄未完全精通，因此用起來極顯笨拙。他不獨重音很多，而且他的文字體裁也很生硬，雖然他渡過許多年一般人認爲「革命家的大學」的放逐及監獄生活，但他迄未能如其他黨人一樣獲得文學及科學根柢。他竭力想學德文，但半途知難而退。他又想學世界語，認爲它是將來共產國際的通用語言，但亦無成就。這位會誇言布什維克無不可克服的堡壘的領袖，竟連一個文字學的小山頭也攻不下來。他常感到此一失敗的恥辱。因不諳外國語，史氏對於俄國以外的世界，遂無從獲得真切的了解。

史氏講說時，用一種遲慢的單音，使人厭聽。當革命前後列寧還在世時，史氏在政治局或中央委員會大會上，總是怏怏地默坐一隅，不能參加人們的雄辯。並且似乎將整個事情視爲一種閒語。

像史氏這樣資質的人，竟能獲到絕對權力，控制了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土地，左右了一億八千萬人民的命運，並利用了許多別人的腦力與智慧爲他服務。此一事實，對於傾向於漠視民主精神及法律保障的人們，應是一個有力的警告。

據巴布賽的史達林傳記說：不如路易喬治用了卅二位秘書，史氏處理他的超人工作時，只有波斯克魯比捷夫一人協助他。事實上，在我那時候，波爲史氏首席私人秘書，因此資格，任了中央委員會秘密部主任的官職。在他以前，托夫斯杜加，布拉泰諾夫斯基，會相繼担任過此職。除波外，史氏尚有一打的秘書，分當各種研究及通信工作，如海陸軍事，工業，農業，財政，外交，國際新聞及情報，蘇維埃機構，及黨的機構等。每一私人秘書都有一兩名助手。在每一秘書指定的範圍內，他可以運用整個那一部門的機構。事實上，他的報告及意見較之正式政府中主管的人民委員長或部長更有決定權力。但表面上，則這些秘書都稱爲「中央委員會書記助理」。他們集體組成爲「秘密部」——那是對於一人政府性質的一個有趣味的批評。

史達林的秘書的另一部門，爲處理他和蘇聯廣大民衆的通信的。我猜史氏與普通人民間的書信，是較之歷史上任何其他統治者爲多的。他用了特別辦理此種信件的秘密和許多助手。史氏對於一切的函件都得作答，其中許多有

他的親筆簽名。因為他的萬能萬有，所以每個人都向他呼籲，包含集體農民，學生，學童，科學家，工程師，兵士，產業工人等。他們或對於實際問題，馬列主義問題，政治，科學，文學問題，或私人難題等，貢獻意見，或呈送工程與科學計劃，發明，著作，圖書，雕刻，手工藝品等。書信中有重要部份為關於控訴的，如人們對於地方蘇維埃及黨部領袖，農場，工廠及機關主管之指摘。另一部份則係關於私人慶賀及表示友誼的，大都為詩詞，及禮物。巴布賽堅信：史達林親自閱讀一切信件。倘真如此，那他真是神人了。但在一般民衆中，他的確留下這樣印象。眞理報曾刊出下述兩個例子：一位集體農場的老農婦，於感謝領袖使她享到快樂生活後，對她「最親敬的同志」呈獻了她最珍貴的財產——一條牝牛。她接了克姆林宮發出的史達林親筆寫的覆函，在信中，史氏道謝了她的善意，但說明他無從利用這頭牛，並請她為紀念史達林同志將它保留起來。另一件，係一位史泰漢諾夫工人寫的，他呈獻了他所最寶貴的獎章，聲言史達林較他更有戴這種獎章的資格。領袖謙虛地回答說：「獎章非為已成名的人們而設的，其主要目的在使一般無名的人們中值得酬報者獲享聲名與光榮。」

史氏私人秘書中，有好些是我所認識的。我於一九二二三年在馬利諾休憩所中，獲識了他的主任秘書波斯克魯比捷夫，他是一位面圓，頰紅，禿頂的小個子。在我認識他的十五年中，他已日臻顯赫。史氏手下管理黨部幹部事務的私人秘書是塞力斯基，一位老布什維克和嗜酒者。德文斯基，則主管格別烏事務。格里欣，曾在秘書部中主管財政及國外貿易，後來被調至財政部工作。史太梭瓦，也一度如史達林一樣，做過中委會書記，並為地下時代的老布什維克，他主管國際共產局，國際工人救濟，及其他國際組織事務。雷的克主持國際政治及新聞，他的助手為一度主持共產國際印度革命委員會，後來圖謀暗殺史氏處死的帝威耳。據傳李維諾夫於一九三八年辭去外長職務後，曾在秘書部中，任雷的克的職權達三年之久。以上諸人，都是我所熟識的秘書們。

史氏秘書中，很有些飛黃騰達的。一度主管新聞的麥克里斯做了眞理報主筆，後為國防部副委員長。另一私人秘書葉壽夫，昇到格別烏主任，但在權勢最盛時失踪。

史氏最寵愛的秘書為甘納。他差不多還在孩童時期就到了史達林那裏。史氏不齒他親生的長子，但愛甘納如子。他剛出學校，就被派為主管工業的私人秘書。經過了十年的忠誠服務，他忽然請求辭職，俾得學習工程。此一消息當時頗引起驚訝。又經過多次固請，史氏居然答應了。這是更驚人的消息，因為它為史氏非常的恩惠。並且甘納繼續獲到主子的歡心。他在工業學校畢業後，年紀還很輕，就被派到重工業部擔任了與伯利恒鋼鐵公司主席有同等重要的職位。甘納在此一新極權貴族圈內，似乎是一位王子，他的才具英明，前途無量。但後來他在整肅運動中

，被斥爲「人民公敵」失蹤。我猜他唯一的過失，也許爲了替他手下的主管們辯護，和史達林發生過意見上的衝突。

史達林曾三度結婚，育有三個孩子，兩男一女。髮妻爲一樸實的喬治亞女人，卒於一九〇七年。他髮妻所生的兒子雅夏，極不喜父親，彼此間感情都不好。我聽說史氏當着私人秘書們稱他做「我的蠢貨」。史氏第二次結婚後，會將雅夏携至克姆林宮同住，在那裏雅夏過着極可憫的生活。他常被史氏虐待，猶之史氏會挨過他的皮匠父親的打一樣。（照路得維格的推測：此種經驗爲促使史達林做革命家的決定因素）。雅夏的資質不太聰明，亦無特殊天才，曾一度入工程學校攻讀。成年後，奉父命不許在莫斯科逗留，因此飄泊於俄國各地。許多年來外人無知其消息者，但德蘇戰爭初期，報紙公佈史達林有一位在紅軍中爲下級軍官的兒子，被納粹俘獲。

一九一七年，史氏與十六歲的女郎娜蒂亞·阿利魯也娃相晤。她是一個美麗女郎，有像她喬治亞母親一樣黑的大眼睛。她父親是一位老布什維克，曾一度掩護了列甯。她於一九一八年入黨，不久就做列甯秘書之一。一年後，她被派至查利新前方工作，在那裏史達林任政治委員。這位四十歲的老兵愛上了年青的美人，成了夫婦。他們生了兩個孩子，兒名華西利，女名史維拉娜，都是他所寵愛的。

華西利現爲紅空軍上校，曾數次授勳，並獲了「蘇聯英雄」的尊號。他已結婚，並有兩位孩子。後述事實從未見諸記載，記者亦不許將它向國外報導。也許史達林不願外人知道他已經做了祖父。

娜蒂亞的生活，經過在前方的熱戀後，旋即變得很淒鬱，而自史達林躋爲獨裁者地位後，更痛苦不堪。如上述，我與她的兄弟頗相友善，他曾在對外貿易部與我共事，人極誠樸精明，但每次提到娜蒂亞時，則面容慘戚。她是一個聰明敏感的女子，沉默而嚴肅，不能過慣終日被一班諂媚阿諛者包圍生活。雖然有了孩子，但她仍進了工業學校，讀完三年課程，預備爲自己謀獨立生活。

史達林政權的日益殘暴及他對付昔日奮鬥同志態度，使娜蒂亞甚覺苦悶。她自己亦嘗爲黨內熱烈份子，故對史氏待她的輕視，尤感痛心。此時，史氏常和伏洛希羅夫到鄉間別墅，渡他們腐化的生活，數日不歸，在那裏有格別烏頭子雅哥達找來的一些伴侶，可供他們作樂。有好幾次娜蒂亞遇到丈夫，使她遭了很粗暴的待遇。

我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的革命第十五週年紀念中，看到他們兄妹在一起。再過三星期，他就可獲得化學工程師文憑。她面色蒼白，似乎對週圍的遊行不感興趣。他的兄弟也極憂鬱。

兩日後，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日，娜蒂亞的死耗公佈了。她致死的原因迄未洩露。有人傳她被殺。此項謠言是

有可能的，因爲在人們心裏，已有一件先例。布丹尼和他的太太口角後，曾將她太太從背後用槍打死。他不久一位年青女演員結婚。因爲他的權勢，此事並無後文，他後來做了蘇聯五大元帥之一。如布的地位高，那麼，史達林是更高的，這就是謠言的起因。我却從她親兄弟的口口獲悉她致死的真情。那夜，在伏洛希羅夫的別墅中，她對於史氏使農村淪於飢荒的農民政策，加以批評。史氏當着一些朋友們曾用俄國所謂虐待狂的卑猥爲行侮辱她。娜蒂亞回到家中後就用手槍擊腦袋自殺。報紙中的公告僅指出她以「急故致死」。

她死後不久，聞說史達林和卡干諾維治之妹結了婚。關於此項婚事，蘇聯報紙迄今無一字提及。

葉紐基茲的被害，証明了列寧遺書中所指出的關於史達林的不忠是如何地確實。假使甘納之於史氏猶如愛子，則葉之於史，猶如兄弟。當史氏的革命生涯才開始時，年青的都加斯維里（即史史達林）仍被人稱爲可巴，葉氏即已經教他關於馬克思主義及其對俄國問題的實用。那還是四十五年前的事，但從此他們即爲最密切的同志及朋友。他們共同陰謀並策動推翻沙皇，共同入獄並流放，共同在黨內躋於顯要，并在政府獲得領導地位。加里寧的地位，等於一個共和國的總統，而葉氏爲蘇維埃中央委員會書記，實際上等於副總統。并且因爲他乃史達林之友，所以他的權勢是無邊的。

儘管友誼很好，但兩人的氣質却可以完全懸殊的。史和葉的情形就如此。史氏冷漠殘酷，而葉則心地慈祥，急人之難。他雖居要職，但初不改其醇厚作風。他常訪問一些老友，并如有需要時予他們以幫助，縱然在政見上是處於反對陣營的。一般人對他都很了解，就是史達林也相知最深。他也知道葉氏是一百折不撓的布什維克，四十五年如一日，絕不致有反蘇維埃的行動。

我和道一個曾受葉氏照顧的家庭。史，葉，和這家人的父親——一位孟什維克的葛瓜，曾於一九〇〇年組織帝發里斯的社會民主黨。他們三人一同被捕入獄，一同愛上一位女郎。但這位孟什維克獲勝了，和她結婚，生了一女。雖則父親因孟什維克關係被逐，但葉氏不能忘了他的老朋友。因此他將這一家安插在莫斯科，並派了葛瓜的女兒伊利娜，在我所服務的國際圖書公司工作。

我於一九二五年遇到伊利娜，那時她才廿三歲。我們做了朋友，而且直到一九三五年，還時相過從。她的父親已被流放，故未遇見，但她的母親我却很熟悉的。她們住在莫詩可夫里，主要的朋友是高爾基的太太碧施可娃，及高氏的出版人賴迪尼可夫。這些人在革命以前都爲布什維克的同情者，但對於獲勝後的布什維克主義，則反而不敢接近。我和伊利娜的友誼，是基於對這些問題的熱烈辯論而開始的。雖則意見不同，他們都很歡迎我。

一九二五年某夜，我在葛家遇到葉紐基茲。他們很誠摯地招待這位家庭老友。從談話中，我知道他是常來的，並且很關切他們。伊利娜告訴我：她家受了葉氏的恩惠，葉氏唯一辦不到的，就是將她父親接回來，因為他曾爲史達林的情敵。他永遠不許和他的妻女聚首。

當我於一九三二年自國外歸來時，伊利娜已結婚，並被調至葉氏的中委會工作。在葉氏直接拂蔭下，她的處境更安全了。但一九三五年基羅夫被刺後，不可能的事情畢竟發生了。史達林將他最老最密的朋友阿貝爾（葉紐基茲）免了職，並派他到高加索担任一個不重要的職位。那年末某日，我接了一封包件，信封上有中央委員會的回信地址。我奇怪地拆開了，其中并無信件，僅係一些舊照片，有些是我和伊利娜及朋友們在過去十年中所攝的。我的心沉下去了，因爲這是一種無可懷疑的訊號。它意味着伊利娜正期待格別烏在她屋內隨時可能進行的搜查。因此，她將這些東西寄來，使我不致被株連。

葉氏被屈辱的消息，既尙未公佈，我對此事殊難了解。此時我適患感冒，對於伊利娜的憂慮增加了我的熱度，我幾度和她通電話，但無人接。最後，葉氏被屈辱的消息公佈了，隨之就是報紙上對他可恥的攻擊。這些報紙直至半月前還登載着自蘇聯共和國成立以來，他代表政府簽署的一切法令。翌日，我遇到伊利娜一位女友，獲悉她已被捕，并流放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我也許再獲不到她的消息了。

葉紐基茲於一九三六年被槍決。葉與史達林的友誼爲黨內一種傳奇。一般知道他們交誼的人們，說這是聖經中卡因殺害他兄弟亞伯的故事。

史達林的報復心到了如此極端程度，這是毋須說明的。有次，他對加美列夫承認他最大的快樂，厥爲對敵人佈置甜蜜的報復，圓滿地實行，然後安然地回家去睡。他的整肅證實了此項心理。他對於任何凡表示過一點不敬的人們，也許都獲得了報復的快慰。凡他所能指定的私敵，現在都死光了。但據我們這些在死亡年代中住過的人們看來：報復并不足以形容史氏的特性。我以爲他從殺死朋友中，獲得一種變態狂的享樂。

巴提摩耳的寇萊大主教會於一九四一年稱史達林爲世界上殺人最多的一個人。當整肅正在進行，史氏在黨大會的方針演說中，會溫和地宣稱：「在一個國家所有的財富中，它的公民的生命是我們所最寶貴的。」我們由此可以完全了解史達林的爲人。

三五、唯一寶貴生命

許多人認爲史達林本人的生活爲斯巴達式的簡陋，他并以忘我的忠誠，爲苦難的俄國人民服務。此種斯巴達式的簡陋，乃一種巧妙的外表而已。迄至一九二〇年代，史氏確曾如其他一班布什維克領袖，過着很樸素的生活。彼時他在克姆林宮僅佔了兩間房子。但他現在的生活，則有如一些東方君主的奢侈。他一方面一揮手而斷送了數以千計的生命。但另一方面，則不惜慷他人之慨，浪費無數金錢，以求延續個人長壽的秘方。

當我認識史氏時，他做中央委員會書記的月俸約一千盧布，折合一九〇美元，而其實際購買力則爲四〇美元。此計算，一位美國戰時物價管理局的職員，或一個被救濟的家庭所獲，都豐于此一地球上六分之一土地的獨裁者。他的一打秘書中之某一位秘書，也許將此項薪水代他領下去支配了。每月一日，克姆林宮管理人將房租單送給史的秘書。同時，他也可以收到一張伙食費單。當主子到高加索休憩所時，他的秘書也照例將租金付到衛生部。史達林照例將每月俸入的百分之三交付黨費。他以政府官員的資格，享有全國鐵路免費乘車的優待。他自己沒有汽車，或任何交通工具。他差不多一點東西也沒有，他既無銀行存款，亦無儲蓄，身邊不携支票或錢包。他的手像日本天皇或達賴喇嘛的一樣，從未與金錢接觸過。但這不是說他很節約，而僅指他可以隨心所欲，動用鉅款，而毋須報賬。

史氏的地位，爲一生活水準較低的「工人國家」領袖，因此他只得隱諱，而偽裝儉樸。在美國報紙上，我們常看到關於政治家家庭的照片及描寫，而在蘇聯報紙中，則從不能找到關於史氏家庭的照片或生活報導的。

即在專制君主國家中，皇室經費的賬目，也隨時公佈，使人民知道國王究竟用了多少錢。但史達林耗去蘇維埃的款項，則從未見于報紙。俄國人民雖負擔了全部支出，但對於這些費用用途及數目，既無從獲悉，亦無法控制的。史氏的各種住宅，皆爲休憩所，屬於國家休憩局的產業。爲他便利而修造的道路，則在交通經費項下列支。他所坐的汽車乃取自政府汽車庫的。他所做或所需要的每一事物，都列入國家預算中，爲行政開支的一部份。史曾氏宣稱他業經建立「社會主義於一個國家內」。在莫斯科偶然聽到人們低語：「史達林是對的，他不獨在一個國家，而且爲了一個人。」

在中央政府汽車庫有幾十輛各種名貴的汽車，如羅斯萊斯，別克，加的勒克，和林肯，全日夜都有司機輪班聽

候史達林使用。他如出外旅行，他坐的特別火車前後都有別的火車掩護，沿路都有衛兵站崗。在黑海濱有四所皇宮式的官邸，是特別撥供他住的，在那裏全年都有侍役照顧。我于一九三五年曾往訪問在蘇奇的一個被列爲「第七政府夏季招待所」。但此乃最舊及最平常的一個，在外表及設備上，它並不優于一位美國富商在佛羅里達州或加利福尼亞的住宅。它建于一個山頂上，隣近有名的馬則斯儲藏溫泉。整個山頂被劃爲公園，由格別烏軍隊保護。駐衛警及僕人的住房就設在大門內。當上山時，我們可以看到一間容納二三十輛汽車的車房。更上則有三所特爲獨裁者客人預備的別墅，其中都有網球場，拾球房等。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曾在此中所別墅消磨了幾天。同伴的客人有依凡諾夫，農業人民委員長，于一九三八年第三次莫斯科審判後被槍決；季加羅，白俄羅斯中央委員會書記，被控爲「人民公敵」而被整肅；畢倫基，蘇維埃管制委員會副主席，在整肅中失蹤；賴科巴，亞哈西亞政府主席，和他的兄弟，他們兩人一病死，一被槍決。

史達林的另一別墅，係建于亞哈西亞的山上，靠近到蓋格羅路上。我想這是模倣希特勒目茲加登的「鷹巢」的。史氏對這所別墅不大滿意。新近在黑海的齊陽美斯劃出了一大公園區，佔了極大一塊海岸，建造了另一公館。這所華爾的別墅是瞞了俄國人民蓋的。它用去了若干建築費當然無從估計，但我想赫斯特的珊瑚蒙別墅不會比它更糜費，史達林在克里米亞海濱有他第四所小別墅。

在這些官邸中，都有像我在蘇奇所見的精美佈置，從拾球房至電影室，及駿馬名駒，應有盡有。史氏的特別嗜好爲自動音樂設備。他有各種的小風琴，留聲機，收音機，並歡喜將他的收藏誇示於客人前。對外貿易部經常命令駐外人員留意蒐羅最新的出品，俾充實獨裁者的各處公館。我記得在一九三一年，我費了許多精神在義國蒐羅義國音樂唱片。

史達林的戶外娛樂爲打獵及海水浴。他在黑海作海浴時，附近海岸一哩內都要肅清閒人。他又嗜好一種名哥樂棋的俄國遊戲，那同九柱棉有些相似。陪他玩的人爲伏洛希羅夫及其他近倖。他總是贏的。因爲左臂有痿症，所比較吃力的運動是不能做的。

在莫斯科附近，爲史達林預備的一些官舍却不及上述別墅的豪華。若干年前，史氏曾將列寧的寡妻遷出，而住于高爾基鄉間列甯所住過的房子中。但自高爾基改爲紀念館後，史氏就另外造了兩所別墅，其中他所愛的一處爲在波爾維基。

外國訪問者往往對於莫斯科市政建設的偉大進步表示驚訝，但他們不知若干古蹟，如蘇哈列夫加塔之類，會無

故被拆毀。也許我們從進步着想，應當先拆了一些莫斯科卑陋的貧民窟，而代以當得現代都市之稱的工人住宅。莫斯科的某些市政改良是爲的開闢一些快車道，使警察比較易於警衛。這些要道爲從市中心到莫賈斯克的路，伏茲維任卡，及亞爾巴特，那就是史達林從克姆林宮到波爾維基官邸的路。從莫斯科到近郊廿五哩週圍，有十二條模範汽車公路向十二個不同方向分佈着。這些是全俄國最佳的公路，因爲它們都是通到政府要人們別墅區的。過了這些別墅後，路又壞了，同沙皇時代的情形一樣。

莫斯科蘇維埃曾下令圈出在波爾維基一大片樹林及河岸，不許人們建築房屋或出浴。此一禁令的表面的理由是保持河水的清潔。因此數以百計的住在此一帶的人們得被逐開了。連在那裏走路都是禁止的。當人們可以自由地在波爾維基以上或以下的河內出浴或河岸露睡時，爲什麼在這裏却要如此小心呢？我探聽後，始知波爾維基一帶，全係保留爲中央委員會及格別烏官員作住宅的。他們的宅第遠遠地拱衛了獨裁者的家。

我某次到這些別墅中訪問一位朋友。我們的汽車駛入一個廣漠的園林，那裏佈置極整潔，而警衛也極週到。在每一岔路，着白手套及漂亮制服的警察，就來檢查通行證。連我的朋友也不許進入最私人的地段。公路是特別的清潔的，但交通很稀，偶爾可以看到一所豪華的汽車駛過。風景佈置，也似乎經過人工修飾的，盡善盡美。我朋友的別墅可以和任何西方國家首都郊區的富室相比擬，一切設備如涼台，球場，花園之類，應有盡有。當然，這並非他所有，但名爲「中央委員會第幾所別墅」。但倖運的房客，是可以一直享受下去，至死爲止。

實驗醫學研究院的設立，就說明這一位掌握至高權勢的人，如何隨心所欲，浪費鉅款，而外表猶修言爲人民謀福利。卽富如洛基腓勒及昔日君主亦未能將全國科學資源組織起來，爲他們私人服務。但這就是史達林的行徑。

史達林快近六十了。此乃一位小心的人開始關切自己健康的時候，他的朋友高爾基更老，並且對於他的健康更表關懷。因此，某日莫斯科真理報登載了高氏一文，提出如何方能使人們延年益壽求保青春。他在結論中建議在莫斯科設立一個實驗醫學研究院來進行此種研究。高氏並謂：此種特有的機構，只有愛重人類生命的蘇聯，才能倡導建立。

科學家及醫生們都熱烈響應高爾基的主張。政府撥了幾億盧布爲開辦費。在莫斯科近郊最優美的色利布蘭尼波爾地段劃出了院址。工人們趕緊修造化驗室，醫院，圖書館，及職員住宅。莫斯科充滿了此一劃時代的消息。但一般知道底細的人們，則很明顯的看出此項延長並保持人類生命的研究，不過是爲了領袖的個人利益而已。史達林派了他私人醫生比巴任斯基及史柏蘭斯基兩位教授來主持研究院。這也不是偶然的巧合罷。同時，他又邀了有名的烏

克蘭科學家波哥莫勒茲參加工作。

不久，報紙宣佈設在彼得格勒及列寧格勒的科學研究院遷至莫斯科的消息。這學個院設於聖彼得堡已有兩百年的歷史，在蘇聯政權下，仍維持了廿年之久。它有廿餘所建築及數億的常年經費。爲什麼忽然不前不後，要於此時搬至首都呢？當蘇聯工業，紅軍，及房屋計劃正急需款及建築材料時，爲何不惜糜費來作此不急之務呢？但理由是明顯的，史達林的新研究院須要一班在列寧格勒的實驗醫學，生理學，生物學，及內分泌學權威們來參加工作，因此不得不將整個學校搬來，連它的一切部門，實驗室，圖書館，博物院，甚至古生物學的全套標本都整個搬來。爲此，又得在莫斯科河濱，耗費鉅款建築新址。但新的問題又來了，波哥莫勒茲教授爲烏克蘭科學研究院院長，那是不能從基輔搬至俄國首都的。因此，他們特別爲波氏在基輔成立了實驗醫學研究院分院。此時，報紙上登載了人們對史達林某些祝賀詞句，可以說明當前的空氣。例如土庫門中委會的獻詞稱：「祝你壽至千歲！」著名的北極探險家巴巴甯的祝詞爲：「我敬愛的領袖，你是永生的，祝你再活三倍於你的高齡！」此後數年中，在詩詞及公衆演說中，人們屢次提到獨裁者的題材。

目前此一史達林私人醫生所主持及全國最優秀科學家集體合作的實驗醫學研空院，正每日爲獨裁者擬出飲食及運動的方案，以及凡可以增進他壽命的配方。當他們不斷努力求得延長的秘鑰時，史達林耐心地等候着。他已征服了全俄國，並爲一億八千萬人民的唯一治者，他希望連死亡也征服嗎？

迄至目前，此一研究院最重要的發明爲波哥莫勒茲教授的一種青春血清劑 A. C. S.。

美國著名醫生龔柏，在他最近出版的一書中，對於波哥莫勒茲醫生的發明極表熱忱。據他稱：當納粹佔領烏克蘭後，波氏及其基輔研究院的工作人員都搬到烏拉爾區的烏發繼續進行研究，迄未中斷。此一研究院爲全蘇聯設備最佳者，龔柏醫生稱：

「如 A. C. S. 的神蹟及其他蘇聯醫生的經驗獲得證實，則波氏將爲改良人類命運最有貢獻的少數英雄之一。據可靠報導稱：史達林，加里甯均已獲得波氏血清劑的裨益。如科學能在此危機階段保護并延續我們可尊敬及英明領袖們的生命，那麼，這真是進入了一新時代了。」

龔柏醫生又稱：

「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波哥，莫勒茲教授榮膺「社會主義勞動英雄」階級，并同時獲了列甯章，及鐮刀與錘金子質獎章。他的「生命的延長」一書，已爲百萬的蘇聯公民所閱讀。這也許對於蘇聯苦難的大衆，勇敢樂觀，以爭

取勝利的精神，具有極大重要性……」

蘇聯全國的醫院及接生所，至今還缺乏藥物，消毒劑，紗布，及爲醫病療傷的最基本必需設備。被戰爭毀壞的整個地方缺少醫院及醫療。若干患瘧疾者不能獲得奎寧。在俄國最簡單的延壽方法應該是爲人民供給醫藥衛生環境，停止殘殺，并釋放一千二百萬的集中營囚犯。但竟無一人敢於提出此種明顯的批評。

三六、外交家的樂園

一九三五年十月，我辭去汽車出口公司職務後，即往高加索休假，住在伏洛希羅夫爲紅軍高級官員所設的蘇奇新休憩所。我的繼任者華索夫，接事不到幾星期，就出了亂子。他將土耳其所訂的在國慶紀念日用的降落傘，取道德國裝運。在途中這批貨物不見了。史達林聽了就很震怒，並將另一批降落傘由飛機經黑海空運土國。伏氏獲了「嚴厲譴責」。

此地的軍官休憩所一共有八座，都爲五層的華麗建築，每層都有臨海的大玻璃露台。這些房子的設備，是按住者的官階的分別的，最高將領可以分得整個一所房子，其中一切設備都是最考究的，並有特別構造的鐵道可以供客人坐到私人海灘，不須徒步之勞。

這一宏偉的建築，是費了數千萬盧布在高崖上蓋造的。伏洛希羅夫會嚴令閑人不得涉足。這時，忽然土耳其駐蘇武官安維爾培帶了一位新聞記者來看我，這使我很狼狽，拒絕既不可能，而休憩所的主任又深恐因此獲到違反法令的譴責。

當我於一九三五年來此時，休憩所剛落成不久。讀者對於紅軍將校們的奢侈享受，也許感到艷羨，但百分之九十會到過此間的人們，都在以後的三年中或被處死或以失蹤聞。

我返莫斯科後，即申請入航空學校深造，一些參謀部的朋友也表示贊助。但據外務處的朋友告訴我，史達林對此表示反對。「他的教育已經受够了」，這是史說的。李維諾夫聞我已脫離貿易部，就調我回外交部，並派爲駐雅典典公使館一等秘書。同年十二月，我出國赴希臘。

我在索非亞，曾訪問駐保加利亞公使我的朋友勒斯科尼可夫。他仍年青，生活得很好，興致極佳。此時他正在爲蘇聯佈置聯絡巴爾幹國家中斯拉夫人民的感情。公餘時，他正寫作一本小說。這位前任伏爾加及加斯比海紅艦隊

司令爲一優秀戲劇作家。他的羅伯斯比爾劇本，曾在莫斯科戲院演出過。

我和勒氏及他的夫人，一起在花園中散步，初未料到不久我們都要成羅伯斯比爾的門徒——最後的雅可賓人，而被迫逃出斷頭台的命運。這位哈山及北波斯的征服者，於一九三八年奉召返國。他拒絕回國而出亡。一九三九年他從法國維那某地寄來一封信，指摘史達林的獨裁。此函公佈後，數星期他就死於神經錯亂中。據友人告訴我，他是中壽死的。我於訪問中，曾告訴勒氏，謂他一九二〇年在恩薩利的英勇作戰，使我想起到東方服務，因此影響了我一生的命運。

我的火車在一個破爛的小站停了幾分鐘。除了報紙攤及牆上一些招貼外，一無可看的東西。但我的眼睛落在一個神秘名字上——色比斯！我離開索菲亞還下雪，但此地已是豔陽天氣了。

我們的公使高培斯基親來雅典與車站歡迎我，一同駛回公使館。在莫斯科過了繁囂緊張的生活後，到此感得異常平靜舒適。

希臘正經過一個劇變的階段。在短短幾年內，它已換了幾個政權。在我到的前一年，康第里斯將軍自己做了獨裁者。他是一位有力的軍人，出身於農民家庭，並爲委里濟樂斯的故友。一九三五年三月，他鎮壓了委里濟樂斯派的叛變。此時，全國分爲柴達里斯的保皇黨，及仍然支持委氏及蘇福里斯的共和黨。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間，康氏認爲他已控制全部局勢，就宣佈恢復帝制，並自倫敦召回被逐的國王喬治二世。這位國王很英明，並且深受英國自由主義的濡染，主張施行緩靖政策，以鞏固他的王座。他並堅持對委內濟樂斯黨人頒佈特赦令，恢復自由政治，推行民主選舉，並與共和黨取得協議。換言之，這就是要推翻康第里斯的專政。他鎮定地接受了康的辭職，並任命老成持重的第米爾齊斯教授爲總理。

第氏上任後，立刻宣佈恢復民主自由。一切被放逐的人們都回來了，共產黨也公開活動，它的機關報里索巴斯的斯也重新發刊了。康氏也許因失望而驟死了。委氏厭倦了政治，亦於翌年卒於巴黎。柴達里斯及第米爾齊斯，亦不久相繼痛故。因此，一年中希臘喪失了三位最特出爲政治家。在此一空隙中，希臘的未來獨裁者美達薩斯就漸露頭角。

在我到達雅典時，新近恢復了的帝制似乎還不會鞏固，高培斯基和我同往王宮賀年。王宮似乎還不會有人住過的冷寞。大禮官美克蒂斯伯爵介紹外交團晉謁，國王和我們握手並簡短地談話。他的外表及風度均極英國式，看來極鎮靜樸實。他修飾很整潔，帶了單眼鏡。一年後，他已漸次鞏固了他的王位，他的王宮也重新佈置了。在街上可

以看到王家馬車駛過，穿着國家制服的禁衛軍也出現了，人民在街頭也養成向國王歡呼的習慣。一言以蔽之，他是治理得很認真並成功的。

我注意觀察新帝制中的第一個國會，其中柴氏和委氏黨員平分春色，而共產黨獲有十五名代表，則具舉足重輕的力量。他們隨時都可以影響一個決策的結果。但在此間的共產黨，如其他地方一樣，已放棄階級鬥爭，而加入人民陣綫。他們的投票，使委內濟樂斯派領袖獲選為國會議長。

國王遵守憲法程序，邀請此派的領袖蘇福里斯兩大黨中遴選人材組閣。但過了一月，他仍未獲成功，因其中死硬派極多，前嫌不能一時捐釋。

他們不斷地討論，直至整個議會政府的生存都受了威脅。在王宮的大廳中，一些最有名的演說家，如蘇福里斯，卡方達里斯，以及巴巴拉斯泰休等，雄辯不絕。坐在政府席上的美達薩斯，此時任代理總理，也表示厭倦的默聽着這些是非之爭。最初尙時來出席的外交團人員，現在也懶得來了。我常常發現孤單地坐在外賓席，靜聆音樂式的語言，很不容易掌握它的意義。

一九三六年八月四日，國王鑒於兩黨的相持不下及共產黨勢力日大，遂毅然廢止了憲政，美達薩斯獲得國王同意，宣佈了獨裁。

雖然我除外交工作外，尙得主持商務代表團並與希臘政府締結商約，我在此間的工作遠較莫斯科清閑。其次，希臘願意以哥林斯葡萄乾交換蘇聯麥子，條件極優厚，但貿易部絕對禁止與國外易貨的交易。因此，我失去了一個好機會。但這種官僚的嚴格固執，在我那時，已經司空見慣了。

我原來將這種外交任命認為一種避世的機會，而此間生活却意外地美滿。高培斯基爲一文雅君子，誠篤，易與，愛說話，並能對希臘文明及風景極端欣賞。我們常一同駕車出遊，領畧山光海色及歷史遺蹟。我們的外交工作不繁，使我有充裕時間享此清福。

另一使我愉快之處，厥爲高氏將蘇——希文化聯絡的工作讓我負責。因此，使館與希臘的知識份子，有許多接觸。它使我接近雅典文學，藝術，繪畫，雕刻，和建築，戲劇。這些都是我青年時和後來在義大利及法國所最嚮往的東西。我發現希臘人極和婉好客，若干雅典的文化家庭都表示歡迎我的訪問。許多別國的外交代表都很驚訝，在我們的招待會上，不獨有普通一班達官貴人們，並看到三四百雅典最風雅的人士。更幸運的是：從此文化交流中，使我得到一件對我生命最重要的收穫。

我來雅典半月後，有一羣蘇聯建築師也從莫斯科到了希臘，他們是到歐洲參觀現代及古代建築的。當然，希臘成了他們首先要訪問的地方。一九三六年一日八日，我介紹他們與希臘建築師學會相晤。在雅典實業協會大廳中有五六十位建築師等候着我們。其中有一年青女郎，髮作金紅色，姿態絕溫文婉麗。他們包圍了蘇聯代表，對於建築情形，發了許多問題。他們中只有一人能說極粗淺的法文，因此我得爲雙方繙譯。我後來將答案蒐集起來，講解了蘇聯建築的理論及趨勢。人們分開進行小組討論時，學會的會長向我說：

「我可否介紹一位同事與你談談？」

他將那位金髮女郎帶來見我。她具有古典型的希臘前額，和聰明活潑的眸子。我以爲她不過某一會員之妻或女兒，但會長說：

「巴明先生，她是梅麗。巴夫利德斯小姐，我的很卓越的同事。」

我們寒暄後，她問：「巴明先生，你不久離開雅典嗎？以後往何處去？」

「我是不走的。」我說。「我住在雅典，在俄國公使館內。」

「啊，那很好。」她說。隨後她笑了，似乎有些忸怩說：「我由你的演說，就猜想也許你是位建築師。」

「謝謝你，小姐。那是很恭維我的，但我不過是一名外交官。我很慚愧不會認出你爲建築師，請接受我的道歉。」

「我也請你原諒有限不識外交官哩！」

我們都笑了。我們俄國同僚也和着，隨即道別。

雖然我對文化聯系很感興趣，這並不意味我沒有外交工作，或對政治冷淡。我們當然和別的使館一樣的進行着，但假如讀者們希望我對於格別烏及國際共產局作些驚人的揭露，這是會失望的。我們的使館與格別烏毫不發生關係，而且高氏和我，除了知道格別烏有代理人在職員中監視我們外，也一無所悉。

關於國際共產局的活動，我也很少可談的。我們和它無關係，彼時我們外交部仍嚴格服從蘇聯政府與共產國際爲截然兩個體系的原則。因此，我們雖與其他黨員常有過從，却避免與希臘共產黨接觸。

其次，我却違反了此一原則而做了一點「秘密活動」。我除使館職務外，尚担任雅典領事，每星期要在領館會客兩次。訪問者多爲希臘商人之請求簽署者，或俄國移民申請取得國籍。偶爾也有人貢獻進行革命的冒險計劃——當然他須要金錢和「共產國際局宣傳冊子」。這班人都是很粗魯的，他們與希臘秘密警察的勾結，老遠就可以嗅到

。他們常來麻煩我們，但我們也照樣地將他們請走。

某晨，門房帶了一年青，高而淺髮的女子，抱着小孩，前來見我。他雖外表凝重，但我看出她的憂鬱。

「夫人，我有什麼可幫忙嗎？」我問。

她先看看門房已走否。隨後，她用不完全的法文告訴我關於她的故事。她原籍捷克，乃希臘共產黨書記柴加利的斯之妻。希共被禁止活動後，她住在雅典附近鄉下，丈夫僅偶一回家，常常數星期不歸，另一黨員常來照顧並寄款接濟。

「你也許從報上獲悉，」她說：「柴加利的斯已於十日前被捕，此後我會在他助手約定會晤的地方，等過兩次，但不見前來。錢都用光了，我本不想來麻煩你，但城內無熟人，又有孩子。」

她告訴了我這位助手的名字，我發現他也在報載的被捕名單之內。

「我恐怕你看不到他了，」我說：「你有其他計劃嗎？要我們作什麼？」

她想去莫斯科，有一張過期的捷克護照，要求我簽證，並供給路費。

我去看高公使。他聽了這件事後，似乎很煩惱驚詫。

「你知道很清楚，我們無權做這種事情。」他說。「我們不能將使館牽涉進去的。」

「但你不能讓這女人和孩子流落在街上。她丈夫入獄，毫無支援。我們簽證很便當，並可以從館內撥點錢給她。這是無人會知道的。我們不能坐視不救罷。」

「不要堅持罷，亞力山大·克里哥利維奇。我不能也不願這樣辦。」高氏很神經地說。

討論長而無結果，我忍氣回到領館。

「這裡是公使的回話，」我對這久候的女人說：「公使館一點也不能幫忙，我想以私人資格同你談談，你有親屬在本國嗎？如果能到布拉格，也許你可以再作計較罷。」

「我想可以的。」她慢吞吞地說。

「那麼，這點錢可以够你和孩子到布拉格的旅費和食用。我請你了解這是我自己拿出來的錢，你務須守秘密，因為我如告訴公使，他會禁止我這樣做的。你現在到捷克使館去辦簽證，如有困難就叫他們通知我。」

捷克使館的人們很有良心。他們和我電話上談過兩次後，就允許簽證。她來向我致謝，以後未聽到下文。

此外，我還得承認另一件「秘密活動」，那是一切正式外交人員都不許作的。我這時擔任了蘇聯官方機關塔斯

通訊社的國外記者。我於離莫斯科前，外交部曾告我謂塔斯社已將此職留給我。外交部不公開允許，但亦不反對。我去見塔斯社主任多列斯基。他是俄國的霍華德，短小紅潤，極和藹近人，我們很快就談妥了。

我會爲雜誌投稿，但當記者尙屬初次。它使我對平靜外交工作增加一些熱忱，並使我對希臘政治風波更感興趣。我的通訊是印了「雅典塔斯社」戳記的，每次都由使館門房送到希臘檢査局付審査。

希臘人很機敏，從未過問在塔斯社戳記後發稿的神秘人物爲誰。我的通訊當然很客觀，但也不免有些對新獨裁者不甚客氣地方。我懷疑他們是否真不知情。但雅典的外交團則始終未發現此一秘密。他們常問我爲何對於每一議會的會議，我都很耐心地聽。我猜日本代辦的被召歸國，是與我的通訊有關。

此時，在東京發生了日本一些軍官刺殺政府首要的事變。這位代辦對希臘報界發表了談話。他也許忘了日本外交官的固有謹慎和圓滑，宣稱在軍部方面此類事件並無足奇，凡明瞭日本內幕者皆可料到。我將他的談話，引証於回去的消息中，而眞理報及消息報將它渲染了刊在頭版顯著地位。這也許不是唯一理由，但這位日本外交官很快就被召回國了。

我到雅典不久，就接了英國使館請我們參加爲英皇喬治五世誌哀的宗教儀式。蘇聯爲一無神的政府，我和高公使都有好多年未進教堂。他躊躇是否應去，但最後向莫斯科請示。李維諾夫的覆電是：「照別的外交家做」。高和我都着了大禮服莊嚴地去禮拜堂，雖然我們並未將車上的鐮刀錘子紅旗移下。我們上石級時，有大羣好奇的羣衆圍來看熱鬧。

數日後，英國公使華德路爵士賈來他的新皇愛德華八世致謝的信。同時我們收到一些英國雜誌，其中登有故皇喪禮的照片，杜嘉契益夫斯基元帥也在親王及將帥們的行列中執紼。在照像中立於杜氏身旁爲一位肥碩的將軍，他就是代表西班牙的佛朗哥。

在建築師會約一月後，我在一家照像館又會晤了我所念念不忘的金髮女郎。我們相視微笑。她將剛取出來的照片給我看，在那裏她着了本國衣裳，在房頂屋子的露台上跳舞。指着房頂屋子，她得意地說：「這是我爲母親親自設計並建造的。你從它的窗外，可以遠眺亞克羅波里斯和巴德龍。」

「此時，我們的使館正要修改。上帝使我遇到你，」我說：「我們正要找一位建築師，也許你會將巴德龍帶到我們窗外哩！」

她答應來看看。我們的初次約會爲職業性的。我們巡視了房間後，但談鋒不久即從如何設計一間秘書室轉移到

古代建築術與近代的差別。她告訴我，巴德龍的圓柱是很準確地彎曲了來組成偉大的直綫和諧的。她的談論如此熱烈，興趣如此濃厚，因此我們想與其在冷寞的使館內進行，還不如到不及一哩的巴德龍去。當我們談話完畢時已到了亞克羅波里斯。

我告訴她，我想一遊美星魯斯和伊壁都魯斯的廢墟，並請她介紹同遊的嚮導。她說她自己很願奉陪。我們此後每至週末，就到名聞於世界的一些古蹟去遊覽；伊壁都魯斯的角鬥圓場，克利特內斯屈和亞加美農的莊嚴墓地，德爾非的陰沉石隙，和若干世紀以前泰那格拉遺址的荒草頽垣。

我只要能忘了國內可怕的時事動向，我的生活會是完全快樂的。當我們沿着灰塵的道路，在烈日下浪遊時，海波灼耀於水平綫上，我竭力不使這些陰影打擾我們的歡娛。我對於赫拉斯的天才和它的美麗而親切同情的孩子充滿了景慕。

在工作日子中，我每夜獨居一室，深懷悵惘。有時我以讀書或散步解愁，亦無效果。我因此常和一班希臘文人雅士到咖啡店或小酒館談心。但雖有良朋美酒，及娛人的音樂，我仍感週末的訪古浪遊較有興致。我祇有和梅麗一起，才覺得心安。

某日，我向梅麗提議，我們費了這些光陰於美術及歷史後，現在最好改變些娛樂了。她可以陪我晚間出去嗎？我們可以到海濱清靜的飯店共餐。

我們將車子開到格利華達，那是華勒隆海灣上一個小的避暑地方。越過了許多時髦旅館，我們停在沙灘旁一家小飯店。我們孤獨地坐在涼台上，空氣甯靜芬芳，圓月映在無波的海水。一位嚴肅蓄髭的侍役送上了新從海上釣起的鮮蟹，和一瓶里精那酒。我們用白的鄉下乳酪和着吃了。

我添滿了酒杯。

「梅麗，祝你幸福。」我說：「請照我做，這是我們國裡的風俗。」

我們從容地一氣乾杯，並將酒杯互碰。我不小心地將杯從肩後拋在地下。她笑着照樣做了。侍者和店主人聽到杯破聲都跳起來看，但我們並不像喝醉或口角。主人重新坐下，侍者則走來含笑地似想問

話。

「請拿些杯子來，破了的記在賬上。」我對他說。

「當兩個人在俄國如此做，」我對梅麗說：「那是會帶來好運的。」

我們沿沙灘閒遊，在另一飯館喝了咖啡，在夜的天空下，聽着希臘的爵士樂隊跳舞。舞池擠滿了人，但音樂似乎專爲我倆彈奏的。在若干年來，我初次感到輕鬆愉快。

我們回到沙灘同坐在石頭上，默然無語。我望着梅麗的面，她對視着我時，藍的眸子似乎黑而有光。我將她摟在臂中接吻。

三七、第一次莫斯科審判

蘇聯報章對於國內所發生的真正情形，極少報導。這使我們將不祥的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在差不多牧歌式的平靜中渡過。我自揣俄國的生活，也許找得了正常的水準。醫治老的創傷並忘記五年計劃期間的苦痛，是需要時間的。無疑地，這是我故意自欺，故意忘了所親見的一些事實，我逃避了思想。

八月某日，晴天霹靂的傳來了驚人消息。無線電及莫斯科報紙宣佈：辛諾維夫，加美列夫，及其他十四名「蘇維埃恐怖中心」人員的審判，訂於五日後舉行。這兩位以前黨的領袖，爲了負基羅夫暗殺案空洞的「道德上責任」，業已受到極苛刻的處分。他們被判了十年徒刑，而他們數以千計的政治友人則或被禁或被逐，不遺噍類。基羅夫死屍所要求的祭品，應該已經够數罷。我對此事感到痛厭和震駭，而且凡屬同志莫不如此。但事情畢竟沒有止境，因爲史達林還要將死人拖出來，俾能藉口消除更多的已被解除武裝和懺悔的對頭和批評者。莫斯科報紙對於審判的結果，似乎毫無疑義地每一行都指出死罪。但我們使館中却無人相信。高培斯基一度爲辛諾維夫的書記及親信，一天一天顯得蒼老了。他一向愛說話的，現在却悶悶地躲在室內抽煙，聽收音機。當審判在進行中，館內人們的情緒竟如在噩夢中。我們對這似乎瘋狂，不足信，及毫無理由與事實的發展，一字不敢提起。

我們用驚懼的眼光讀悉在炫耀的宣傳中，辛諾維夫，加美列夫，史米諾夫，和其他十三人竟供認了酷毒和顯然不可能的罪行。這些「供狀」到處都露出虛僞與衝突，而且完全爲關於動機的，其中既未舉出事實，亦未提出証件。凡熟悉基羅夫被刺案的人們，都知道這些被害者口中所滔滔自認的列寧格勒謀殺史達林中心和利用外國援助推翻蘇維埃政府，都不過是一幕殘忍的喜劇而已，當一些悲慘的真理洩露時，我們覺得可厭。

史米諾夫於答覆檢察官的訊問時，忽然露了馬脚。檢察官問：「你何時離開這個中心？」他答說：「我從未離開過，因爲那裏是沒有東西可離開的。」

維辛斯基失驚而堅決地問：「這個中心究竟存在否？」
史米諾夫疲乏地說：「你講什麼呢？」

但這種短的有人性的插曲是難得的。惡夢又要開始，半譏嘲半癡狂的對白又繼續進行着。在我們一般老黨員看來：此種審判，不啻狂想。我們對於供狀是絕對不能置信的。我們深知這批人，並且和他們從革命及內戰時起，會共過事。我們也知道在蘇聯的情形下，這些所供的事實是絕對不可能的。但這些狂想，不是爲我們而表演的。它們的聽家爲一些不懂得過去的新一代青年。這班人除了供狀本身及對於被害者一些不實的譏謗外，別無其他讀物。我們在這種制度下生活過的人，都知道此一代的青年是必然相信這些可恥的故事的。

我們所認爲不可能的，就是外面竟有人將此等狂想看得很認真。當然，外面一定有許多成熟的人們，有現實思想及訓練的政論家，辨別是非，分清涇渭。但我們猜錯了。史達林靠了一些「自由主義派」的新聞家和「同情者」們的幫助，竟能蒙蔽世人的耳目，使他們相信此種消滅仇人以攫取權勢的鬥爭，爲反對兇惡賣國賊和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行爲。他們竟簡單地解釋了「莫斯科審判案之謎」，而認爲這不過是托洛斯基爲了爭取個人權力，與納粹法西斯及日本侵略者勾結，以圖打倒史達林政權的陰謀。民主國家的新友人，認爲史達林幸而及時發現了陰謀。因此，人們應該感謝史氏，因爲他阻礙了托洛斯基的「毒」計。

回說到雅典的情形。在這十六名被害者的審判中，我們於讀到消息或聽廣播時，經常想到一個問題。這不是關於我們相信供狀與否。我們都知道供詞爲史達林及格別烏所口授。但我們所不知和不懂的，厥爲此次可怕事件究有何目的。史達林何故再度煽起此種恐懼與仇恨的旋風，在全世界降低蘇維埃的地位，並打擊它們的前途呢？我們都認爲此十六人經過極度的自瀆後，也許可以免於一死。他們以往豈非列甯的朋友和史達林的同志嗎？人們不會像瘋犬般將他們消除的。

我心中憶起許多個先例。我們革命時期的大審判案，很少有處死的事情。在初年中，有好些反布什維克的社會黨人，僅受到流放國外的處分。一九二二年的社會革命派審判案中，亦僅有一人判死刑。以破壞被控的沙克地工程師審判案，亦只處決幾個人。其餘的都獲了短期徒刑或流放西伯利亞工廠中作工。會承認與法國參謀合作陰謀武力干涉俄國的拉姆新審判案主角，受了短期監禁後，旋被赦免。在俄國孟什維克大審判案中，被控者也僅獲到長期的監獄生涯。我想史達林決不會再要使他以前的同志們流血的。這些人們與他共事多年，且爲黨及十月革命的老領袖。這樣的結局，是會不可思議的。

此時，有一項消息堅定了我們這種信念。在基羅夫事件後，曾一度取消被告上訴於蘇維埃執行首長請求寬刑的權利。但在此次審判的前夕，忽然將此項上訴權恢復了。這也許是為辛諾維夫一班人設想的，我們從未料到這是引誘他們招供的一種圈套。

當審判主文及處死的消息由無線電傳來時，我們都感到鬼一般的靜默。我們連耳語也不敢說一句，並連看人的勇氣也消失了。我驚呆了，因為我知道這就是布什維克歷史中整個時代的末日。

可憐的高培斯基面容慘白，默默無聲地坐着。他和辛諾維夫的密誼，是我們所熟知的。他被擊潰了，但仍得履行他的職責。他得召集職員，將經過情形簡單地傳達，並告訴他們草擬擁護法庭判決的決議。他躲在書房中起草聲明，並以戰慄的聲調向我們宣讀了。一切應有的術語，都是「人類的渣滓」，「像瘋犬般的槍決」，「我們敬愛的元首的英明領導」，「托洛斯基惡毒的消除」。這對於讀者及聽者都為一種虐待，我們全體一致將決議通過了，我們每人心中心感到遺憾。

數日後，希臘報紙載有莫斯科報導，據謂政府將調回幾名所謂聲名不佳的外交官員，包括達夫蒂因，勒斯科尼可夫，及高培斯基。我買了報紙給高看，但他未作聲，表情殊為緊張。他打電報給李維諾夫要求正式否認此項公報，或召彼返國。李的覆電為：「留任候命」。

我們日常生活仍照舊進行，但內心則有難言之痛。

每次從莫斯科寄來的信中，都附有黨部書記或圖書館員所必須立刻焚燬的書籍名單。凡與最近審判案有關的一些馬克思學說理論家或著作家的書籍，都在被焚之列。既然最近十五年來，凡屬第一第二或第三流作家都多少牽涉到邪說，我們書架上還有什麼可陳列的書籍呢？就是古書中，凡有布哈林，拉德克，或比里奧巴拉真斯基作過序文的，都得付之一炬！

「按此種速度。」我想：「我們所焚的書，不久就會超過納粹們所燬滅的——尤其是馬克思作家的書。」真的，有一部份馬克思本人的著作，曾經過里亞塞諾夫編訂的，都遭了禁止。里氏為著名馬克思通及馬列學院的創辦人，但會被放逐。加美列夫所編的列甯著作的初版，也被禁止流通。

史達林也將他本人的唯一著作——一些論文及演講集——不動聲色地從圖書館及書店中撤回了。他的理由是，在這些早期寫作中，曾有下列的文字：

「一切關於十月起義的實際組織工作，皆係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托洛斯基同志直接主持下進行的。該城衛戍

隊之能很迅速地加入蘇維埃方面，皆爲托洛斯基同志之功績及軍事革命委員會之優良組織。」

「托洛斯基同志會認爲辛諾維夫及加美列夫爲本黨中的右翼……：既如此，我們如何能避免分裂呢？……：黨並未分裂，而紛爭的時間亦僅有幾天，因加美列夫及辛諾維夫爲列甯主義者，及布什維克主義者。」

「……：布哈林從未違反任何黨的決策。你們要求他的血嗎？那是不可能的，你們應知道……：果如此，我們將伊於胡底呢？我們今日宰布哈林，明天又殺別人，迄至黨被毀滅了！」

在審判中，更無一人敢於回憶史達林的三項聲明。

梅麗與我，在整個夏季中作了不少的愉快旅行。我們遊了愛琴島，的賽莫斯島。那是她的故鄉，有如夢的和平與美麗。但八月中的的一些發展，使我完全感到頹喪。我們的愛情及希臘風景的偉大，都不能驅除我的煩憂。我們偶而到雅典近郊出遊，但已經停止訪問一些希臘古城了。我大半的光陰消磨於沉默中，並且梅麗的情緒也很壞，因爲她正經過一段憂悶時期。

我們會計劃了未來的生活。她準備將她在雅典的職務結束後同我去俄國。在那裏我們可以合作，進行建設祖國的偉大工作。但她將計劃告知家人後，他們都反對她與一位俄國人結婚。這位嬌弱的女郎，是過慣了風和日麗的希臘生活，她如何受得起俄國冰天雪地的酷寒呢？到那裏她是會生病受苦的，她會永遠完了。

梅麗不相信他們所說的情形，並堅持己見。她很淡然地告訴我這些辯論。但我憂慮了。我知道像她這樣習于安逸的人，去過俄國艱苦的生活是不很容易的。我毫不懷疑她的勇氣。我知道她必然具了很大的決心與毅力，才能反對家庭及師友的規勸，克苦地學習了五年，獲到建築工程師的地位。她家裏知道她堅強的個性。但仍極力勸她打消這一新的「怪僻思想」。我所憂的並非俄國生活的艱苦，而爲她到俄國後，必然覺到的失望。我希望她愛俄國並能在那裏獲得快樂。

某日午後，我正預備走出使館時，接了梅麗的電話。她頓聲說：「舒拉，我知你有約會，但我立刻要見你——五分鐘够了。」

我趕快走到運動場附近的小咖啡店，梅麗已在等候着，她牽了我的手，似乎極疲乏憂鬱。

「我正須要和你相聚一分鐘。」她半道歉地說：「我似乎失了勇氣，想要將它拿回來。」

她此時正遇到最難的考驗。她母親含淚向她呼籲：梅麗爲她唯一快樂。她的兒子們會永遠離家不返了。她不能離開愛女生活。她也許再看不到梅麗。梅麗已經拒絕了一切理智的辯論，但這種感情的呼籲是使她很難於應付的。

我們同桌坐着，我握了她的手。

「提高你的信心罷。」我引証了她會爲我繙譯的一句石刻上的語句。

她對我微微一笑，精神一振。她離開時，已重新獲得勇氣。我看她走進汽車後，心中感到溫欣自得。

八月審判案的慘劇後，我們館中的工作幾乎停頓下來。我們既未接獲關於一般政治情形的書信及情報，亦未收到關於時事及政治的分析。此時，義國與阿比西尼亞正進行戰爭，蘇聯雖與阿同情，但照常以汽油供給義大利。我很詫異爲何莫斯科竟未向我們作任何解釋。同時，西班牙內戰暴發了。蘇聯對於共和國的保衛者竟未予以任何援助。我們亦未接到關於此事的說明。

當史達林決定支援西班牙的服忠黨並派前駐巴黎代辦羅生堡爲大使時，我接到克萊斯丁斯基電報任爲駐亞里干德總領事。這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的事。但此項任命不到幾天就取消了。因爲蘇聯大使館已隨西班牙政府搬到它附近的華倫西亞。

是年十二月，我決計開汽車赴莫斯科渡假。巴爾幹的道路在冬季中是不能走的。因此我計劃取道義大利，捷克以及波蘭。自布林地西至莫斯科全程爲三千里。我對於此項冒險旅行，蓄意已久。我以前的列甯格勒至莫斯科一段狼狽旅行，並未使我減少熱忱。我現在須要幹些粗苦的工作，來忘記心頭的憂鬱思想。

高培斯基及其他同事都極力勸阻，並且指出沿途的危險，尤其是波蘭至俄國一段路。當然，沒有人在冬天會作過此種旅行。他們預言，我絕不能到達目的地，只會將汽車撞成粉碎，而我本人則流落於某些雪山中。但我認爲他們的可怕預言，爲看輕了我運動員的勇武的挑戰。並且事情愈糟，那是會愈適合我此時的情緒的。

爲使我的朋友安心計，我指出蘇聯道路設計中，有一條自波蘭邊境直達莫斯科的公路，將於本月完工。因此，我最壞的一段旅程，不過要走新修的道路而已，我對於此一消息雖不敢確定，但說得頗動聽。我又告訴他們：在途中也許帶一位使館人員作伴。

爲了沿途的危險，我決計不用館裏的汽車。我一年來的節約，我買了一部新福特車，數日前方從紐約運到。我於出發的前夕，與梅麗開車至海濱。我們又到了前次擊碎酒杯的餐館。我們爲前途幸福而乾杯。梅麗對於去俄國後的工作有許多的計劃，而我也應許竭力設法調職回國。我說，我預備將汽車留在俄國，在理想中我已經看到梅麗坐了車子，走過莫斯科街道去上工。

我們最後一次看到華勒隆海灣，月光甯靜地照耀水面，正如我們初夜的歡會，空氣溫和而寂靜，我提醒梅麗在

此時俄國的道路，正淹沒於冰雪中，寒風在鄉村怒吼。我約定於一月杪歸來。

翌晨，我於赴皮拉斯海港途中，向花店訂了一束紅玫瑰花，囑咐於一月八日送給梅麗，並附以小卡片寫着「紀念我們一年前建築師會的相晤」。

我叙述此事是因爲在三年後，此一週年紀念中發生了一件對我們兩人都有意義的事，我們在巴黎過了兩年的遺失生活後，即於一九三九年聖誕前夕，自燈火管制的濃霧中，離哈維爾趁輪去開始我們新大陸的新生活。我們的船——第格拉西原應於十日後抵紐約，爲了等候護航，在南修坦浦敦登停了好幾天，然後曲折地渡過大西洋。我們在上海上航行了兩星期，抵紐約時恰爲一月八日。

當我們從赫德森經曼哈頓的西區步行時，街上正在融雪。出差汽車將泥漿弄污我們滿身。我們得小心地在堆著空菓筐的人行道上行走。但我們想，這一輩子從未見過如此美麗的都市。我們携手同行，感到輕鬆幸福。我們似乎想歌唱。

我們每年紀念這一個日子，視爲雙重的感恩節。它使我們在一起，它給予我們一個新國家及新家庭。

三八、我赴俄羅斯的最後一遭

我作了一切的準備，將福特車裝上各種零件，即於十二月十四日從皮拉烏斯登輪赴布林地西。

一天清早，我就跑到甲板上，俾能最後一次看到赫拉斯。天色陰沉，偶爾太陽的微光透過烏雲，照在嶮崎的海岸綫上，組成溫柔半明的色彩，那是所有一切希臘的風光中我所最欣賞的。但有陽光的時間很短，當我們經過哥林斯海峽及希臘西部海岸時，兩邊的山都顯得陰晦沉鬱。中午，我們到了烏利西斯的故鄉義達加海灣，停錨在一個倚海而建的美麗城市。在那裏，有一處小要塞島很使我聯想到那布里亞海灣。小城的名是華泰。我們向科佛進發，於晚間到達。這個城與地中海上一般義大利小城頗相類似，不過在這裏，它的風景莊嚴平靜，多少有些希臘特質。翌日，丹抵布林地西海港。

從布林地西到羅馬，我一天開了五百哩路。這是一個冷天，但陽光很強，而沿途風景也頗饒變化，尤其在過了福基亞的山中。小的鄉村茅舍夾立於可憐的貧民屋中，其建築的奇特，爲我前所未親者。這些房子的牆上，都貼了歌頌杜司及新羅馬帝國的偉大的標語。我直到那不勒斯才停下來休憩。在那裏匆忙地進了食，欣賞了夜的那不勒斯

海灣。我駛近羅馬時，已爲半夜。此時我遇了大霧，每小時速度減到十哩，俾不致與一般運蔬菜的手車相撞。在這一段開車也頗吃力，而且感到不愉快。

我不斷地走了十四小時才到羅馬街上。全城都很靜穆，而霧也更濃。在這個濛濛的「永存都市」中，我隱約地看到偉大的科力沁的影子。

在蘇聯大使館，一位疲倦的司閘將我領到客房。我用熱水沐浴後，睡得像死人一樣。我在羅馬的兩天生活，有舊雨重溫的如夢一般的快樂。在米蘭，我參加了施泰因大使召集的會議，討論了國聯問題和史達林及李維諾夫的外交政策。施於談話中對領袖們充滿了譽揚。我想他這種「得體的說話方式」，已經代替了他早年的粗魯和自尊的坦白態度了。

我在弔馬可餓了鴿子，並在大雪中駛過布倫納關。我的旅行變爲更艱苦，但也更興奮。在雪崩的季節，阿爾卑斯山及奧國的公路並非很安全的地方，但風景則異常瑰麗。入夜後，我從色美林螺旋式地將車駛下，經過冰澆的道路。這不是利車壞和神經弱的駕駛人所辦得到的。謝謝我的車鍊，沒有出事。隨後，在波蘭及白俄羅斯公路上，我更得感激我的車鍊，使我不致遇險。

在維也納，我們公使羅倫茲家中，我遇到一些紅軍軍官及格別烏高級官員。他們都很興奮快樂，正預備去參加西班牙的戰爭。我想：像他們後來都爲着史達林的失敗而犧牲性命了。

到維也納後，我找旅伴的希望也烟消雲散了。人們又告訴我駕汽車在冬天經過波蘭及俄國的危險，並誠懇地勸我改趁火車，但我仍照常前進。

波蘭的道路極壞，我費了兩天才到克拉科，又從那裏到華沙。途中我遇了融雪的大風暴。在一段路上，全是濕冰，在另一段則有厚至一尺的雪。過了克拉科後，我車頭的探照燈壞了，只得在黑暗中開駛，每遇汽車，就駛到路旁躲避。這是很疲乏的工作，並且有時極苦悶，但它使我至少忘了些我要忘記的事。我只恐不能於月底趕至莫斯科，因爲我答應同我孩子們過新年。

風景雖不特殊，但絕美麗——到處都是靜白的山和荒蕪了的田園。我有時又感觸到廣漠的寂寥。除了一行一行大樹中的道路一望無際及兩旁雪白的原野外，空無所有。寒風將積雪掀起，路上除了一些烏鴉笨拙地在車前跳過外，毫無生命。我將收音機開了，壓低了的樂聲與冷寞的風景奇怪地配合在一起。

聖誕夜，我於風雪交加中抵達華沙，做了達夫蒂因大使和他的曾做過演戲員的太太馬克沙可娃的客人。像許多

其他俄國官員一樣，這位詔詔和傲慢的駐波蘭大使尚未夢想到他是享受最後的自由和事實上最後幾天的生命。離華沙的翌日，我經過許多猶太人的鄉村，其外表看來都是貧苦不堪的。道路變得更壞了，但氣候雖冷却極愉快。離華沙兩日後，我開始感到極度疲乏，但仍繼續前進，希望於天黑前趕到邊境。

兩名隱伏在路旁濠溝的哨兵跳出來，命我停車。一位官員從數百碼外邊境衛兵室走來，他很和藹但很堅定。我絕無當晚通過的可能。他們條例是很嚴格的，任何人於日落後皆不得越境。並且無論他們如何高聲的嚷，蘇聯哨兵也不肯出來。

結果，我得退回廿哩，在一個村裏過夜。

我在市集中一位猶太婦人家裏借宿一夜。當地的警察走來看我，並將文件翻了好些時候。翌晨，在零下幾度的天氣下，我又上了路。波蘭官員和哨兵陪我坐車到邊境。寒風刺骨，使寒流覺得有十倍的嚴酷。我將汽車停於一個已結冰小溪的橋前，橋的兩端是用橫木封鎖的，在我們的一端，漆成波蘭的粉紅與白色，而在另端則漆成深紅。再過去就是毫無邊際的蘇聯領土。除了一片雪的荒漠外，一無所見。約一哩外，在隆起的高阜上，有一間新蓋的木屋，爲蘇聯哨兵住處。

波蘭官員下令後，哨兵對空中開了兩槍。我們等了五分，十分，以至一刻鐘。蘇聯方面迄無動靜。遠處的木屋似乎空無人住。

這位官員的臉也凍青了。他用激怒的聲音說：

「你們應該將信號重作一次才下來。但總是如此的，我們有事時，他們就寧可留在木屋中。」

我們繼續發槍，過了一小時，才聽得遠處有微弱的槍聲作答。兩個穿軍大衣的哨兵，從木屋走出來。又過了半小時，他們才到橋頭。一位年輕的蘇聯官員緩步走來，似乎驚奇的看了汽車一眼，並且對波蘭軍官行了禮。這位波蘭軍官將我的護照遞給他，似乎急於完成手續。紅軍官將護照拿在手中翻來翻去，很狼狽地說：

「我們的指揮官不在，我想要等他回來才可讓你過去，最好等一會。」

我躊躇了，波蘭軍官轉向我弄舌頭作響。他似乎譏笑說：

「你看：總是這一套。」

「我們去找值日官。」這位年青的軍人面紅地說。

我打斷了他的躊躇。

「立刻開放障礙罷，同志。」我說：「我的証件都是合格的。你的責任是趕緊執行命令，不要讓我們這些隣人等候，你有什麼問我的？可以等我到了你那裏再說。」

我的聲調起了作用，我走回汽車，駛過了橋。我們在去木屋的途中，年青的衛兵開始向我道歉，他說在這樣冬天有汽車來，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他最後見到汽車還是八月間的事，那車是屬於一位英國外交官的。莫斯科事前會通知了他們。他們從未夢想什麼人會於此時作這樣的旅行。

在邊境的木屋中，他們很客氣招待我。指揮官不久就來了，我們的誤會也解釋清楚。我立刻就離開上道。但我接了壞消息。新的公路此時應已經完成了，但事實却還未開工，因此，我得循着一些老路走，其中有些是很好，但有些却無從修理。

晚間，我在明思克過了一夜，爲季加羅的客人。季氏此時任白俄羅斯中央委員書記，翌年於整肅中被槍決。他也是內戰中高加索的著名游擊領袖。過了明思克才幾哩路，我的福特車陷入了三尺多深的漂流物中。此時才清晨五點鐘，雪正不斷地下着。我一點也看不清。差不多兩小時之久，連一部汽車，手車，及一個人也沒有。我的兩足都凍壞了，失去知覺。我將皮鞋脫下，用雪來揉，擦，俾血脈流通，過了一小時，又得如是做一次。

我正開始真的失望時，從路上走來一個人。他是個中年窮人，肩上負了東西，在雪中走。他告訴我，約兩哩外有一處集體農場。我起身去找到了那地方。在一堆小茅屋子擠滿了小孩們，並聞得牛羊的氣味。但這些人們出來替我幫忙，用一隊瘦馬，費了很大氣力將車子拖出。

「我們是缺少皮帶的，」他們解釋說：「你知道弄一張皮子是如何的困難。」

第二夜，我在羅斯拉夫渡過。十二月卅一日下午，我循波多斯基公路抵達斯科。我還未忘記四年前的意外，所以在莫斯科街上開車特別小心。警察及行人很奇怪地注視我車上的外國牌照。

我同外交部接好頭，就將車子停在李維諾夫所住的著名的史比利登尼夫卡大廈的汽車間。

我想。我乃第一位在冬天從華沙駕車到莫斯科的人，因此頗爲自負。我現在才明白爲什麼有許多旅行家不喜循正路而走危險的道路。以前我認爲這是一種假紳士架子的態度。我車子的唯一損壞，爲車頂上一盞燈破了。這却是我的頭撞壞的。否則，它也許可以說我的汽車仍和我從雅典提出時一樣的新。我將車子擺在李維諾夫的車間後，就不再會見到它。當我脫離蘇聯他們宣判我的死刑後，這部車子也和其他所有物一樣，全被政府沒收了。

我於第二次（卽比亞德可夫案）審判案開始前三星期，抵達莫斯科。我發現在那裏沒有人敢於談起政治問題。

我有許多顯赫的朋友都神秘地失蹤了。他們當然是都已被捕了。有時無意中提到他們的名字，也可以引起人們的不安。一些有地位的黨員都像垂危的病人，仍空懷着希望，等待局勢恢復正常。因此他們埋頭工作，不問世事。

我亟想獲得關於辛諾維夫審判案的消息，並極小心地進行打聽。最後我遇到一位極熟的朋友。他爲一位記者，與史達林的親信左右很接近。他告訴我，這十六名被迫害者會獲得了可以減刑的正式諾言，交換條件就是他們要犧牲個人的榮譽，做成所需要於他們的供詞，俾爲他們忠於黨部及反對托洛斯基的證明。爲了表示此一諾言的可靠，在五天前他們宣佈恢復被控人請求緩刑的特權。這些人雖不大相信史達林，但別無其他善法。

當審判開始時，他們就看到法庭的空氣，報紙的宣傳，和許多的大會對他們不利的指摘。無分老少及職業的不同，都要求處他們以極刑。他們至此才覺悟到如果接受此項交易，命運就會完了。但供詞已出，無可挽回。他們只得服從史達林的命令。

托洛斯基在他論審判案一書中（書名爲史達林的罪行），對於被告者供出他們唯一動機爲「貪權的慾望」，表示驚訝。他指出，在無階級的黨內，權力僅爲改造社會的方法。爲權力而爭權力，這是無可形容的「愚笨與庸俗」。我這位真理報的朋友，對於此一顯然愚笨與庸俗的行爲作了新註釋。

「他們否認抱有任何與史達林不同的政見……你要明白他們所企求僅爲權勢，」他說：「而且這些法官，連國家檢察官維辛斯基在內，和一般記者們，都承認了這種說法。我們大聲地宣傳他們和史達林的意見是一致的。他們之所以弄到如此，完全是忘了一切理想，只貪權勢而已。這是很妙的詭計，而且成爲整個審判案題旨。」

我未明白他的意思。

「但你不能見到嗎？假使他們與史氏並無政見上的分歧而只圖權勢，那就是說明史氏本人亦無不同政策，而僅爲維持個人權力而鬥爭了。他們所說的就是表明他們已不承認史的領袖地位，並且史氏要將列寧的一般朋友們置之死地，俾能保護他自己的地位。」

「這一類說法，使主子感得極大的不安。他原已成竹在胸，故在審判時即前往高加索休假。但他從報紙及電報中獲悉被控者的策畧後，就極爲震怒。他在回電中因爲我們受了愚弄，墮入圈套。大大地申斥了法庭，格別烏，雅哥達以及真理報和消息報。」

「我們都爲着腦袋小心，當然立刻改變了論調。真理報立刻對被控者進行攻擊，指出他們爲勾結外國的叛徒，圖恢復資本主義，並以貪權爲藉口，以進行這些不軌陰謀。國家檢察官也採取了同一作風。但現在已無法再從他們

招出使主子更滿意的供詞。在史達林心中，此次的審判是失敗了。主使此次審判的雅哥達的獲咎，實種因於此。八年前，雅哥達會同情過布哈林，這是史氏不會忘記的，雅因此被撤職，而以葉壽夫代之。」

我的友人又告訴我莫斯科一些圖書館主管們所受的監視，較之其他人們更嚴密。經常有人來搜查圖書館。過去若干年的報紙合訂本，是不許人們閱讀的。因為有許多「人民公敵」都寫過文章。因此，如有人向圖書館管理人借閱消息報的舊報，他還是答應與否呢？如果拒絕，人們可以指摘他為破壞。如應允呢，則有被認為從事反革命宣傳的危險。假使向上級請示，他又要被指為不負責任……：

而我以前却想做圖書館員，因為這是沒有風波的職務。

爲了在辛諾維夫審判案中所採取的新路線及防止以後審判中類似的失敗，他們只得強調外國政府如何勾結反對派陰謀打倒蘇聯。他們要在人民心目中產生一種全國充滿了外國間諜的印象，因此一切報紙，無線電廣播，戲院及書店都成了傳播間諜故事的宣傳工具。在真理報及消息報上，每天都載有此種故事，並呼籲人民警覺的論文。這種間諜狂使一切外國人，連共產黨員及革命家在內，都被了間諜嫌疑。人們不敢和外國人做朋友，就是從外國收到一張明信片也有危險。有許多來俄國的遊行者注意到此項現象，但不明其故。它是爲了在未來的荒謬審判及逼供中，預備好一種空氣，俾掩護史達林將老布什維克黨作流血的剷除。

我可以將巴夫倫科例子，說明政府對間諜狂的宣傳如何無微不至。巴爲一年青的黨員作家，曾寫過關於中國共產黨的一本小說，書名爲「在東方」。故事有如下述：在黑龍江濱，一位中國共產黨員被日本兵開槍射擊。他跳到江內，受了彈傷流血，但仍能泅水到蘇聯領土的對岸。他得救了。後來進了蘇聯軍事學校，成爲紅軍軍官，回國後即領導一支游擊隊，光榮地進行抗日戰爭。這是一部頗成功的作品。

某日，我見到一張電影標語，寫着「根據巴夫倫科的在東方的背景」。電影的開場與書中情節無異，而結果却大不相同。這位中國共產黨員，於受到蘇聯兄弟們的熱烈歡迎，並加入陸軍學校後，忽被揭開面具，發現爲一個日本間諜。巴氏爲一有相當地位的作家，但受了當局示意，竟不惜將他理想的革命故事改爲恰好相反的劇情。他所創造的人物，原是要作革命國際主義的例證的，却一變而爲相信任何外國人都有危險的例子，縱然這些外人是極忠於蘇聯的。

三九、文藝在獨裁下發揚了

獨裁者對文藝的壓力，也逐年增強了。我離國後一年中，此種趨勢更爲顯明。空氣窒息，差不多每天都頒佈了些新政策，指示人們如何創作，使降低了全國文藝生活的素質。自卑心理代替了尊嚴的意識，而庸庸者往往爬上天才的寶座。除了獲得克姆林宮的賞識，要想在藝術生涯中出人頭地是絕不可能的。

好些成名的作家，都因爲領袖的喜怒不常而被打入冷宮。一度被公認爲「蘇聯文學之父」的比爾雅克也沒沒無聞了。他的著作，被禁止印行。數年前有人在討論蘇聯文學中提到他的名字，也受了嚴厲處分。還有好些類似的例子，其作者的書籍會發行至數百萬本者。另一方面，若干無名的作家則平步青雲。著名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却有前後不同的命運。當他生前官方的批評不佳，使他沮喪自殺。但他歿後數年，史達林忽然尊他爲蘇聯偉大的詩人。並將莫斯科一個方場，戲院，和一處集體農場用了他的名字命名爲紀念。

直至一九三零年代的初期，托爾斯泰伯爵仍受到人們的酷評，並被指爲將外國理想用於蘇聯文學的文藝煽動者。但不久，他就受到史達林的垂青。高爾基卒後，他成功了第一名蘇聯作家。

托爾斯泰登龍之速是很典型的。他爲貴族的托爾斯泰的私生子，但因在文學上描寫俄國鄉紳生活習俗，對帝俄忠誠，獲得襲爵的恩遇。一九一六年，他隨俄國作家代表團赴英，俾促進溫莎王朝與羅曼諾夫王朝的友好關係。他反對布什維克革命，並且在國外逃亡達五年之久。一九二二年新經濟政策實施後，托氏才回到蘇聯。他的著作仍能出版，但受到嚴格檢查及批評，尤其是他的名著「彼得一世」。他顯然對於此種緊張感到厭倦了。我從他一位摯友處獲悉托氏曾於一九三〇年中，對另一失意作家說：

「朋友，我們都太笨了。我們如想贏得人們喝彩，只須熟讀最近黨大會的一些速記報告，並忠實地遵循它的政治路線就够了。」

那就是他以後的作風。因此，他此後的作品都迎合了批評家的心理，並獲得最高領袖本人的贊許。當人們獲悉史達林有意將他自己爲俄國服務媲美於彼得大帝時，他的「彼得一世」一部小說，經過了符合黨的路綫的重新編訂，也獲得熱烈的譽揚。

在莫斯科公審後的集體整肅及剷除間諜期間，托爾斯泰宣佈他將重寫「彼得一世」。在此一劇本中，彼得大帝

與他的兒子亞力西斯的鬥爭，和史達林與反對派的鬥爭，已經有些相似之處。但現在布哈林一班人已被斷定爲外國的代理人。因此，托氏從歷史文獻中獲得了新的資料。在他改正後的「彼得一世」小說中，亞力西斯親王成了受瑞典國王及土耳其皇帝津貼的間諜和代理人。

托爾斯泰用這種方法榮獲桂冠，並十萬盧布的史達林獎金後，就出版了一部獨裁者做紅軍領袖及內戰勝利者的三部曲。在此一書中，他根據官方歷史，揭露了托洛斯基的罪行，說他當組織並主持紅軍時，卽已事實上做了外國干涉者的秘密代理人。他對於史達林的無恥獻媚，可於下述一段有宗教狂的阿諛中看出：

「我一想到我們生活在最光榮，舉世無雙，崇高無比的史達林的時代，我就感到要號叫，怒吼，尖呼，並喊叫的狂歡。我們的呼吸，我們的血，我們的生命，偉大的史達林，請拿去罷！」

他在另一次恭維獨裁者說：

「你是人民的光明太陽，永不落下的太陽，您也高於太陽，因爲太陽是無智慧的。」

在蘇聯，人們如欲享文名可以不須天才。托爾斯泰當然是多才的，但這不過湊巧而已。競爭的標準不祇是好寫作，而爲阿諛獨裁者的本領。天才，尊嚴及風趣，都是無足輕重的。問題是誰能最响亮地稱道獨裁者呢？以「名詩人」葛耳舍夫爲例，他從未寫過一首可誦的詩，也許永遠不會。但某日他忽爲全蘇聯批評家公認爲最偉大的詩人，他的成名詩，業已譯成了一六七種方言，家傳戶誦。無綫電廣播台也將他的詩送發了幾百萬本。以下萬葛氏名作的忠實譯文：

當布丹尼微笑時，

頓河的冰也融了；

當布丹尼微笑時，

楓樹正盛開着花。

當伏洛希羅夫微笑時，

太陽開始照耀；

當伏洛希羅夫微笑時，

春天來到了人間。

當史達林微笑時，
詩人敢作何事？

當史達林微笑時，

一切無從比擬！

獨裁者六秩壽辰中，馬哈爾可夫呈獻了下列一首詩，它曾刊於全國報紙中，包括官方的消息報。

莫斯科入睡了，夜的城市，

曉星照耀在雪中。

只有史達林，爲了照顧我們，無眠，在燈光輝皇中。

爲了我們祖國無數勇敢，忠實，勤勞的人們，

他用慈祥保護的手，

不躊躇地照顧到我們。

在遠漠的山谷中，

牧童熱忱地領着羊羣；

從基詩拉克的狹弄中，

史達林衛護了他每一動作。

史達林也聽到水池畔，

牧羊者的喋喋閑話；

他若寫信給領袖，

史達林會親筆答覆。

在貝加爾路上你寂寞地，

在伊茲巴內悲苦呻吟；

你放心罷，只有史達林知你痛楚，會加以援手。

詩人貝齊孟斯基爲壹才具庸庸的人，但係黨員。在布爾壽戲院舉行的普希金百年紀念中，他莊嚴地朗誦了壹首頌歌，它的結句爲普希金的名句：

「太陽暮歲！黑暗永遠消逝！」

但貝氏接着說：

「普希金萬歲！史達林萬歲！」

這引起了愛好詩歌的聽衆一致熱烈歡呼。身爲科學院院士的魯波爾教授，也模仿了這些文學的賣淫行爲，在普希金百年紀念中稱：「我們紀念普希金即等於紀念列甯——史達林的國家政策，因爲史達林及史達林憲法使人民獲得普希金。」

很倖運的，那時還有人對於這種以阿諛當文學敢發出訕笑。那年，在莫斯科會舉行詩人勒門托夫紀念坊的揭幕禮。在那裏有許多顯要參加，並有演說及音樂。但揭幕時，則人們很驚訝地發現爲史達林的塑像。

一位驚愕的官員低聲問他的鄰人：「但這與勒門托夫有什麼關係呢？」

「不要笨，」那人回說：「你不見他手中拿了一卷勒門托夫的詩哩！」

在史達林青年及早年時，他對音樂的嗜好是屬於民間音樂一類的。他成了獨裁者後，便養成了對歌劇及舞踊的愛好，並成了這些藝術的贊助者。不像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贊助者，所出的獎金往往不超過數十萬元，而史達林從國庫中予取予携所拿出的獎金，則以千百萬計。受惠的藝術家，往往向史氏直接致謝。在克姆林宮所舉行的招待史泰漢諾夫工作，北極探險家，及其他的英雄們和外賓的宴會中，他往往召集了全部藝員們表演歌劇，舞踊，及其他節目。他創做了從「有成績的藝術家」至「共和國人民藝術家」的各種演員及藝術家的階後制度。除了這些榮譽酬報外，史氏並「建議於政府」，撥出鉅款津貼戲院，或建築新劇場。他並以鉅額金錢賞賚他所垂青的演員。報紙於公佈這種捐助時，經常強調它是由於史達林所發動的。

凡有新歌劇及舞踊初夜上演，史達林總是在場欣賞的。他所到之處，以前的皇室花樓總是供他用的。史氏喜歡坐在第二排的後座上，前座則留給他的同伴。格別烏官員着便裝或制服列坐在兩旁。當休憩時，劇場主持人特別爲他在包廂的客廳內置備了講究的餐桌，因爲獨裁者從不到休憩室進食。觀衆們往往不知道史氏在場，而須從

翌日的報紙上看到消息。但爲觀衆瞥見史氏在花樓時，全場便立刻起來歡呼示敬，連台上的演員也停止表演來參加。

爲迎合史氏心意，喬治亞的歌劇團也一度來莫斯科演出。它的表演並不高明，但獲得第一流的批評家的一致推崇，這是因爲他們這些演員都是史氏同鄉之故。

主子固然能一擲千金，表示他對藝術的獎勵，但他如有所不滿時，則亦能辣手無情。某次莫斯科第二美術戲院上演了杜瓦爾的一齣戲。杜氏親自應邀從巴黎來參加。在招待杜氏的宴會中，戲院主任格西尼夫對杜氏訴說他很抱歉未能獲得當局允許，將劇團帶到國外表演。他是否如此說過，殊無關宏旨，但此言却已傳到史達林耳中。他立刻下令封了戲院，並將它遷至羅斯托夫小城。當劇班拒絕「自動地」一流放後，蘇聯報紙就對它作了激烈的攻擊。他們指出莫斯科第二美術戲院不合潮流，對於藝術毫無貢獻。政府明令將它解散，並將演員安插在一些別的戲院中。因此，這個史丹尼斯拉夫斯基的著名的莫斯科藝術戲院的長兒——莫斯科第二美術戲院竟壽終正寢了。

當整肅期中，黨及政府領袖們會聯袂欣賞布爾喬亞劇場中的貝多芬的伊洛加演奏。翌日，主要的音樂批評家都宣稱貝多芬的曲譜與史達林時代很和諧。他們竟發現伊洛加爲闡揚史達林歷史地位的一種預言。

此一件事，至少幫助貝多芬的樂曲在蘇聯的流行起來。它並且提拔了俄國最有天才的當代作曲家和舉世知名的舒斯達科維奇。在獨裁者變爲貝多芬崇拜者前若干年，此一著名藝術家受盡了官方抵制的痛苦。這種抵制等於對藝術判了死刑，他的樂曲不能在蘇聯任何地方演出，樂譜亦不能付印。他本人差不多無法維持生活，僅賴一些朋友接濟。

史氏從未聽過舒的成名作歌劇伊卡特里那伊茲美洛娃。但這齣歌劇的聲名日大。它在尼米諾維奇丹真科的音樂戲院演出時，總是場場滿座。最後，某夜，史達林並未通知院方突然駕臨觀劇。他們請他坐在場內最佳的地方——主任的私人包廂，但不幸的這個戲場原來是一個商人俱樂部改建的。它的配音的設備極不合式。包廂又在樂隊之上，聲音很嘈雜，主子原是心緒不佳來此消遣的，結果他不耐煩等到第二幕未完即離席而去。

翌日真理報發動了對舒的攻擊。主要的一篇文章爲堂堂的政府藝術委員會主席克珊西夫所署名的。他忽然發現了舒氏爲音樂界的反革命份子，小資產階級標準的游藝家，並且甚至罵他毫無作曲家的資格。這位敏感的天才原爲柴可夫斯基，包羅廷及格林加以後最偉大作曲之一，但現在被一班從前將他捧入青雲的人們所譏詆了，這些批評家也在報紙上發表了許多文字，撤消他們以前的批評，並譏他爲假充內行及破壞革命風味者。

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廿七日的消息報上，蘇聯作曲家協會主席稱：「真理報的論文不獨爲對舒斯達科維奇的教訓，且爲對整個藝術方面的。……我們在音樂方面有三個重要事件。它們爲史達林及莫洛托夫同志與靜靜的頓河歌劇作者扎真斯基的談話，和真理報上兩篇論文。我們明瞭此三件事情後，對於蘇聯音樂應走的路綫，即可獲得最明確的指示。」

無產階級音樂家聯合會宣稱：「我們根據史達林同志的信，可以知道在音樂方面的新而偉大的任務。我們要打倒與小資產勢力有關的腐敗自由主義和階級敵人的理論！」這個會主張修正從貝多芬至莫梭格斯基一般大作曲家的標準，它又稱史達林的信應促使每一樂隊都成爲正確的馬列主義的集體鬥士。（此信本身並未提到音樂或別的藝術，而完全爲關於俄國歷史的。）

這樣看來似乎舒斯達科維奇完了。他的作曲家生涯也告了一段落，因爲他已從最高的地位降到湮沒無聞。他如何消磨有餘的歲月，是極可慮的。但因爲史氏酷嗜貝多芬音樂，就有人建議舒氏按伊洛加的情調編成一部交響曲。舒氏寫了他英雄的樂譜，命名爲黃金時代，並奉准當獨裁者演出。人們發現黃金時代爲一部真正實現了伊洛加的預言，以音樂表彰史達林時代的超凡作品，從此舒氏轉了運，一般詆毀他的批評家又得反悔前言，而譽揚他的無上天才。

在電影方面，史達林不獨爲至高無上的贊助者，且爲絕對的直接主子。因爲影片爲宣傳的重要工具，並爲防止俄國人民獲悉資本主義生活的某些可取的事實起見，一切外國影片都得先經中央政治局，事實上即史達林審查通過。我的老友蘇聯電影工業主持人舒米亞茲基曾告訴我，史達林命他將幾部適合蘇聯觀衆的外國影片先行演給主子看。其中有好些他都斥爲在思想上有危險性的。只有一些廸斯列的神話諧片，和像自由萬歲表演農民革命或像金衛多的「我們的麵包」強調資本主義危機的片子才獲得通過。這並非說史達林不喜歡外國電影。相反的，他還是一位好來塢迷，他所愛的角色爲克拉克蓋博，華來士比雷，和保羅茂尼。舒氏告訴我：主子愛看盜匪片子，但會下令不得在俄國觀衆中演出。

雖則蘇聯觀衆歡喜賈波林，而電影專家們也很景仰他，但因主子不嗜喜劇，所以他的片子被禁演了。當亞力山德諾夫排演了第一部蘇聯滑稽片「快樂孩子」時，有些知道此種情形的批評家就詆毀它爲一部有小資產階級偏差，模倣美國作風的片子，遣使亞氏很失望，但舒氏將它在主子前演後，史達林竟識它了。於是外面都傳說史氏不獨喜歡這部片子，並垂青於它的明星演員鄂洛娃。一設批評家也紛紛譽揚。亞氏因此立刻成了俄國最偉大導演之一

。在史達林授意下，他和鄂洛娃獲了紅星勳章及「共和國榮譽藝術家」的尊稱。一九三九年，他們製造了史達林所賞識的第三部影片後，又授了列寧勳章。賈波林也重新走紅，他的片子風行於全國。

一般獻媚者，猶以史達林的文藝獨裁者地位爲未足。他們又尊史氏爲科學天才，及偉大的哲學家 and 著作家。一九三八年五月廿七日，真理報在「史達林——科學的先鋒」標題下有列一段紀載：

「……俄羅斯在過去產生了許多科學天才。諾門諾梭夫，諾巴舍夫斯基，孟得利也夫，貢獻了化學原質的分類。另一負盛名的俄國人巴夫諾夫，在俄國的科學上增了光輝。但最偉大的科學家則爲列甯。列甯不獨在我們時代爲科學開荒，並預備了他英明無比的門徒及繼承者史達林。列甯及史達林均爲科學的旗幟，在整部科學史中，從未有過較之在列甯及史達林指導下所獲致更大的勝利。」

據革命與文化雜誌的一位投稿人稱：「史達林爲『黑格耳最淵博認識者及批評者』之一，並爲對於現代哲學問題最有權威專家」。在「文化陣綫」雜誌中，人們可以讀到：「只有史達林才能將亞里士多德的預斷全部貫通融會成功。」隨後，他又稱：「蘇格拉底及史達林爲智慧的極峰」。某教授在共產學院的大會上宣言：「康德主義在現代科學中的地位，只有根據史達林最近一封書信，才可以確實地了解。」（此即關於蘇聯音樂的信）他又稱：「史達林演講的每一段都爲藝術工作最豐富的題材。」

文學週刊竟捧史達林爲文體家。「凡文字學者及批評家皆得學習史達林的文體。」蘇聯主席加里甯於演說結論中稱：「如你們問什麼人的俄國文字最好，我的答案爲史達林。」名詩人碧尼在某大會中稱：「學會像史達林那樣寫作！」消息報主筆曾說：「在這新世紀的大門，有兩位思想界的巨人——列甯與史達林。」他結論說：「現在人們如不認識史達林，他們能對任何問題寫作嗎？絕不可能。如無史達林，人們必不能了解或寫作有意義的東西。」一位女文學家認史達林乃哥德的繼承者。

俄國知識份子竟墮落至如此程度了！任何人以爲史達林相信這些諛詞而不疑，那是錯誤的。他不過認爲此種態度對於他的權勢是有益的。同時，他也喜歡侮辱一班知識份子，冷看他們寫各種心理上及精神上自尋毀滅的狂妄聲明，猶如他曾毀滅莫斯科公審案中一般招供的人們的肉體一樣。他用同一樣報仇的快樂來侮辱這些人的精神。他也因此而發洩了對於一般天才較優於他的人們的怨毒。美國同道者知識份子們，對於俄國同事所受的命運，亟應深自省悟。

列甯於斥責史達林對社會主義黨人的仇恨時，曾言：「一般而論，仇恨在政治中，可能爲最壞的手段。」在過

去廿年的俄國政治的個人因素中，我認爲史氏對於才具較優於他的一切人們的仇忌，爲最有害的因素。它已經並正使俄國獲到悲慘命運。

四〇、槍彈結束了社會主者的迷夢

我在這個猜疑與詛譖國家的最後光陰，是極感苦痛的。除了有公事接洽外，我避免了一切朋友和熟人。

我會兩度訪晤外交部副委員長克萊斯丁斯基及塔斯社主任陶列斯基。我第一次遇到他們來時，他們仍很正常，很忙，但有說有笑。三星期後，他們變得極悲抑緊張，心事很重，聲調很低，似乎完全不能領會我的談話。他們知道情形已經絕望了。比亞德可夫的審判案，雖未公佈，但已訂於數日內舉行。每天都有好幾百名高級官員被捕。數日後，陶列斯基也被捕了。據謠傳稱，他已在獄中自殺。陶氏爲一很老實的黨員，並且從未捲入政治漩渦。

一月杪，我於離莫斯科的當天，訪問了克萊斯丁斯基。此時距比亞德可夫審判尚有兩天。他顯得很疲乏，無心與我談關於我在希臘的任務。他向我表示歉意並道別。數日後，中央委員會即明令免了他外交部副委員長職務。

克氏最後的公開出現，係在外交部黨大會一次演講中。他說得很慢，而且感情很衝動。他說他雖會長時間爲黨忠心服務，但爲了會加入反對派，現在最好退休。他又說主持外交的人們，應當完全爲黨所信任者，並爲毫無瑕疵的布什維克。他深悔九年前不該加入了反對史達林的集團。他極贊同中委會調他到司法部任職的決定，並且結論說：一切忠實黨員，都應當服從黨的分配，爲國服務。

克氏隨即向他的同僚致謝，並表示永誌不忘，而要求他們照常爲黨盡忠。他當然知道調職不過是入獄的前奏而已，因爲史達林的狡計是先將要害的人調開，以免有人爲他說情，然後才加以打擊。

我和克氏的談話，是關於使希臘和其他巴爾幹國家如何逐漸脫離德國經濟控制的計劃。德國的沙赫特，此時進行了「劃賬制度」。此一制度是基於德國缺乏外匯，無從以黃金從希臘輸入物資。德國此時利用某些希臘輸出品（如哥林斯的葡萄乾）市場很缺乏，故由德國國家銀行與希臘國家銀行締結合同，使德國進口商從希臘獲得若干希臘「貨幣」以償付希臘貨主。同時，德國以等量馬克存入了柏林的希臘銀行。但此項馬克，實際上是凍結了專供購買德國工業品之用的。

德國引誘了希臘加入此項協定後，即開始大量從希臘輸入物資。這些物資中有些東西如烟草之類，是原來以現

金出售於英美市場的。因為德國係用無價值的馬克付款，故它能出較優價格收購，使英美商人亦被排擠。德國輸入大批貨物後，即以其中一部，如烟草之類仍出售於英國，俾增加黃金來源。

希臘當局最初並未發現此種辦法的危險。第一期交易結束後，他們才發現德國已積欠數百萬登記馬克，除了購入德國貨物外，無法取償。他們設法阻止此種無價值信用的增長，但因希臘製造家貪圖小利，結果貿易的平衡，日對希臘不利。

合同所規定的外匯兌換率，對希臘極不公平。同時，因在柏林有鉅額凍結款項，故希臘人們只得盡量從德國輸入機器。德人知道希臘上了當，就將機器的售價分別提高。因此，德國對希臘經濟，獲得了控制權。最後，希臘向英法呼籲，但因在和平時代，他們亦愛莫能助。

我相信德國在巴爾幹國家的經濟滲入，對蘇聯的危險性是和對西方民主國家一樣的。我們應當用一切方法來對抗此種滲入。我向克萊斯丁斯基所條呈的理論是如此的；蘇聯的對外貿易為國家壟斷制度。別的國家所做不到的，我們只須對外貿易部下一度命令即可辦好。它是我們在國外的唯一購買人，而蘇聯廣大的市場，亦足以吸收希臘全部對德國的輸出。我們可以用希臘所亟須的現款或小麥支付。德國既無現款亦無小麥，我們只須政治局決定，就可以打擊整個德國計劃，並大大地增強俄國在巴爾幹的勢力。

我在雅典時，曾擬好了詳細計劃，並附以實行辦法。在克氏與我第一次會談中，他對於我的報告似頗感興趣，並應允向上級提出。我從外交部德國及巴爾幹事務司施特恩司長處，亦獲得同樣的贊助。數日後，我訪問中委會外務處時，它的主管亦囑我將報告檢送一份。他已聽到此項計劃，認為很重要，極願促其實現。我觀察當時情形頗為樂觀，以為我回希臘時，必可將政治局的決策帶去，俾付諸實行。但我尚未知此時（一九三七年一月）史達林正進行與希特勒訂盟的計劃。

我最後一次與克氏會晤時，他對於報告，似感忸怩。在中委會的外務處，人們亦一笑置之。

「好罷，巴明。你回雅典去。一切我們留意去辦。」

關於我的報告，就從此沒有下文。克萊斯丁斯基及施特恩不久即於整肅中失蹤了。我猜這個計劃，也許是太浪費了。後來，直到我聽了莫斯科與柏林間的神秘勾結，才覺悟我的計劃早已被置之高閣了。他們不願因此小事而去刺激希特勒。

我離莫斯科時，心中交織着憂愁與輕快。有時如在夢中，你覺得週圍的環境似很親切，但有時則它們似乎奇異

而不真切，使你感到窒息。那就是我的心情。這是好像從一場慘酷的夢中醒覺起來。

我於赴雅典途中，曾遇到兩位後來都被擊肅的朋友。其一爲駐立陶宛公使波多斯基。他與我同車赴庫納斯。波氏於數月後已被槍決。在布達佩斯時，我和巴克午丁大使盤桓了一天。巴氏爲我的老友，酷嗜收藏珍貴版本，並藏有匈牙利名酒甚豐。我們分別不久後，他就無故被召返國而失蹤。

我到雅典後，發現高培斯基的情緒極消沉。辛諾維夫的受刑，使他受了極大刺激。他此時正盼望我來接替，俾他即回莫斯科。

我去看梅麗時，我的內心衝突極利害。我看了莫斯科的一切後，知道帶她上那裏去是很危險的。如果格別烏的瘋漢決心要拿她作外國人株連一塊，那是無論她如何竭忠工作都沒有益處。我的有權勢的朋友，也會愛莫能助。我是否要向她警告，並且決絕了她呢？我們每次會晤時，此一痛苦問題就橫亘在心中。我不敢向她提起，但心裏很難受。我的愛情也許不能給她幸福，反而招致她的麻煩。我每於歡會後歸來，就感到淒涼絕望。假如前途對她如此危險，我是否應該保持我的愛情呢？

最後我對她陳情了。我說，外國人在莫斯科受到極度歧視，雖然很想帶她去，但對她的安全很表憂慮。她對此並無印像，但却爲另一理由很担心事。

她問我：「聽說蘇聯官員如果與外人結婚是會失去政府的信任的，這是真嗎？有人告訴我莫斯科很反對這種事情，這種婚姻往往會毀滅一個人的前途的。若如此，我不願意你這樣做。」

我告訴她說這也許不確。但無論如何，我將職業看得很輕的。

「我們可以幹任何工作。」我說：「很多事情都急需着人哩！」

梅麗堅持她不願妨害我的職業前途。

我回答說，我唯一關切的，就是她的前途。

最後，我們決定了一個簡單解決辦法——不去擔憂。無論命運如何，我們都禍福相共。

「只要你愛我，什麼我也不顧了。」她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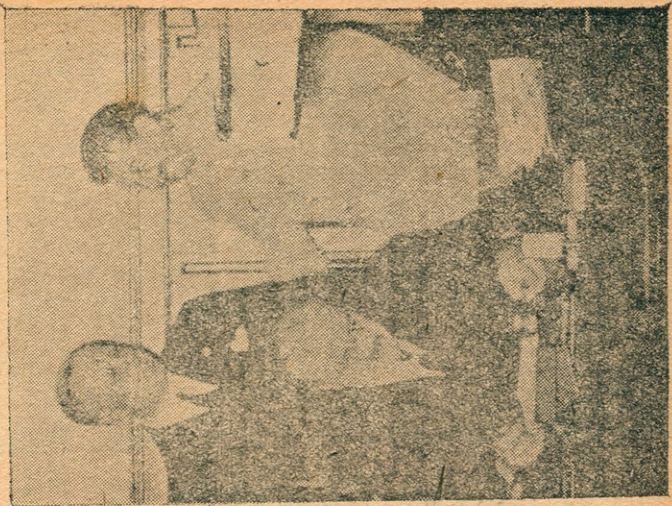
但我不能誠實地說，我已做到了我一面的責任。



■ 國美於攝年一四九一於婦夫者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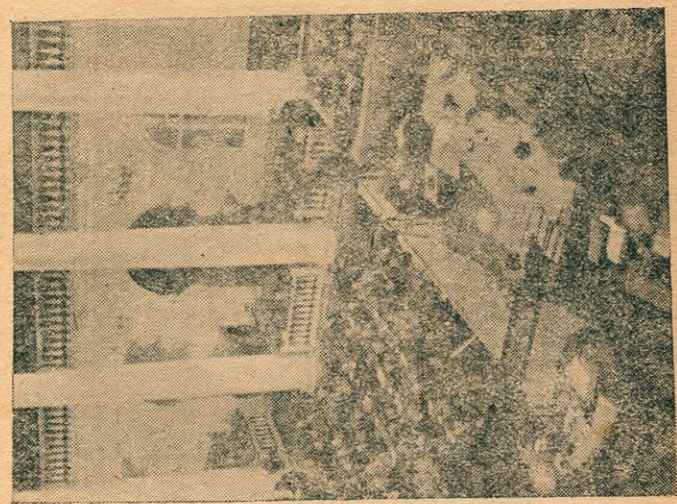


■ 兵士任軍陸美在年三四九一於者作



一九三九年八月，史達林，莫洛托夫，李賓特羅甫等簽

訂德蘇不侵協定。



莫斯科工團大廈內進行審訊時情形。

我還不會將代辦的職務接收好，就聽到比亞德可夫審判案的報告。我們又淪入像去年八月間的辛諾維夫審判案時一樣的憂鬱。現在，又有七位最英明的領袖要受到屈辱了。但此次史達林不會再使人們流血罷。自第一次五年計劃後，比氏即爲史的忠實同僚。他爲列甯的遺囑中對黨所推薦的兩人之一——也是唯一毫無保留地被推薦的人物。全俄國都知道他對於財政及工業化的偉大貢獻。還有牟拉諾夫哩！他是政治局委員及重工業人民委員長阿陽尼基茲的好友及助手。阿氏決不忍讓他槍斃的。賽利布里亞可夫和波加斯拉夫斯基的功績也是舉世知名的。德魯布尼斯爲內戰英雄，曾一度被白軍槍決，但奇蹟地獲救。當然這些人也不會死的！

但我們正式獲到了可怖的消息——除拉德克，蘇科尼可夫，及一位不知名的被告外，全被槍決。他們三人爲何倖免於難？這是爲誘致以後審判中的招供嗎？

在審判進行中，拉德克曾提到杜嘉契益夫斯基。拉所說的也許無妨害，但只要聽到朋友的姓名在這些小心預備好的供詞中發現，也是會使人戰慄的。杜氏的同僚及駐倫敦武官蒲杜亞將軍，亦供出他們會與托洛斯基派同謀的罪狀，這是說蒲氏完了。他的妻子於歸途中在華沙聆到噩耗。此事亦爲杜氏不祥的預兆。同時，消息傳來，據稱杜氏派赴英國參加喬治六世加冕的命令，亦已被取消，以聲望較低的阿爾羅夫海軍上將代替。這是對他一個很壞的警告。全體被告都供認了難於置信的罪狀。世人們都惶惑地要問：「既未犯罪，何必認呢？」我想答案很簡單。這些人的全部生命，都是與布什維克黨不能分割的。他們對於民主或社會改良，毫無信仰，認爲布什維克主義爲唯一促成社會進步的方法。一連串的徼倖事實，使布什維克革命能在俄國獲到成功。現在他們已貢獻了整個生命，但眼見革命未能完成他們的希望。一個粗劣的獨裁和較封建反動更壞的反動派，控制了黨及國家。他們還有什麼可活的哩！某些西方評論家認爲他們這些老布什維克的招供，是爲了對黨的錯誤表示負責。此乃不可能的，因爲在他們心目中，黨早已不在存了。他們親見史達林毀滅了黨。

這些可憐的人們，不斷地受格別烏的虐待，並親見到許多親友被殘殺。他們已遇到最後階段的挫折。他們隨着黨的崩潰，已失去了一切的信息。他們被迫得想盡各種方法來保全生命，並且爲了要終止迫害，不惜買死。我想這就是他們供認的解釋。

我們須知在每一位招供的人外，至少有一百位未招供的黨的領袖。他們經了格別烏悠悠的殘酷虐待後，並飽嘗了鐵窗風味。在這些人們間，試問有什麼新希望維持了他們最後的光陰呢？

我們在外面一些人，只知道老布什維克黨已趨於毀滅了。因爲我們對於黨和社會主義的迷夢業已幻滅，唯一希

望就是想仍能夠爲國家服務。

我繼續工作着，並計劃高培斯基返任後，就請莫斯科召我回國。但不久莫斯科來電稱：高氏于施行手術後，驟死于克姆林醫院中。此一不幸消息，使我極爲震悼。我也許還要等好幾個月，新公使才能赴任。

同時，梅麗亦開始準備赴莫斯科，並將她所經手的建築業務漸次結束。

「我已不再接受新營造合同了。」她某晚向我說：「我不願于赴俄時留下未了任務。我盼望能及時完成孤兒院的工程，這是我手上唯一進行的工作。」

「你瞧！現在你要爲不聽家庭警告付出代價了。」我微笑道：「與俄國人結婚，真是一件很大的損失。」

「我只盼孤兒院完成前不會離開。」她說：「我不擬令米拉斯老將軍失望，並且在職業上留下壞名譽。」

雖則孤兒院的捐贈人米拉斯將軍不信任女建築師，但梅麗在圖樣競賽中獲了勝利，并取得監造全部工程的合同。因爲米的不信任，梅麗便特別將她的全部精力集中于此一工作，進行極爲順利。

但我將惡運帶給了梅麗。孤兒院快完工時，她當選出席巴黎建築師大會，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將工程交給她的助手後，即動身前往，她原想三四星期內回雅典。

「我會等候你，」我告訴他：「不要被巴黎的誘惑迷住了。不獨我，連米拉斯將軍也等着哩！」

老將軍空等了一陣。他再未遇見她。無疑地，他覺得他對女人的意見是對的。

「我畢竟對了，」他也許說過：「你能對女人希望什麼？她們總視戀愛高于事業的。」

一月後，當梅麗正擬返雅典時，我到了巴黎去看她——我已經是一個無祖國的流亡者，被人們追捕而深深感到失望。

後記

一九三六——三八年莫斯科大審判案以後的若干年中，我對於俄國革命的整個問題，曾寄以深思熟慮。這許多年的努力與犧牲，究竟產了什麼結果呢？

列甯的社會主義理想，係建立于兩大假定上的。在集體經濟制度下，生產將高于資本主義國家。剝削制度廢除後，以工資爲生的工人，可以獲得提高了的生產的利潤。但蘇聯經濟制度及史達林的極權政權，則在目前已否定了此兩種假定。

在兩次五年計劃中，我曾積極地參加了蘇聯的工商業，深知俄國經濟生活中的專制及官僚機構，已打消我們從集體經濟中所希望獲得的利益。我們原可由普通的私人企業，獲致更大的成績，而毋須政府官吏及格別烏憲兵用各種殘忍的方法，迫害工人，企業主管，及工程師的。此種在「設計」美名下所用的額外精力，徒然釀成新消耗，破壞，及勞而無功的實驗，使國家損失了億萬盧布。

至于社會主義的另一基本假定——所謂在集體經濟中工人不受剝削，則更與事實不符。俄國工人勞力所獲的報酬遠低于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甚至低于沙皇時代的工人。俄國工人收入低的原因，不獨因爲資本家的一份利潤被在國家享有特權的新官僚階級奪去，而更大的一部份則消耗于官僚管理的浪費及低能中。

世人對於俄國工人所過的奴役生活，鮮有知其底蘊者。我們必須于近年中，親自在俄國居留過才能窺其真貌。托洛斯基離開蘇聯時，此種奴役化尚在初期，因此他對於此種情形，亦無深切認識。他在「革命被出賣了」一書中會稱：「土地及工業生產工具的國有爲蘇維埃社會機構之基礎。經由無產階級革命所建立的此種關係，蘇聯之爲一無產階級國家的性質始基本本地獲得確定。」

雖則他對史達林政權備事攻擊，但迄至被暗殺時，在托氏心目中，俄國仍爲一個「工人國家」。其所以如此，厥爲國家享有一切，但托氏如一直在俄國居住，他就會親見此種享有之如何的微小可憐。現在主要問題是：此種社會性生產究有若干成份通過工資及國家的社會服務而流回工人手中呢？經過廿五年來社會實驗的努力，俄國工人所得或可與印度的巴利亞（最下級）人及埃及的費那欣相比擬。但他們的生活情形，則不如後者遠甚。因爲印度埃及工人的工資雖極可憐，但他們的生活所需付出的代價亦低。史達林政權的物價及勞工政策，則不獨將工資抑至極低

水準，並且將工人家庭所消費的物價，維持得異常高。因此，工人國家的巴利亞們受到了雙重剝削。

當革命的初期，工人獲得未之前聞的特權，如舒服的房屋，免稅，有工資的休假，免費休憩所，教育，戲票，及醫藥，並購買廉價食物等。當提高社會主義生產的希望成了無能官僚主義惡夢及「工人國家」成了極權農奴時，這些特權都一一被撤銷了。俄國工人不獨不能享受列寧所賜予的新生活，並且經過四分之一世紀後，他們幾乎無法獲得衣食。除了少數受惠者外，居屋的情形，亦毫無改善。五月工作制於一九三九年廢止後，工時雖增，而工資則未比例的提高。戰爭使一般情形更惡化。但即在第二次大戰開始前，俄國工人的實際工資已低於沙皇朝代的最低水準。

我未能如一般人們將此種事實諱莫如深。據我親切聞見，則機器國有政策早已失敗，而工人階級，不獨未獲自由，且因此種失敗而增加了苦痛。

此兩件事實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因有機器愈失敗則工人愈痛苦，而工人愈痛苦，則機器的失敗愈速。簡言之，除官僚低能外，疲乏為工廠生產低落的主要原因。此種原因，係顯而易見的，工人食不飽，居不安，工作過長，持續的半飢餓狀態削弱了體質。

最近曾隨莊士敦遊歷俄國的懷特，為一極精明的美國觀察家。他的經驗証實了我的印象中的這些事實。他說：「這裏的生活水準，較之我們受戰時物價局救濟的人們尤低。」

「雖則工作如此勤勞，他們生產極少，而生活水準則較之我們受失業救濟的人們尤低。在經濟不景的幾年中，我們有五百萬人民的生活會降至戰時物價局的水準，但在蘇聯則廿五年來約有一億八千萬人民過着更低生活。」

懷特先生在蘭辛格會對一位朋友說：他發現蘇聯人和堪賽斯省監獄的囚徒間有一顯著的差別。「這兩處的食和衣都差不多，也許蘭辛格的畧勝一籌。但假如我的堪賽斯朋友認為監獄管理不良，表示希望換一批獄吏們，他縱被奸細聽見報告上去，也不會有槍斃危險的。」

他又稱：

「在蘇聯，與國家進行競爭是被禁止的，因此低能獲得了保護。人們無從找到較好的東西就只好忍受。……在一切事物之上，官僚主義的愚笨魔掌，僅產生了悲慘的庸俗。」

一些贊成蘇聯的人們當然會認的此種情形，乃長期戰爭的結果，並指摘懷特先生對美國資本主義的偏心。因此，我可引述另一位美國觀察家英格素先生的意見。英氏彼時為紐約午報主筆，素同情蘇聯政權，他於一九四一年夏

訪問俄國時，工人的生活尚未受到戰爭的影響。他的報導可摘述如下：

「任何美國貧民救濟院的洗碗者，都不會願意交換一個普通蘇聯工人的生活。這是就衣食住方面，以及他所餘下的錢所能購買的東西而言。」

英氏經過實地調查後獲悉蘇聯工人每週工資的購買力，約合美金二元。實際上則因為各種特權，如房租優待，休假，子女教育津貼等，他的每週收入約達十元，但此種特權早已逐漸無聲地撤銷了。

懷特的報告曾述及一些蘇聯顯要們的生活，那是與一般民衆的生活，可作強烈比照的，茲轉述如下：

「在設了約十五個座位的大餐桌上，陳列着潔白的餐巾。每一餐巾前置有高的白酒杯，較短腳的紅酒杯，圓的香檳酒杯，及矮的伏爾加酒杯。餐桌中央陳列了約有廿小碟子各種炫目的俄國小吃食，如薰鮭魚，精緻的伏爾加鱈魚，火腿，冷燒雞，魚子，及無數種的香腸。」

「糾糾的着禮服的老僕歐送來了一大盤放在碎水塊上的魚子醬，我想那在美國是要值好幾塊錢的。和它一道送來的，爲麵點及一大片牛油。」

這第一道魚子醬，牛油，及麵點是在進薰鱈魚及香腸以前，和白酒一道吃的。我們發現這是每飯皆有的，連早餐也不例外。

「我們隨後才嘗到普通的一道牛油，魚子醬，及麵點，同時還吃些凍凝了的肉類。然後正菜開始，一道道，一杯杯。」

「湯和雪釀酒。鱈魚和克里米亞葡萄酒。此後則爲燒山雞和高加索白葡萄酒。」

「等到烤羊腿出來後，才輪到俄國大宴會中最有名的燒烤，爲四隻冷的剝光皮的乳豬，放在四隻盤子上。食時我們飲烏克蘭的紫葡萄。」

英格素先生認爲在俄國因爲沒有百萬富翁，縱然官僚們如此享受，一般工人們也能忍受喝白菜湯爲淡泊生活。

誠然，有些俄國人被「社會享有」制度的偽裝所蒙蔽了。在俄國，一般過富翁生活的人們，表面上並不稱爲富翁，而爲「政府高級官員」而已。這也許是聊可自慰的一項事實罷。一班同路人往往稱道俄國流行的偽裝樸素，和統治階級的儉約作風。他們殊不知此乃完全騙人的偽善。當然，整個俄國生活水準，如是低落，就是一般過奢侈生活人們亦不能獲得西方世界的一切享受。但他們的生活與俄國工人生活距離之大，尙較美國情形顯著。俄國面臨飢餓的工人對於此種鴻溝，是不如一般外國訪問者之易于忘懷的。

我現在可將在我戰前所親親的一位特權階級的生活，詳述如下：

他在莫斯科的公館，共有八間佈置華麗的房子，並用了兩名僕歐。他渡休假時，有中央委員會的某號別墅供他私用。這裏有兩至四名僕役，都是由國家供給的。他有私人電影室，客房，及各種娛樂設備。他又有一種「領物單」，隨時可以憑它要酒菜，招待家人或來賓。這一切，都是由政府開支。政府特別爲他預備一兩部汽車。他如有所需，無論如何值錢，隨時可以一個電話就辦到。他的兒子也像百萬富翁兒子一樣，獲得各種享受，他對於公家供給的僕歐，可以願指氣使。他可以從外國買玩具。如生病時，有名醫診治。他知道他如需要什麼，只要父親一個電話就行了。這位大官如想到高加索或克里米亞作一次健康旅行，他到處都可享受同樣的奢侈，並且他和家眷可以趁臥車，專車，一切均由政府開銷。

經過四年戰爭後，假如在俄國發生了什麼變化，這只是勞苦大眾的生活日苦，而非上述的享受有任何減少的蹟象。戰爭僅擴大了特權官僚階級與廣泛人民間的鴻溝。

在此一假想的無階級社會中，發生了一種新的階級統治。人們如認爲此種統治不及在民主國家中的粗暴及激烈，那是很危險的自欺看法。它是更粗暴激烈的，並且它所標榜的無微不至的「工人國家」偽善，使我們感覺更可厭惡。

此一工人國家的工人，不獨無足夠的衣食來維持他的生命力，而且無從改革他的遭遇。以私人身份論，他不敢抗爭。以集體工會論，他不能罷工。他的工會不過爲公司的工會，而公司的主人則爲國家。因此國家爲僱主，打擊罷工的代理人，和警察的結晶體。同時，工會僅爲警察機器的一部門，絕對受制于國家。只須一揮手之勞，一道法令，或某些操縱物價的巧妙辦法，工人的實際工資即可以任意減低，而工作時間則無償地增長。但工人們却無權抵抗。他們無報紙，無講壇，甚至無一隻肥皂箱，可以用來請主子實現他的諾言。

對於像里肯貝克一樣的偶然觀光者，此種情形也許是值得艷美的。但對於一些重視社會主義者及對計劃社會抱有甚高期望的人們，我只能作如是結論：「社會主義者的實驗，已悲慘地失敗了。」

就各方面言，蘇聯的官僚已成爲一種剝削階級。它雖名義上未享有產業及生產工具，它實際上却控制了獲有此種主權的國家。而國家則雖然在名會議上享有工業，並爲社會主義的，但實際上，它僅僅成了一個新而更有效率的降低及掠奪勞苦大眾的制度的工具。

史達林至少曾經教我們說：「廢除生產資料中的私有財產制度，並不能廢除人對人的剝削。」

他的政府證明了：一個自由與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是不能由「無產階級專政」而獲得的。我並認為這樣的社會，非爲任何牽涉國家壟斷享有國民經濟的計劃所能獲致的。俄國的失敗，並非僅僅因爲一黨專政而產生了特權階級政權。事實上，人類天性與此種經濟的正當運用，其中有許多不可避免的衝突。我可以指出無數事實來證明此點，並說明俄國的經驗，不過爲全世界的一般教訓，而非特別奇怪的。廣泛人民生活的真正改善，只可於一個有私人企業及競爭的民主制度下完畢之。這些企業，務須在合理範圍內受制於一個進步的社會組織。它不應置於俄國的國有制度下或德國的政府壟斷制度下。

基於數次五年計劃的經驗，若干有現實眼光的蘇聯領袖漸感到用專政手段完成社會主義之不可能，而傾向于政治民主。據我判斷，史達林本人亦認識了此種不可能的。雖他的社會主義見解與我們截然不同，但他曾誠意爲他的理想致力。後來史氏漸漸失去了信念。自基羅夫被刺後，他已斷然放棄完成社會主義的幻想。

史達林對列甯的見解，應該是很透澈的。唯有蘇聯的生產高于資本主義國家，以及俄國工人獲得較其他國家工人更高生活水準，工農業國有方能存在理由並獲得成功。五年計劃的狂熱，努力及失敗證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若無私人競爭及私人牟利的動機，生產絕不能提高至資本主義國家的水準。這使史達林要作一重要抉擇：放寬獨裁俾蘇聯國家能循西方民主路線發展呢，抑或完全拋棄一切自由平等及社會主義理想而效法納粹及法西斯呢？

史氏曾於一個短時期內，支持了老布什維克們所主張的民主趨向，並玩了一套民主憲法。但當基羅夫聲譽日隆後，他就感到民主政治對他政權的危險。因此，他仿倣了希特勒的流血整肅，決心要做反民主的獨裁者。自此後，史氏即蓄意停止改善工人生活或減除剝削程度。他爲了維護少數特權政治首腦人物的利益，不惜組織一個以對於一般平民進行殘酷剝削爲基礎的社會。

以上所述，並不意味史氏對於別的國家進行攫取政權的所謂「共產黨人」已撤去支持。他如有意如此，只須授意就够了。但我認爲史氏正利用此種策畧來削弱這些國家的力量而增高他個人及俄國的權勢。他正在將極權階級制度擴展到他所能掌握的國家。我們絕不能相信他在俄國或任何地方「培植民主」或「回復到資本主義」。他的本能慾求爲權勢，因此他要破壞民主國家來保衛俄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正如他要毀滅國內一般傾心于民主的人們，以維持個人權力一樣。

這就是一九三六——三八年大整肅的原因及意義。它並非對某一陰謀的清算，某些敵對黨派的毀滅，或反對人們的鎮壓。它要系統地消除一切會爲社會主義致力的人們，和反對故意將國家淪爲極權奴役制度的人們。

在俄國，有整個一世的革命領袖們，或服務政府，或爲軍官，或致力黨務，過着清苦生活，專心篤志爲人類謀幸福。他們不惜作各種奮鬥，俾能廢止剝削，而建立一個較公平自由社會。若干人們發現此路不通，而企圖回到民主政策。而另一部份則執迷不悟。他們現在都死了。史達林槍斃了他們，他們努力所建造的政權，已名存實亡。但史達林需要新的擁護者。如一般獨裁者們，他向軍隊中找支持他的人。他不惜犧牲一般民衆的利益，整編並裝備了一支紅軍，使它成爲特權階級。並且爲掌握此一工具起見，他須要一批毫無革命背景及任何危險民主觀念，而能矢忠爲彼個人服務的新士官階級。這說明了爲什麼他對於紅軍中的整肅較之在文官中更嚴厲。

史氏毀滅了紅軍的心腦——它的參謀部後，已無力再贏得反納粹戰爭的勝利。他于是只得與希特勒締同盟。史氏滿以爲與希特勒德國合作即可保持他在國內的暴君地位。他曾對霍浦金斯說：「我相信那人」。但史氏應該明瞭此種匪盜式同盟的邏輯。希特勒是不顧信義的。他深知蘇聯軍隊缺乏領導，故敢于發動攻擊。因此，俄國人民又得爲他們的貪權和短視的暴君付出相當慘痛的流血代價。

我們目前對於紅軍戰勝共同敵人的偉績極感興奮，而忘了俄國之如何瀕于失敗，及人民的慘烈犧牲。我們也許應排除情感，而專就歷史觀察。大戰的第壹年終，敵人已攻進了莫斯科，列甯格勒，及羅斯託夫的大門。即在革命後的入侵及內戰中，外國軍隊迄未如此深入過俄國的腹心。在起初半年中，德軍所佔領的俄國疆土三倍于他們本國面積。它的人口多于全部德國人口。它包含了五年計劃中艱苦締造的全蘇聯三分之二的工業。德蘇戰爭的第二年中，德軍長驅直入伏爾加區及高加索山區。希特勒的阿爾卑斯聯隊，在愛布魯茲山嶺，豎起了納粹旗。在第三年中，一些從失敗學校中訓練的新指揮官們才出現，將德軍驅逐。但流血與痛苦仍未解除，而五年計劃建立的工業化區域，完全被破毀。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腐敗和不得民心的沙皇政府下，俄國軍隊不獨裝備極劣，且乏外援，但仍能將興登堡及麥根森的近代化軍隊的強大攻勢，阻止于布里培沼澤區。在三年的惡戰中，沙皇軍隊每師尙分不到六十至一百顆炮彈，但德軍迄未攻進入俄羅斯。他們也從未越過波蘭，拉脫維亞，及立陶宛。而希特勒的新軍則于一一年半中，蹂躪了半個歐洲俄羅斯，并于三個月後，進入伏爾加。即瑞典的查爾士及拿破崙亦未如此深入。前者自波大華，而後者則自莫斯科被逐退。毋庸諱言，大規模整肅運動，對國家和軍隊的影響爲招致此一初期慘敗的主要原因。雖然希特勒的軍隊僅有七年的歷史，但它保留了老軍官幹部。而經過廿年訓練專爲抵禦西方侵略的紅軍，則它的指揮人員新被史達林全部整肅了。

據納粹估計，俄國軍隊與平民的損失達三千萬人。而俄國人則僅承認爲八百萬。如將希特勒的估計減半，而將俄國估計增加一倍，則此項損失約一千五百萬人。在此數中至少有六百萬爲軍人，那就是說，一半的紅軍被消滅了，和一半以上的設備被毀壞了。

勝利雖甚光榮，但初年的損失則極慘重，此種損失，都由于戰事開始時紅軍缺乏戰術領導及組織之故。

在其他方面，則紅軍與德軍勢均力敵。史達林較希特勒具有某些自然的優勢。假定他自一九二八年的五年計劃開始，史氏已有十二年建軍的時間。當一九三五年希特勒尚無軍隊時，史氏已練好了世界上最強大的陸軍。他並將俄國軍火生產提高至德國水準。他有兩倍于德國的土地及十倍于德國的資源，並且毫無原料的缺乏。他曾竭全力于建軍並很早就培養了戰爭心理。

再者，史氏對經濟具有絕對的控制，並無「容克」人及資本家來搗亂。他可以爲建軍而使人民捱餓，那是希特勒辦不到的。在俄國並未會以「大砲代替牛油」，而係以「大砲代替麵包」。

史達林既有這些利益，他的軍隊就應當強于希特勒數倍。史氏的飛機及軍火約與德國相等，而坦克及大砲數量則過之。他的軍隊人數約兩倍于希特勒的。但在第一年中，俄國仍未能進行有效的近代化戰爭。此種戰爭，須要精細的戰畧，和補給與後方交通的精密組織。史達林大元帥和他三位服從但庸碌的元帥伏洛希羅夫，布丹尼及提摩盛科，具有如此偉大配備，竟不能進行一次大規模反攻。他既無戰畧亦無計劃，僅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來填塞德國人不斷突破的缺口。在戰爭發動時，他們原可派若干快速部隊通過波蘭，匈牙利及加柏辛烏克蘭直入德國及捷克。如俄國高級指揮部有精明獨立的勇敢戰畧計劃，他們于德人進入明斯克前，早已抵達了那些地方哩！

如杜嘉契夫司基，布魯克爾，雅基爾或歐波利維奇中，任何英明將領未被史氏殺害，我可以料想到他們的戰畧，必不致如此失策。

這些將領及數以千計士官之被屠殺，厥爲此次慘敗之最基本及明顯的原因。如史氏未將這些「第五縱隊」消滅，則戰爭可能在威斯圖拉及尼孟河上進行，而非在伏爾加及里華。三年的和平，是不可能使一個失去領導的軍隊長成新頭腦的。但有些人們却昧于此種簡單的生理事實，而故意將史氏譽爲世界英雄。前美國駐蘇大使戴維士竟認爲紅軍領袖們的被殺爲一有益的事件。

關於整肅中失蹤的人們，可約畧估計如下：

三個元帥（全國共五名）；

十一名軍事委員長；
八名組織軍事法庭並據稱曾宣判杜嘉契益夫司基死刑的將軍中之六名；及其他七位高級指揮部將軍；
八十位紅軍最高軍事委員會委員中之七十五人（全係海陸軍將級軍官），包括全體軍區司令，空軍總司令，艦隊總司令，及除一人外的全體分艦隊司令；
百分之九十的將官；
百分之八十的校官；
約三萬較低級軍官。

根據蘇瓦林，克利維茲基，及西利蓋（曾被禁于俄國的前南斯拉夫共產黨領袖）等的估計，在兩年中，共有一百萬平民被囚，及卅萬人被處決。被逐到集中營或作強迫勞役的，共一千萬人。據波蘭總理薛可斯基將軍稱：他派到俄國徵募抗德軍隊的官員，曾發現一百五十萬波蘭平民被繫于集中營。

目前在美國很少人們能認識此種屠殺忠良公民的破壞後果。英格素曾指出俄國的司法程序，爲甯可殺十個無辜的人，俾獲得一個有罪者。這不是有罪與否，或殺幾個人而已，而爲成千累萬的有系統的大屠殺。一般被害者皆爲精明，睿智，和有才幹的人們。史達林毀滅了所有對他表示不滿的人，尤其是一般想追隨基羅夫的民主趨向而不願俄國走向史達林極權專制的份子。

史氏以權力與毅力來看整個問題。他有過人的權力和毅力。但在此種個人特質之現象下，俄國的經濟鬥爭是無法完成的。這是基于他所代表的政權，乃完全用官僚及警察統治而建立之故。

史氏最高的天才爲殘酷。他將殘酷用爲一種制度來進行一切工作。他單槍匹馬地用它制服了無數政敵並控御了整個俄國人民，使自己獲到最高的權位，成爲總理及獨裁者。它也使史氏成功歐洲的霸主。此種「成功」，對於歐洲文化有什麼意義呢？

我的全書，就是此問題的答案。在今天的報紙上，登載了一件令人尋味的例子。一般人認爲保衛列甯格勒爲軍事上的成功。但我們如宣佈列甯格勒爲不設防城市，也許是不致影響戰爭的結局的。當一九四二年美國宣佈馬尼拉爲不設防城市時，蘇聯報紙曾譏笑美國人不明作戰方法。此乃整個作戰方法中，蘇聯與美國不同之處。美國人寶貴生命，而不惜物資；而史達林則對於生命毫不顧惜。紐約前鋒論壇報根據親蘇方面消息，證實列甯格勒被包圍兩年中，曾有一百五十萬居民（大部爲婦孺）死于飢饉。此數百萬生命爲贏得戰爭必要的代價嗎？此中有多少人不起

于殘酷的作戰方法而爲漠視人類痛苦及不良組織所犧牲呢？當然，在勝利的謳歌中，這些都爲無關宏旨的「小節」。但歷史將如此判斷嗎？

我對史達林政權的嚴厲批評，乃完全基于我對俄國人民——我們英勇的盟友的同情與敬愛而發的。當然，從一般「自由主義者」看來，要譽揚此一暴虐政權，是比較容易的事。如某一著名的美國自由派人士稱「俄國人多死幾個，美國兵的犧牲就可以少些。」但我以爲在長時間，則此種新慕尼黑政策，必將招致相反的結果。

俄國人民的悲慘境地，使他們的勇敢與堅毅顯得愈光榮。當第一次大戰中，在專制沙皇下，無數的士兵，毫無配備，徒手到陣地將戰死同志們手中的槍拿來殺敵。他們不獨英雄，而且習慣了英雄主義。他們的英勇，是任何文字所不能過份譽揚的。

但俄國人民的英雄主義，則絕非史達林政權的功績。史達林政權爲澈底極權化的。人們如將俄國軍人贏得的勝利歸功于它，就不啻在世界上增強了極權主義的聲勢。「史達林成功——獨裁成功」，這種理論是很顯然的，但它的大前提則完全錯誤。在民主政府下，俄國人民可以打得更好，並贏取較便宜的勝利。此乃真理，而這個真理亦爲全世界民主鬥爭中最重要的。

有人問：這些事情早成明日黃花了，爲何我們還要提出史氏在戰爭初期的失敗及弱點呢？正因爲人們健忘，故我們必須強調起來，使我們對現實問題能有清切認識。現有若干人們，鑒于歐洲某些驚人發展及受了史達林宣傳的迷惑，對此一勝利的極權國家不免產生自卑感。如果此種觀感影响到輿論並領導外交政策，則其結果必使我們不能堅持民主立場，且要採取綏靖政策。

張伯倫及達拉第兩氏，均曾一度爲納粹侵畧極權主義所迷惑而推行綏靖政策。他們對一切敢于批評的人（包括邱吉爾）說：「你們會引起戰爭的」。而真理則爲「綏靖政策必然招致戰爭」。以往如此，今日亦然。綏靖政策的特質爲低估自己實力，而在宣傳影響下，過份重視對方的力量，其結果使對方得以不斷恐嚇，使自己的地位脆弱，而最後不得不進行「生存的戰爭」。

同盟國權威軍事專家認爲如無美國援助，蘇聯巨人必爲德國擊敗。在慶祝俄國勝利聲中，此一鐵的事實竟被遺忘了。一般極權主義的辯護者，却利用各種宣傳工具使人們將它忘記。爲作一對比起見，我不妨引證林德來的意見。林氏爲一位接近權威方面及白宮的記者。他說：「就目前在世界運用的整個軍事實力言，俄國及英國均無從與美國抗衡。……如無其他二國，則三強中無一能希望贏得戰爭者，而英俄兩國均完全被擊潰。」

這就說明如無世界上最強大的民主國家援助，較有效率的一個極權國必將擊敗另一較大但較弱的極權國。史達林極權政權之亡于希特勒，實基兩個因素——偉大俄國人民（雖則他們最恨史達林而在最危急時，仍有一千二萬人被拘于集中營）及民主國家的幫助。我們應當反復說明這些事實，並將它灌輸于一般「計劃社會」的熱烈信徒的腦筋中，俾人們不致被荒唐的宣傳神話所迷惑，而預備放棄「腐化」「陳舊」的美國制度而走極權主義之路。我應該聲明三年前當一般美國輿論尙表躊躇時，我即贊成對俄全面支持。我之仇視德國法西斯尙較文西泰爲早。我這一代的人們，曾致全力于建設俄國工業及軍事，俾應付此一死敵。德國統治者曾領導其馴服人民數度侵略俄國。讀者尙憶我兩位兄弟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遇害。在一九一八年德軍佔領基輔時，我會被捕入獄。兩年後，在哥美爾一役，波蘭人帶了德國訓練的西內西亞老兵，曾使我兩度受彈傷。

再則，如數百萬俄國，波蘭，或挪威籍的美國公民一樣，我恨納粹侵略者較一般無親屬在此等國家的美國人更甚。我們對於此一慘劇的印象更親切，因爲俄國及波蘭人多作戰一日，多忍受一天的犧牲，則不獨使英美獲得準備光陰，而且意味到一萬五千戰士的死亡，和五萬人的受傷。同時，這也意味着我們故鄉婦孺的流離失所，財產的損失，及工業的破壞。俄國人民的悲劇，即爲我個人悲劇。如一般其他俄籍美國公民一樣，我深深感謝美援租借法，雖然這些物資必須經過暴君之手。但我也想警告美國人民。

三年來，在一般同道者及史達林的「現實」緩靖者鼓吹下，竟無人敢于提起蘇聯政權的眞象。在謀同盟國團結的藉口下，任何呼籲皆被指摘爲「對我們危機中英勇同盟的攻擊」，縱然此種呼籲僅係請求史達林自集中營釋放數百萬囚徒，俾加強對抗希特勒的力量。

雖則蘇聯報紙及廣播並未因團結的需要，而停止攻擊若干盟邦，但三年來，我從未發表任何指摘史達林極權政權的文字。本書的出版亦因此延緩了數年。我除了發表上述關於贊成租借法援助及兩篇軍事論文，預測希特勒不能佔領列甯格勒及莫斯科外，一直保持緘默。但目前史達林的帝國已完全脫離危險，並在他的盟邦——波蘭進行了流血恐怖，而共產黨也正在希臘及其他民主國家進行挑戰，我才感覺到每人都應當說明他所知道的眞理。

我認識俄國的史達林政權，並在它統治下渡過半生。我知道它爲最完全及最有害的虐政。羅斯福總統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一日所說的極具眞知灼見。他稱：「凡熟悉俄國情形而敢于面對事實的人們，均知蘇聯如世界上其他獨裁一樣，爲一絕對獨裁政權」。我們如果認它爲新的社會生活方式，那是悲慘地失敗了。若干人們，因熱衷于對希特勒戰中求得有力的盟邦，而昧于此一事實。那麼，他們的態度對於整個文明及俄國人民是極有害的。

我們對民主制度應有更真確信念。民主國家現已證明它們可以獲致偉大軍事勝利，並且可以更有效及耗費較少生命來達到目的。

俄國人民英勇地進行了他們所不能享受的爲民主與自由的戰爭。他們在作戰時也曾經希望戰爭結束後，可以獲得民主。但這些英美外交家及記者對他們的諾言是否已實現呢？他們回國後，並未謳歌俄國人民的光榮，而只是稱讚史達林政權。這真是只促使奴役制度的永久化，他在民主勝利美名下，鞏固極權壓迫哩！

史達林政權的贊助者對他們說：「你們因被奴役才能爲自由打得這樣好。爲酬報計，我們可以將奴役神聖化，錫以民主的美名。」

這就是人們如何將俄國人民英勇的勝利歸功于史達林極權政權。他們一方面危害了世界民主的前途，另一方面使俄國人民受到了致命的打擊。

美國與蘇聯間的利益是毋須有衝突的。此兩個偉大人民相互間有自然的融洽，而他們的關係也合理地和平友善。唯一阻碍此項友誼的堅定與持久的因素，厥爲極權虐政包圍及絞殺俄國的石牆。李普曼在他的美國戰爭目的一書中會稱：「當俄國將本身隔離于西方憲政宣傳外，我們基于寬容的原則，迄未隔離了極權主義的宣傳。……此種不等等若不廢除，蘇聯及西方世界將無從真正合作。它們只可能進行一些變通辦法，一折衷，討價還價，特別協定，以及外交上的制裁與反制裁。……俄國人如不能在國內實行這些原則，他們絕不能使外人相信他們新外交政策的民主原則。」

我應強調說：如果俄國人能將此種原則在國內實行，則此兩大人民間之友誼必可永久維持。爲達到此一終極目的，每一篤實深思的美國公民，都應放棄在俄國人民樂于享受奴役的侮辱觀念。他應該了解俄國人民對于求得一種基于「人類自由與正義」的生活方式，實具有與美國人及世界上其他人民一般相同的希望及權利。

(全書完)

來函 書信
登記 67. 年 1 月 25 日

RR 8 100 000

到期單

請照以下日期還書

68. 7. 10

70. 1. 9

請照以上日期還書

到期單

請看反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B10259751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索書號 321.58
039

登錄號 259751

751

書名 虎口餘生

借閱人	借期	借閱人	借期
651669	26/6		
671320	12.26		

註

索書號 321.58

039

登錄號 25975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臺灣師大圖書館



B10259751